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

志愿服务及衡量

联合国
志愿人员组织

2025 年 12 月出版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总部
Platz der Vereinten Nationen 1
53113 Bonn, Germany

如何引用本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5）。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志愿服务及衡量。波恩。
版权所有。

一般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联合国（包括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或联合国会员国）的观点。凡提及具体公司时，并不意味着它们已获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认可或推荐，或优于其他未提及的同类公司。提及非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网站或出版物，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对其表示认可，或其中所含信息或所表达观点的准确性。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已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核实本出版物中包含的信息。但是，对于公布的材料和正在分发的材料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解释和使用材料的责任在于读者。在任何情况下，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均不对因使用材料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所采用的名称与材料的呈现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关于其边界划定发表任何意见。未经事先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在检索系统中存储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本报告的分析部分所包括的一些数据，如有说明，是由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或《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的其他撰稿人估测的，不一定是有关国家、地区或领土的可能使用其他方法得出的官方统计数据。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通过全球志愿服务为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与合作伙伴携手，将合格、积极且得到充分支持的联合国志愿人员纳入发展规划中。

版权所有 ©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5
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均需获得许可。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nv.org

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

志愿服务及衡量

联合国
志愿人员组织

鸣谢

本报告的制作过程得到孟加拉国、中国、捷克、法国、德国、印度、爱尔兰、哈萨克斯坦、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和土耳其于 2022 至 2024 年间向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特别志愿人员基金提供的财政捐助。

团队负责人

Tapiwa Kamuruko

项目管理和政策引导

Emiliya Asadova

研究与制作协调

Tapiwa Kamuruko、Emiliya Asadova 和 Udo Mbeche Smith

制作与项目管理助理

Paula Germana 和 Dereck Ngala

研究与撰写

本报告由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诺森比亚大学、比勒陀利亚大学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编写。诺森比亚大学全球发展中心负责编写第 1、2、4、5 和 6 章。国际劳工组织负责编写关于全球志愿工作估测的第 3 章，比勒陀利亚大学负责编写关于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的第 7 章。第 8 章由参与报告编写的所有合作伙伴共同撰写并提供见解。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全球发展中心是一个世界领先的研究、知识交流和学习机构，专注于人道主义危机和发展背景下的志愿服务研究。中心汇聚了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旨在针对志愿服务与不平等、冲突、流离失所和气候变化等全球重大挑战之间的关系推动相关研究、政策制定和公众讨论。中心与全球领先的人道主义和发展组织、研究人员、志愿者和社区合作，共同创造知识并增强应对上述挑战的能力。

比勒陀利亚大学统计系拥有 90 年的历史，每年招收超过 13,000 名学生，是非洲领先的统计教育和研究中心。该院系提供全面的统计与数据科学课程，在理论和应用统计领域拥有广受认可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该院系积极参与跨学科研究及全球倡议，包括开发全球标准化的志愿服务衡量指标以及协调非洲各地的卫生统计工作。此外，该院系还通过“加强妇女研究网络”和“生物统计学研究”等项目，在非洲大陆开展研究能力建设合作，这两个由全球资助的项目致力于帮助培养下一代统计学家和数据科学家。

研究联盟成员

诺森比亚大学研究联盟

联盟负责人：Matt Baillie Smith（英国诺森比亚大学）、Bianca Fadel（英国诺森比亚大学）。

联盟协调员：Sichelesile N.M.Mpofu（英国诺森比亚大学）。

章节共同负责人：Matt Baillie Smith（英国诺森比亚大学）、Jacqueline Butcher-García-Colín（墨西哥公民社会研究中心）、Maria Faina L. Diola（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Jakub Dostál（捷克共和国伊赫拉瓦理工学院）、Bianca Fadel（英国诺森比亚大学）、Ksenija Fonović（捷克共和国查理大学）、Laura Hirst（英国诺森比亚大学）、Katy Jenkins（英国诺森比亚大学）、Egidius Kamanyi（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Sarah Mills（英国拉夫堡大学）以及 Sichelesile N. Maxine Mpofu（英国诺森比亚大学）。

其他章节贡献者：Sumana Banerjee（印度独立研究员）、Janet Clark（英国诺森比亚大学）、Catherine Liamzon（菲律宾独立研究员）、Sophie Milnes（英国拉夫堡大学）和 Zouhal Younis（英国诺森比亚大学）。

比勒陀利亚大学研究团队

团队负责人：Samuel Manda（比勒陀利亚大学统计系，南非比勒陀利亚）

章节共同负责人：Nada Abdelatif（南非医学研究委员会生物统计学研究组，南非开普敦）、Sollie Millard（比勒陀利亚大学统计系，南非比勒陀利亚）、Dineo Seabe（开普敦大学纳尔逊 · 曼德拉公共治理学院，南非开普敦）、Harrid Nkhoma（比勒陀利亚大学统计系，南非比勒陀利亚）和 Njeri Wabiri（非洲开发银行集团非洲发展研究所首席能力官员，科特迪瓦阿比让）。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团队

Marta Golin 和 Vladimir Ganta

案例研究专栏撰稿人

Aim Initiative Foundation、社区青年学习与技能发展促进协会 (APLSY)、民间社会调查研究中心 (CIESC)、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 (CCIVS)、王储基金会、赫瑞瓦特大学、志愿服务研究所 (IVR)、马杰伊 · 贝尔大学、多哥国家志愿服务机构 (ANVT)、parkrun、人类服务组织 (SHBO)、都柏林大学 (UCD)、Voluntare、海外志愿服务 (VSA) 以及世界童军运动组织。

文中案例研究贡献者

Achieve17 Youth Club、Aim Initiative Foundation、美国志愿队 (AmeriCorps)、澳大利亚志愿人员计划 (AVP)、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 (CCVIS)、Engagement Global gGmbH、Fernando Muñoz Miño（作为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在厄瓜多尔委托的一项研究的组成部分）、Gateshead Community Bridgebuilders、Journalists' Cohesion Council(JCC)、西班牙志愿人员平台、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 (HSE)、Solidarité Union Coopération(SUCO)、Unité、都柏林大学 (UCD)、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无国界兽医北美分会 / 北美无国界兽医 (VWB/VSF)、苏格兰志愿人员组织、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 (VSO)、奎松市世界城市学院以及世界童军运动组织。

宣传和外联

Jennifer Stapper 和 Ayesha Khan

运营与行政支持

Jingjing He

概念设计、布局、编辑及翻译

Prime Production Ltd, Berkshire, United Kingdom

同行评审

Fridah Daka、Hae-Yeon Alice Jeong、Paul Menye、Lucy Ndungu、Erkina Urazbaeva 和 Nikita Shabayev

技术咨询、意见与支持

Omar Agbangba、Francisco Javier Ampuero、Juan Pablo Gordillo、Jin Kyung Jung、Ngianga-Bakwin Kandala、Bayarmaa Luntan、Christopher Millora、Jessika Naidoo、Bogna Kietlińska-Radwańska、Alok Rath、Nujoud Serhan、Vera Chrobok、Louise Chamberlain、Enkhmandakh Ishdorj、Andrey Pogrebnyak、Anastasiya Krasnoshchoka 和 Narendra Mishra

翻译审校

张楠、程凡轩

《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高级顾问小组

Pedro Conceição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美国纽约。

“*《人类发展报告》告诉我们，进步是多维度的。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现在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志愿服务，捕捉到了人类福祉的全景，而不仅仅限于经济投入。*”



Jessica Faieta –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兼讲师，美国康涅狄格州。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局局长。

“*《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突显了志愿人员对整个世界作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阐明了最终衡量和量化这项被低估的工作的重要意义。报告的关键发现，如估计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志愿服务，揭示了志愿人员的巨大影响 —— 即使他们身处危机和战争的风险及威胁之中。*”



Lev Jakobson –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副校长、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公民社会与非营利部门研究中心研究主管，俄罗斯联邦。

“*我们现在对志愿服务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文件所提供的都要全面、深入。本报告成功融合了定量和定性分析，为志愿服务科学提供了新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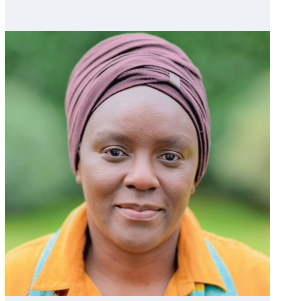
Rafael Diez de Medina – 国际劳工组织首席统计师兼统计部主任，瑞士。

“*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标准和工具确保了全面衡量及可比性。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也以此作为基础。其采用的严谨方法使之成为认可和追踪志愿人员对全球发展贡献的绝佳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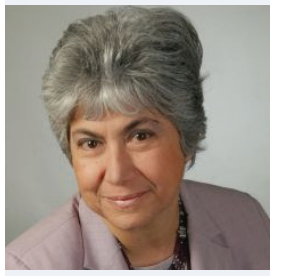
Amanda Khozi Mkwashi – 联合国驻莱索托驻地协调员、英国基督救助会 (Christian Aid) 前首席执行官。

“*志愿服务不是时间或技能的交换，而是对社区中滋养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乌班图’（ubuntu）精神的长期投资 —— 给予与接受一起构建信任、共同的人性与集体的力量。*”



Flavia Pansieri –2008 年至 2013 年曾任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执行协调员。

“*衡量志愿服务对进步及福祉的贡献至关重要，这并非为了说服他人，而是为了证实志愿人员对和平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记录下志愿服务为社区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为志愿人员个人带来的社会效益。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技术咨询小组

Ola Awad –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局长兼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项目委员会联合主席

Amal Emam – 埃及红新月会青年与志愿者事务国家主管兼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中东和北非地区青年与志愿者事务协调员

Galina Bodrenkova – 俄罗斯国家志愿人员中心主席，俄罗斯联邦

Grant Cameron –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数据与统计专题研究网络前主任

Grace Aguiling-Dalisay – 菲律宾志愿人员组织信息协调与交流网络创始主席，菲律宾

Hernando Estevez – 拉萨尔大学哲学与人文学院院长，哥伦比亚波哥大

Vladimir Ganta – 国际劳工组织高级统计师，瑞士日内瓦

Desiree Manamela – 南非统计局劳工统计处处长

Jacob Mwathi Mati – 金山大学副教授，南非

Samuel Turay – 塞拉利昂志愿人员参与组织网络国家协调员

Xie Qiong – 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Yanchun Zhang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处首席统计师，美国纽约



徐浩良

协理署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前言

当人民成为发展的核心，社区拥有引领变革的能动性和机会时，发展就会取得成功。每一天，世界各地的志愿人员都在践行这一原则。他们弥合政策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当地现实联系起来，将计划转化为行动。对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而言，志愿服务与发展密不可分；它是人类进步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是人类努力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为认识志愿人员行动如何加强社会凝聚力、信任感和集体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而这些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要素。报告表明，通过将志愿人员行动视为一种可衡量的战略性资源，我们能更好地分配资源，促进社区参与，推动包容性。报告提出的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还为各国政府及合作伙伴提供了将志愿服务纳入政策、规划及成果框架的实际方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常荣幸能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共同推进这一循证方法。让我们一起为数百万志愿人员鼓掌，正是他们的奉献精神将愿景转化为行动，将想法转化为影响力，将社区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序言

全球各地的志愿人员纷纷挺身而出，默默无闻却又坚定不移——在遭受干旱的村庄，在经历冲突后逐渐恢复的城市，在不平等现象根深蒂固的社区。他们耐心倾听，他们精心组织，他们为面临生活变故的人提供支持。

然而，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仍鲜为人知。他们的故事鲜有耳闻，他们的影响力鲜有计量。既然未被看到，又何谈被重视？《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着手改变这一现状，重点转向寻找更好的方法来捕捉要义。不仅仅是志愿服务付出的时间，还有它们所建立的希望、恢复的信任感以及为生活注入的力量。

本报告既是一种洞见，也是一份邀请：

不要将志愿服务视为慈善之举，而要将它视为伟大的力量。不要将它视为背景噪音，而要将它视为维系社区团结的雄壮节奏。

愿这份报告激发新思维，开启新篇章，让志愿服务不仅得到应有的重视，更因其对每个社区的影响而广受赞誉。



Toily Kurbanov

执行协调员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目录

鸣谢 **4**
前言 **8**
序言 **9**
执行摘要 **16**

第 1 章 – 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重要意义 **19**
关键信息 **20**
1.1 发布本报告的理由以及时机选择 **20**
1.1.1. 志愿人员衡量的新机遇 21
1.1.2. 报告范围和重点及相关定义 22
1.2 超越衡量工作：志愿服务的力量 **23**
1.2.1. 针对不同需求的不同衡量方法 23
1.2.2. 衡量志愿服务的前瞻性议程 24
1.3 如何阅读本报告 **25**

第 2 章 – 志愿人员衡量工作的最新进展 **27**
关键信息 **28**
2.1 引言 **28**
2.2 志愿服务衡量方法的演变 **29**
2.2.1. 从计算小时数到捕捉志愿人员投入的多样性 29
2.2.2. 超越数字：采用参与式和定性方法衡量志愿服务成果 32
2.3 衡量工作的多个不同目的 **35**
2.3.1. 了解组织需求和能力 36
2.3.2. 利用结果开展学习和问责 37
2.4 结语 **39**

第 3 章 – 对志愿者工作的全球估测 **41**
关键信息 **42**
3.1 引言 **42**
专栏 3.1. 志愿者工作的含义? 43
专栏 3.2. 基于组织和直接志愿者工作 43

3.2 关于志愿者工作的现有数据 43
a) 数据不足且采集不连续 43
b) 数据收集不完整 44
c) 缺乏数据可比性 44
3.3 估测志愿者比率 45
步骤 1：数据统一 45
步骤 2：数据验证与筛选 45
步骤 3：通过建模填补数据空白 45
步骤 4：生成国家层面和合计估测数据 45
3.4 局限性 45
参考期不一致 45
关于志愿者工作类型的数据缺失 45
3.5 对于全球及区域志愿者比率的新估测结果 46
3.6 当前和以往的志愿者比率估测结果 47
3.7 按志愿者工作类型划分的志愿者比率估测数据 48
3.8 结语：行动的战略路线图 49

第 4 章 – 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幸福感、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影响 51
关键信息 52
4.1 引言 52
4.2 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和幸福感的贡献 52
4.2.1. 衡量与绘制健康与幸福感 53
4.2.2. 衡量个人健康与幸福感的工具及混合方法 56
4.3 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技能和就业能力发展的贡献 57
4.3.1. 衡量与绘制技能和就业能力 58
4.3.2. 衡量个人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工具与混合方法 59
4.4 结语 61

第 5 章 – 衡量志愿服务对发展的贡献 **63**
关键信息 **64**
5.1. 引言 **64**
5.2. 衡量志愿者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64**
5.2.1 采用创新方法衡量志愿服务对经济发展的价值 66
5.3 衡量志愿者对促进社会健康成果的贡献 **68**
5.3.1 衡量志愿者在健康领域的贡献 68
5.3.2. 衡量志愿服务对健康领域影响的创新方法 70
5.4 衡量志愿者在教育领域的贡献 **72**
5.4.1. 通过教育相关成果衡量志愿者的影响 74
5.4.2. 衡量志愿者在教育领域影响的创新方法 75
5.5 衡量志愿服务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中的贡献 **75**
5.6 结语 **77**

第 6 章 – 在多重全球危机之中衡量志愿服务 **79**
关键信息 **80**
6.1 相互交织的多重危机中的志愿服务 **80**
6.1.1. 在相互交织的多重危机中衡量志愿服务的重要性 82
6.2 危机时期志愿服务衡量的创新方法 **84**
6.2.1. 危机期间志愿服务的发声与参与度衡量 84
6.2.2. 衡量志愿服务与社会凝聚力 85
6.2.3. 评估志愿者在危机应对中的双重角色 87
6.2.4. 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志愿服务时间衡量 88
6.3 在危机时期开展志愿服务衡量的挑战与机遇 **89**
6.4 结语 **91**

第 7 章 – 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 **93**
关键信息 **94**
7.1 引言 **94**

7.2 志愿服务的定义和关键概念 95
7.3 GIVE 指数的范围 95
7.4 GIVE 指数的指标 96
7.4.1. 志愿服务对个人价值的指标 96
7.4.2. 志愿服务对社区和社会价值的指标 96
7.4.3. 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指标 96
7.4.4. 关于有利环境的指标 97
7.5 GIVE 指数的构建方法 99
7.5.1. 志愿服务数据的来源 99
7.5.2. 背景和变量的差异 100
7.5.3. 确定并提取指标变量以构建 GIVE 指数 101
7.5.4. 稳健性检验 101
7.6 结语 102
7.7 关于实施 GIVE 指数的建议 103
7.8 下一步：实施 GIVE 指数 104

第 8 章 – 向前迈进：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下一步是什么? 107
8.1 引言 108
8.2 关键信息与政策建议 109
图 8.1《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
关于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建议概览 109
- **原因? 109**
- **内容? 110**
- **方式? 110**
- **对象? 111**
- **时间? 111**
- **地点? 111**

8.3 结语 112

附录 A：方法说明 **114**

附录 B：对志愿者比率的全球估测 **116**
1. 数据可用性 118
2. 数据统一与输入审查 120
3. 志愿者比率估测方法 121
   3.1 总志愿者比率的建模方法 121
   3.2 直接志愿者比率和基于组织的志愿者比率建模方法 122
   3.3 从国家层面估测到合计估测 122
4. 额外数据来源 123

附录 C：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的框架 **126**
   方法说明 127
   过程 127
   计算示例 130

参考文献 **136**
   第 1 章 136
   第 2 章 137
   第 3 章 139
   第 4 章 140
   第 5 章 142
   第 6 章 146
   第 7 章 148

附注 **150**



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联合国志愿人员 Marie-France Coco Bleou 参与方案监测支持，帮助提升多哥儿童福利成果。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执行摘要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开展志愿服务衡量

志愿服务在加强社区建设、支持公共服务以及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何时何地，志愿人员都是推动变革的强大力量。然而，志愿服务的衡量方法有时无法充分反映其多样化的贡献、多重组织与实施方式，以及其对个人和社区的多种影响。换言之，目前仍缺乏系统化衡量志愿服务价值的可靠且全面的证据，对基于充分信息制定政策和投资决策构成限制。

作为回应，《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汇集了关于志愿服务衡量及其在推动全球发展成果方面作用的最新研究和思考。报告探讨了衡量志愿服务的创新方式，既具备包容性，又能够捕捉到世界各地参与志愿服务的个人和社区的声音及观点。

更优化的衡量方法能够展示志愿服务的效益和挑战，强调其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揭示潜在机会，改善组织、政府、公司、研究人员和社区对志愿人员的理解和支持方式。这反过来又能促进更有力的志愿服务宣传，更有效的资源分配，更深入的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志愿服务的衡量标准在不断发展。本报告展示了如何通过多样化衡量标准以及从过去被忽视的环境中学习，从而产生新的见解并加强系统化方法。明确且符合具体情境的志愿服务衡量定义和目的与综合性方法相结合，能够就志愿服务的贡献及影响提供更有意义、更可操作的实证。本报告分享了衡量工具和方法的实际案例，以及国家、组织和志愿人员自身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和方法。

《2026 年全球志愿服务报告》还提出了创新的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概述了加强志愿服务数据的生成及使用的四个关键维度，从而对其在个人、社区、经济以及志愿服务有利环境中的价值进行统一的适应性评估。

关键见解

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志愿服务的价值并推动变革。志愿服务衡量工作使社区能够主导自身贡献成果并分享其中故事，为组织和志愿人员增加动力并赋能。它还为决策者制定政策、法律及确定资金优先事项提供信息参考。但是，为了全面了解志愿人员所做的贡献以及发挥的影响、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社区赋予志愿服务的地方意义及价值，我们需要更准确、一致和系统的衡量方法。

数字本身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要全面了解志愿服务的规模和深度，需要运用多样化的工具、策略和创新方法。定量数据有助于了解参与程度，定性分析则能揭示志愿服务中常被忽视的方面，包括个人成长、社会联系、韧性及团结形式等。结合不同的方法 —— 反映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经验 —— 能更全面地了解全球志愿服务的情况。为了支持系统的衡量工作，必须采用一致性，以及具有适应性、包容性和情境适宜性的方法。

志愿服务衡量的结果可用于满足多种需求，需要广泛的人员参与。在形成证据材料的工作过程中，必须承认并考虑志愿服务衡量工作各行为体的特殊利益及优先事项，强调需要针对特定目的和需求设计衡量方法，并在全球框架与地方做法之间取得平衡。衡量志愿服务不仅仅是研究人员或统计人员的技术任务。它还涉及到相信志愿服务能够支持建立更强大、更具包容性的社区的各个行为体。

本报告最后就指导主要行为体推进志愿衡量工作提出了关键建议。需要考虑的领域包括：

- 明确志愿服务衡量的目的和范围，确保其结果能支持学习和问责。
- 定义、识别并考虑不同背景和危机下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 综合多种衡量方法；志愿人员数量显示规模，定性见解则为政策指导和投资增加深度及意义。
- 确保志愿服务衡量在从设计到传播的每个阶段都具备包容性，从而使其结果得到信任并被更广泛使用。
- 将志愿服务衡量纳入国家统计框架、劳动力调查、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并确保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 从一开始就规划和实施志愿服务衡量工作，保持一致性，以捕捉志愿服务的长期影响。
- 促使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参与构建志愿服务衡量体系。
- 以符合特定情境的方式设计和开展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特别关注全球南方地区缺失的证据。

志愿服务对各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往往被忽视。《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涉及关于志愿服务衡量的最新全球讨论，展示了如何充分认识、理解和动员志愿服务的跨领域多重贡献，以促成持久变革。志愿服务衡量工作本身可以成为促进学习、指导决策和采取明智行动的动态工具，从而加强社区建设，支持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具韧性的未来。



国家联合国社群志愿者与孟加拉国吉大港山区兰加马蒂的受益人会面，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LoGIC 项目提供支持，以推动实施当地气候适应解决方案。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1

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重要意义

关键信息

- **志愿人员所做的工作对于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应对不断变化且相互关联的挑战至关重要。**志愿人员响应危机、增强社会凝聚力，推动和平与发展。但是，目前仍然缺乏可靠且全面的证据来体现他们所做的工作。
- **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志愿服务的价值并加速变革。**准确的志愿服务衡量结果能够激励并增强组织和志愿人员的能力。它还有助于社区盘点自身贡献和事迹，并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以制定法律、确定资金优先级，为志愿服务创造有利环境。
- **志愿服务衡量工作能满足多重需求。**必须承认并考虑志愿服务衡量工作各参与方的特殊利益及优先事项。衡量工作必须针对特定目的进行设计，并在全球框架与地方做法之间取得平衡。
- **数字本身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尽管定量数据非常重要，但衡量工作还应反映个人成长、社会联系、社区团结以及其他经常被忽视的定性贡献。通过结合多种方法和手段来衡量多重贡献及影响，可以获得更深入的见解。
- **多样化工具、衡量策略和创新推动具有前瞻性的议程。**报告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种方法，以应对改进系统化衡量工作的挑战，同时确保这些方法具有包容性和情境适应性。报告提出了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这项新指数概述了四个关键维度，以加强志愿服务相关数据的生成和使用，从而对志愿服务对于个人、社区、经济以及有利环境的价值进行统一的适应性评估。

1.1. 发布本报告的理由以及时机选择

全球风险不断升级，志愿人员身处变革的前沿。从应对气候紧急情况和灾害，到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他们在构建社会凝聚力和加速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项关键的工作却往往被忽视。由于缺乏关于志愿服务的作用、规模和价值的可靠且全面的证据，我们对政策的理解十分零散，投资决策也缺乏充分依据。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关于志愿服务的连贯分列数据 —— 这不仅是为了证明其影响，更是为了让政策制定者能够设计出更有效、更具包容性的应对措施，并将志愿服务作为国家发展中可衡量的组成部分全面融入其中。

本报告基于《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十余年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逐步拓展了全球对志愿服务的理解 —— 从其在促进社会包容性[1]和增强韧性[2]方面的作用，到塑造变革性治理[3]以及推动平等与包容。[4]《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旨在通过解决长期存在的证据缺口问题，推动全球关于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讨论，促进我们对志愿服务影响以及众多志愿人员经历的理解。本期《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与以往周期保持一致，重点关注志愿服务衡量工作，反映了概念和方法优先事项的逐步演变，代表了一种质的飞跃。

为了实现可持续成果，对人道主义和发展工作的投资也越来越倾向于以结果为导向。因此，关于志愿服务影响的证据对于制定响应性政策至关重要。本报告探讨了衡量志愿人员贡献的新方法，特别关注非正式志愿服务类型以及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机遇。此外，报告还纳入了在志愿服务衡量讨论中经常缺失的声音，尤其是来自全球南方关于志愿服务研究和衡量方法的声音。

本章介绍了本报告的目的 —— 呈现多样化、实用性及包容性的志愿服务衡量方法。志愿服务衡量不再局限于全球北方的学术机构

和政府。如今，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研究人员都在积极探索创新的方法来衡量志愿服务的价值。志愿人员现在不仅是评估的对象，还是共同创造对于其工作的理解和认可的合作伙伴。因此，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结合不同的衡量策略，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志愿人员的贡献。顾及具体情境的衡量工具和方法对于政府、企业和志愿人员组织，以及对于社区和志愿人员本身都很重要 —— 后者是日常发挥作用的关键，无论其贡献是否在现有框架内得到体现。最终，本报告认为，志愿服务衡量工作是将这些日常团结行为转化为可操作证据的工具，进而吸引投资、影响政策并为志愿人员本身赋能。

联合国大会已宣布 2026 年为 “ 国际志愿人员促进可持续发展年 ”。[5] 因此，本报告恰逢其时，直接响应了全球对循证志愿服务投资的呼吁。其见解不仅颂扬了志愿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还致力于改进衡量其影响的方式。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志愿人员 Josee Abou Naoum 在黎巴嫩贝卡地区贝德纳耶尔监督为护理人员举办的心理社会支持课程的实施情况。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

1.1.1. 志愿人员衡量的新机遇

尽管衡量志愿人员贡献的工具在逐渐增多，但这些工具仍缺乏系统性和广泛可及性 **（详见第 2 章对不同方法的详细综述）。**某些组织没有能力或意愿分享其方法，而各国和各组织在衡量志愿服务的能力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从历史上看，志愿服务的衡量方法一直受全球北方研究传统的影响，反映了现有的基础设施和能力。[6] 在某些情况下，看待衡量方法的方式也过于僵化或狭隘，导致某些重要的志愿服务形式 —— 尤其是正式结构之外的志愿服务形式 —— 可能会被忽视。[7]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发展领域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市场驱动政策促使政府和其他机构寻求新的方式来认可和量化志愿服务，强调其货币价值。[8] 虽然这些方法产生的统计数据有助于为政策提供信息，并展示了志愿服务对服务提供和不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但这种方法往往忽视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团结和互助形式，而这些形式在全球南方国家尤为明显。[9]

尽管志愿服务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相互关联的，但二者通常被视为独立的发展维度进行记录。因此，衡量志愿服务在社区生活和团结建设中的作用受到的关注较少。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采用混合方法，将不同形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相结合，以拓展关于志愿服务的知识。这些努力标志着从通用模型向区域和情境特定框架的转变，融入了志愿人员的本土见解。这也反映出学术研究人员越来越关注如何更好地认识全球北方以外地区的社区志愿服务经历，以指导政策和实践。

在当今世界面临相互交织的多重人道主义、环境、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衡量志愿服务的能力已成为协调一致并成功应对这些复

“我们作为联合国志愿人员，在数据和人员之间架起桥梁，帮助世界粮食计划署确保运营的问责制。

Eunice Loforte，世界粮食计划署莫桑比克紧急响应联合国志愿方案助理

杂挑战的关键。关于非正式志愿服务的分列数据以现有的地方团结体系为基础，可以为政府、地方和国际组织的危机应对策略提供信息。例如，关于社区志愿人员在洪涝灾害或粮食短缺期间自我动员方式的数据可以为预警系统提供信息参考，改善资源定位方式，确保边缘化群体被视为积极的变革推动者，而非被动的受益者。

自联合国“十年行动”(Decade of Action and Deliver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0] 启动以来，推动志愿服务定量和定性衡量工作的势头日益增强，支持政府和民间社会在志愿服务参与方面进行投资，以应对这些全球挑战。为巩固这一势头，本报告提出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 (GIVE)，以响应关于“志愿服务定义和衡量标准”的号召。[11] 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概述了四个关键维度，以加强志愿服务相关证据和数据的生成、解释和使用：

1）志愿服务对于志愿人员个体的价值；
2）志愿服务对社会的价值；
3）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
4）志愿服务的有利环境

GIVE 指数的整体设计超越了单纯的数字，旨在展示志愿服务的多维影响。该框架通过整合这四个维度，直接解决了代表性不足和能力差距等长期挑战，尤其是对于全球南方地区。重要的是，GIVE 指数不仅提供了稳健的结构，还确认了单一定量衡量的不足之处，为承认志愿服务对于关系性和变革性影响创造了机会，它们也是理解志愿服务全面价值的关键。

尽管“不能计数的就不算数”[12] 这句话在许多情境下都适用，尤其是对于比较志愿者参与比率的统计数据而言，但它确实存在局限性。并非所有关于志愿服务的内容都能被计数，但不能计数并不意味着就不应被考虑。拥抱多元方法而非依赖单一方法，可以促进志愿服务衡量的包容性和准确度。

1.1.2. 报告范围和重点及相关定义

衡量志愿服务的影响首先取决于如何定义志愿服务。反过来，衡量方式又塑造了我们对何为志愿服务的认知。本报告承认二者的动态关系，倡导采用包容、灵活的定义，反映当地价值观和实践做法，同时支持“不让任何人掉队”的议程。[13] 衡量框架应避免僵化分类，而应适应志愿服务发生的背景，并在评估志愿人员贡献过程中促进公平性和包容性。

在此背景下，《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采用了联合国大会于 2001 年通过的志愿服务定义：“志愿服务指自愿开展的一系列广泛活动，包括传统形式的互助和自助、正式服务提供以及其他形式的公民参与，其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利益，且金钱奖励并非主要激励因素。”[14]

本报告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多种工具和衡量策略，从经济估值及纵向研究，到参与式评估及共同设计指标。报告分享了国家、组织和志愿人员自身认为行之有效的实例。这不仅仅是追踪行之有效的做法，更关乎在全球危机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时期，利用信息的力量揭示志愿服务的意义和价值，提高志愿人员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1.2. 超越衡量工作：志愿服务的力量

衡量志愿服务使不同利益群体能够向个人、社区和经济体阐明志愿服务的价值，在如今这个关键的时代，创造一种共同语言来认可并利用他们的贡献。本报告借鉴世界各地的案例研究，探讨了组织如何衡量发展成果以及与志愿服务相关的长期社会和行为变化。我们在衡量志愿服务的工作中发现，志愿服务有助于增强个人幸福感、培养积极公民意识、增强社区韧性并支持公共服务。[15]

准确记录志愿服务的价值和影响，有助于识别并更有效地应对挑战，增强志愿人员促进和平与发展的能力。衡量志愿服务的成功之处以及挑战所在，有助于促进国内及国际的学习与改进。分列衡量数据可直接为危机规划和干预措施提供信息参考。例如，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球动员了众多志愿人员，但现有数据显示，对于某些群体而言，疫情带来的参与志愿服务的障碍多于机遇。[16] 此外，我们需要制定新策略来捕捉某些群体的贡献，比如有些群体通常被视为仅仅是被动的受益者，而实际上却是积极的变革推动者。[17]

衡量志愿服务并不仅仅是收集数据，它能在激励和赋能所有参与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志愿人员而言，衡量工作能清晰展示他们的努力所能带来的改变，认可他们的贡献，并激励更多人参与。此外，衡量工作还能发挥社区对各类事迹的主人翁意识，弘扬所作贡献，影响未来举措。对于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而言，衡量工作所提供的宝贵见解能够证明加大对志愿服务举措投资的合理性，从而打造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社区。因此，衡量志愿服务并非仅是研究人员和统计人员的技术任务。它是所有致力于建设更强大、更具包容性社区的人的共同责任。

1.2.1. 针对不同需求的不同衡量方法

有效的衡量方法具有情境特异性。了解影响参与情况的制度和当地社会规范，有助于制定衡量志愿人员贡献的相关策略。任何一种衡量技术都不能全面捕捉志愿人员贡献的多样性 —— 每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附加价值和局限性。定量衡量方式追踪的是参与组织或政府方案正式活动的志愿人员数量及其贡献的小时数。但这只是一部分的情况。在危机或紧急情况下发生的非正式或自发性志愿服务行为往往未被识别，因为它们并不符合这些数据追踪方式的标准。[18]

为了充分理解志愿活动的影响，衡量标准还必须捕捉到志愿活动对参与者的个人意义。这包括他们的动机、所获得的技能、个人成长以及通过志愿活动建立的联系。这也意味着要认识到志愿活动如何使社区更加紧密，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激励人们为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这些要素在多维度 GIVE 指数框架**（见第 7 章）**中都得到了体现。



Patrick Lumumba，坦桑尼亚卡苏卢的联合国志愿数据管理协理干事。

在衡量志愿服务方面，不同群体会有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点。**上文表 1.1** 从战略角度概述了志愿服务衡量工作如何帮助不同群体为规划、预算制定和问责提供可操作的证据。

1.2.2.衡量志愿服务的前瞻性议程

全球社会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改进数据系统以进行系统化衡量，另一方面要确保这个过程保持包容性和情境敏感性。本报告提出的 GIVE 指数框架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为将志愿服务纳入政策分析和全球发展报告提供了一种统一的适应性方法。为应对衡量志愿服务能力不均以及狭隘衡量方法局限性所带来的挑战，本报告特别强调需要：

- **针对特定目的定义志愿服务并设计衡量方法：**关于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会影响的信息可满足不同需求，包括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参考、改进志愿人员管理以及展示志愿服务的影响等。探索如何根据特定背景下的不同定义和目标调整不同工具，揭示如何以有意义且可操作的方式记录志愿服务的独特方面。
- **丰富衡量方法，展示边缘情境下的创新：**为了更好地反映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员不同的价值观、优先事项和经历，目前对衡量工具、方法和指标的需求日益增加。创新方法，尤其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创新方法，为改进对志愿服务的理解和衡量提供了宝贵且具有地方特色的见解。
- **综合多种方法衡量志愿服务的多重贡献和影响：**整合不同类型的数据和信息收集方式，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志愿服务如何惠及世界各地的个人和社会。

表 1.1 衡量志愿人员贡献的价值

利益群体	衡量价值
社区，其社会规范包括将志愿服务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或从志愿服务中受益	· 展示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区的影响，促进学习和了解不同的需求 · 揭示被忽视的志愿服务类型以及消除代表不足群体所面临障碍的方法 · 了解并推广当地志愿服务带来的效益
志愿人员，其志愿工作对自身和社会产生影响	· 帮助志愿人员了解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志愿服务对自己的影响 · 支持对志愿人员工作的认可、宣传和支持
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利用志愿服务支持地方、区域和国家发展议程	· 展示志愿人员如何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促进发展 · 制定政策、法律、资助决策和支持体系，为志愿服务创造有利环境 · 突显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及其在服务提供、教育、技能发展和就业中的作用
参与和支持志愿人员的民间社会组织和网络	· 针对志愿人员驱动的活动，加强其设计、实施和影响力 · 促进不同组织之间的学习机会 · 支持志愿人员宣传和活动
参与并支持志愿人员的国际组织	· 提供证据证明志愿人员为实现发展所作贡献 · 支持倡导将志愿服务持续纳入全球发展框架
研究志愿服务的学者和研究人员	· 促进对志愿服务趋势和挑战的深入分析 · 为循证政策、方案设计和决策提供信息参考 · 增强学术兴趣，拓宽对志愿服务对社会影响的了解
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吸引志愿人员的私营部门	· 提供证据支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倡议增加对志愿服务的投资 · 展示企业志愿服务方案的价值，加强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及其对可持续发展和社区支持的贡献

志愿服务从来不是事无巨细地去做每一件事。它意味着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并为具有持久价值的事物做出贡献。

Riana Wulandari，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印度尼西亚的联合国志愿卫生官员

1.3. 如何阅读本报告

《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包含八个章节，各章节相互独立但又围绕衡量志愿服务这一主题。本期《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基于前几期报告中确定的结构及优先事项。各个章节及其中的案例研究既是完整报告的一部分，也可作为独立资源。《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的编写过程采用协作方法，因此，每章都融入了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案例研究。

报告的结构和风格旨在帮助从业者、政府官员以及重点关注政策的研究人员理解和衡量志愿服务，尤其是面对当前相互关联的多重危机，要求更加灵活的循证治理。

《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的第一部分，包括本章引言，设定了研究背景，并就使用各种技术来衡量不同形式的志愿服务的原因和方式提出最新的全面综述。它还概述了当前全球对志愿服务工作的估测情况。

第二部分探讨了特定情境下志愿服务的衡量问题，包括志愿服务对个人技能和幸福感的影响、对发展成果的影响，以及在当今危机重叠的时代，志愿服务衡量框架是否适用的相关性。这些专题章节包含原创案例研究，分享了在不同情境下衡量志愿服务的最新思考和实践案例，特别关注全球南方地区。

最后一部分介绍了 GIVE 指数框架，总结了本报告的主要政策建议，并对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未来进行了反思。

报告结构

第 1 部分 **背景说明**	**第 1 章** 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重要意义	**第 2 章** 志愿人员衡量工作的最新进展	**第 3 章** 对志愿者工作的全球估测
第 2 部分 **具体情境中的志愿服务衡量工作**	**第 4 章** 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幸福感、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影响	**第 5 章** 衡量志愿服务对发展的贡献	**第 6 章** 在多重全球危机之中衡量志愿服务
第 3 部分 **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及政策建议**	**第 7 章** 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	**第 8 章** 向前迈进：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下一步是什么？	



联合国人居署的联合国志愿人员 Lucile Camille Zoé Moal 在墨西哥主持了一场参与式规划研讨会。她的工作由法国提供资助。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5

2 志愿人员衡量工作的最新进展

关键信息

- **志愿服务的衡量标准在不断发展。**除了计算小时数和提供经济估值外，正式、非正式和个人志愿服务的社会、环境、关系和人类发展成果也日益受到关注。
- **不同方法揭示不同见解。**定量衡量方法追踪趋势并实现可比性，而定性和参与式方法则提供关于生活经历、信任、合作和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数字说明规模，叙事则传达意义。
- **早期的衡量框架**侧重于全球北方的经验、正式机构和服务提供情况。近期的工作则纳入了全球南方的视角、非正式和社区主导的行动，以及志愿人员和社区的观点，并由多元化的组织予以实施。
- **在组织和方案层面，有效的衡量工作涵盖设计、生产、分析、报告和使用的完整周期，**支持评估、学习和问责，同时也为有关管理能力、激励、留任和长期影响的决策提供信息参考。
- **未来的志愿服务衡量工作涉及多个方面、得益于技术驱动，**它利用人工智能、公民生成的数据和共同生产，并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外的更广泛的福祉议程相契合，同时保留了传统的统计指标以供比较。

2.1. 引言

本章基于第 1 章所述案例，对志愿服务衡量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批判性概述，追溯了各种方法如何从其统计和经济术语的起源演变为如今日益广泛使用的整体性、多方法框架。通过实例说明了衡量目标和实践的变化，尤其是自 21 世纪以来，各方日益认识到志愿服务具有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从这个新的整体视角来看，[19] 志愿服务衡量工作已成为证明志愿行动产生公共价值并值得公民和政府认可的关键。[20]

如第 1 章所述，志愿服务的衡量方式直接影响其价值评估。本章将深入探讨这些工具本身，展示不同方法如何塑造叙事并影响决策。虽然标准化指标对于可比性至关重要 —— 这也是第 7 章中 GIVE 指数框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 但重要的是应该理解，任何衡量工具都不是毫无偏颇的。

衡量工具和方法必须动态演变并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组织背景。互补性衡量技术的演变继续遵循志愿服务的核心原则，如自愿性和公益性。同时，更广泛的背景、新趋势和特定需求继续推动逐步标准化和包容性的新方法的出现，以衡量所有类型志愿行动的贡献（如第 1 章所述）。

早期衡量实践侧重于计算志愿服务的小时数和投入。虽然这种定量方法非常有用，但它有时无法充分体现志愿服务的成果和影响，或其在不同社会中的社会价值。因此，本章将探讨定性和参与式方法在捕捉志愿服务关系维度（如信任、协作和社区影响）方面的潜力。然后，本章将转向讨论衡量工作的目的，突显不同方法和工具如何满足不同需求。这些需求包括支持组织效能和能力建设，促进学习、创新和问责等。本章最后将考虑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未来，以及开展多种互补性衡量工作的重要性。

2.2. 志愿服务衡量方法的演变

2.2.1.从计算小时数到捕捉志愿人员投入的多样性

早期对志愿服务进行系统衡量的努力，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主要集中在从经济角度表达其价值。[21] 这使得各国之间能够进行比较，并为决策者和资助者提供了连贯、可比的数据。国际劳工组织《志愿工作衡量手册》[22] 引发了关于如何以工作小时数、全职等效职位及其估计经济价值来标准化记录志愿活动的国际讨论。

最近，估值方法已扩展到用货币量化非经济收益。例如，据估计，通过国际会员志愿人员组织扶轮社（Rotary）贡献的志愿服务时间每年可为社区节省约 8.5 亿美元，相当于该组织年度预算的近九倍。[23] 另一种基于英国财政部认可的幸福感估值的方法，利用苏格兰的调查数据 [24] 估算，每周正式做一次志愿工作的人，其幸福感改善程度相当于额外获得价值 1270 美元的社会价值所带来的生活满意度提升。[25]

这些衡量策略通常依赖于定量方法来测定志愿服务为公共服务、第三部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所带来的附加值。[26] 在国际层面，这使得将志愿人员工作纳入官方统计成为可能（另见第 3 章）。[27] 尽管这些定量方法对于确定规模至关重要，但它们往往无法捕捉到志愿服务在品质、动机和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对于全面理解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至关重要。仅依赖这种方法可能会将志愿服务降格为有偿劳动的简单替代品，从而忽视其对社会凝聚力和个人幸福感的独特贡献。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统计数据和合计数据对于理解志愿服务的广泛模式仍然至关重要。例如，全国调查数据可用于追踪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并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模式。墨西哥开展的 “ 全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巴拿马代表处的性别暴力与保护专家 Johanna Tejada Lopez 来自哥伦比亚，她为移民妇女和女童创造安全空间并提供关怀，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领导性别暴力风险缓解和幸存者支持工作。*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由特别志愿人员基金资助的阿塞拜疆国家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专家 Jamila Mammadli 为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的协调工作提供支持。*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团结与志愿行动调查”通过揭示志愿服务的范围，挑战关于其经济价值和社会维度的传统假设，改变了该国对志愿服务的理解（见案例研究专栏 2.1）。

其他大规模调查，如 2018 年至 2024 年间分四轮进行的中国公民参与调查 (CPCS)，发现公民受教育年限越长，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就越高。[30] 同样，AmeriCorps 公民参与和志愿服务 (CEV) 调查作为美国现时人口调查 (U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的补充，[31] 每两年开展一次并被纳入联邦统计数据中。它提供的全国性数据可作为制定政策的信息参考，并可揭示相关趋势，如正式志愿服务反弹以及非正式互助行为增加等。[32] 俄罗斯政府通过联邦国家统计局 (ROSSTAT) 管理的两个来源追踪志愿人员数据：其一是自 2016 年以来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方法编制的官方劳动统计数据，其二是面向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的年度调查；经济发展部将这些数据整合成《俄罗斯联邦志愿服务发展年度报告》，目前已有 2017 年至 2023 年的报告。[33] 因此，大规模调查可以为政府政策提供主要循证基础，为公众舆论提供信息参考，并对志愿服务实践产生影响。定量数据可以为政策工作提供可获取的信息，往往能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例如，作为其 2023 年国家志愿人员政策的一部分，[34] 孟加拉国政府参考了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调查中的模块数据，以及该国飓风防备计划中记录的可衡量的志愿人员参与数据。

多个针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资助计划，如欧盟伊拉斯谟 + 计划等，允许将志愿者工作时间计入共同资助。[35] 这种做法展示了标准化衡量模块直接倡导的力量 —— 组织可将其用于招募志愿者开展倡导工作：所有公共或私人资助者都可允许接受志愿者工作时间并将其作为实物资助。对志愿者工作时间进行估值，也已成为一些非营利机构社会核算中的标准要素。尽管这项工具的使用仍然有限，但扩展增值报表可用作组织年度财务报表的补充。它对志愿者贡献赋予经济价值，让人看到其在组织创造的整体价值中发挥的作用。[36]

专栏 2.1. 对墨西哥志愿服务的纵向衡量 [28]

对志愿服务进行长期衡量，能为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慈善家提供政策、方案设计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信息，同时也能鼓励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墨西哥的全国团结与志愿行动调查（ENSAV）是一项开创性的全国性家庭调查，它追踪了志愿服务的长期模式和变化。自 2005 年以来，墨西哥民间社会研究中心 (CIESC) 发布的四份报告都收集了 1600 多份回复。这项调查填补了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数据空白，因为在该国家和地区，无偿活动和非正式帮助行为有时不被视为志愿服务。

继发布首份报告后，主办方对调查内容进行了审查和调整。诸如“你是否参与志愿服务？”等宽泛的问题被替换为涵盖 23 种参与类型的基于活动的询问，其中排除了家庭责任。调查内容现在涵盖的活动示例包括宗教和社区活动、学校志愿服务、体育教练以及为当地基础设施提供熟练劳动力等。报告的小时数被换算为每天工作八小时，并按最低工资标准折算成具体金额，同时根据熟练程度灵活调整。这些经济估测数据被纳入墨西哥国家统计局 (INEGI) 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且可在网上查阅数据库。[29]

这项调查的范围超出了个人志愿服务，还包括企业志愿服务、现金和实物捐赠，并记录了年龄、性别、收入和团体参与等社会人口因素。其调查结果挑战了对于墨西哥志愿服务的传统认知，例如认为志愿者主要是女性或退休人员，而实际上显示出性别相当的参与比例，并且该国最活跃的志愿者群体年龄在 35 至 50 岁之间。调查还突出了新的参与形式，包括在线志愿服务、偶尔参与以及教育中的服务学习。

虽然此类衡量方法能够产生关于参与比率的可比统计数据，如参与志愿服务的个人数量及其贡献的小时数，但它们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志愿服务的实际经历。约旦最近采取的一项举措显示，国家框架可以将经济价值与衡量志愿者影响的更广泛指标相结合，超越以投入为重点的衡量方法（见案例研究专栏 2.2）。

科技拓展了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可能性，尤其是通过实时或大规模数据收集。例如，智能手机、可穿戴传感器和数字应用程序使志愿者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和国界，实时收集大规模数据。多年来，从公民科学的角度进行志愿服务衡量，即公民积极参与数据收集、分析和解释，扩大了可用证据的范围。例如，这种公民参与在美国通过志愿服务为环境变化提供支持，[39] 在阿富汗提供了社区驱动的实时数据反馈。[40] 数字平台还为收集志愿者人数和志愿服务时间等数据提供了经济高效的机会。在中国，超过 90% 的组织在招募志愿者时使用在线管理系统，提高了数据收集的效率和机会。[41] 但是，这种向在线平台的转变往往只能捕捉已经正式化、结构化且易于监控的内容，可能会忽视未记录的社区志愿服务形式。数字素养方面的挑战也可能影响世界不同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对数字工具和平台的使用。这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以实现数字技术在追踪地方和国家层面各类志愿者贡献方面的潜力，包括通过参与式方法，在确定衡量内容时优先考虑志愿者的见解。

专栏 2.2. 通过一个综合协作框架衡量志愿活动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37]

在约旦，王储基金会通过与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民间社会部门磋商，制定了国家志愿服务影响力评估框架，旨在提供一种统一、可扩展且符合情境的方法来衡量志愿者在该国的贡献。该框架纳入变革理论，并借鉴了国家志愿服务和青年参与平台（Nahno）[38] 的结构化数据以及全国调查的结果。这一方法旨在指导国家开展连贯一致的评估工作，以增强志愿行动的整体影响，同时支持确定指标，衡量国家层面的成果和影响。

变革理论展示了志愿服务活动对可衡量的社会和经济成果所做的贡献，包括生活质量、劳动力准备度、技能发展、公民参与和经济生产力等。变革理论为评估志愿服务的影响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体系，为在个人、社区和国家层面理解志愿服务提供了循证方法。它将志愿者参与情况与就业和公民参与等成果联系起来，量化了志愿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这些见解被纳入国家就业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和战略中，从而加强了国家利用志愿服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影响力评估框架还涵盖了多种衡量模型，包括经济估值、纵向调查和定性分析，并提出影响力评级模型，在数据解释方面实现一定的灵活性。将这些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使国家框架能够同时捕捉即时结果和长期影响，将结构化数据收集和比较分析整合到一个全面的衡量系统中。

图 2.1. 志愿人员衡量工作的规模

	衡量范围		
	国家层面	**方案层面**	**组织层面**
志愿活动组织者			
志愿协会		•	•
非营利机构		•	•
教育机构		•	•
企业实体		•	•
公共机构			
政府实体	•		
本地管理员		•	
社区层级的网络		•	
基础设施机构			
统计机构	•	•	•
研究机构	•	•	•
志愿者支持中心	•	•	•

2.2.2. 超越数字：采用参与式和定性方法衡量志愿服务成果

与高度标准化的定量调查不同，志愿者、组织、倡导者和研究人员通常通过深入的定性和叙事性研究来报告志愿活动的价值和影响。定性方法对于分析志愿服务的无形影响特别有用，能够提供丰富且具有情境针对性的见解，从而加深对全球志愿者努力所产生影响的了解。但是，在缺乏共同参考框架的情况下，孤立的经历难以标准化并进行比较，政策领域也低估了展示这些志愿服务经历价值的潜力。

心理学、公共卫生、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公共政策、人文地理学和发展研究等多学科领域的稿件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志愿服务及其意义、维度和贡献，包括少数群体的视角

和不同的世界观。在各个层面运作的组织通过实践、实验以及根据各自当地政策和文化背景调整衡量方法，引领了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发展。各类机构在履行其使命的过程中，收集关于志愿活动及其影响的证据。例如，志愿服务组织是为了向其利益攸关方报告并改进其运营；公共机构收集证据以更好地了解其服务对象；统计机构和研究机构等机构收集数据以支持不同利益群体在志愿服务和发展领域的作用。这些多样化的数据来源生成于多个层面（见图 2.1），包括国家层面，通过调查和其他类型的更广泛研究；方案层面，涉及特定的服务、项目或地区；以及组织层面，一般是通过年度报告或基于成果的报告。综合来看，这些不同层面的详细衡量报告形成了一个丰富的衡量工作实践和成果库。但是，由于缺乏总体上可比较的参考框架，这些衡量报告在宣传中的潜在用途往往受到限制。本报告提出的 GIVE 指数框架有助于弥合这一差距**（见第 7 章）**。

这些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多样化努力，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志愿服务网络，是了解志愿服务对可持续发展贡献的有力信息来源。例如，菲律宾政府在评估其“信息与发展援助志愿者计划”（VIDA）时，采用了公共价值框架。这一概念框架通过将政府绩效与公共利益相统一，来衡量公共倡议如何为社会创造价值。“信息与发展援助志愿者计划”的评估工作利用这一框架，[42] 通过采用基于社区的合作模式，分析志愿者的贡献与当地发展成果、方案管理效果和建立信任之间的关系，从而评估其对合作伙伴机构、社区和志愿者本身的影响。[43] 通过这种方式，它涵盖了志愿服务贡献的不同维度，并将其整合在一起，以更好地理解和衡量价值。再举一个例子，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的公民社会与非营利部门研究中心自 2008 年以来一直在衡量公民参与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的情况，以了解他们帮助他人的意愿，识别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并探索非营利组织在组织志愿者活动中的作用。[44]

专栏 2.3. 谁的视角？360 度全方位衡量志愿服务的影响 [45]

志愿人员衡量不仅仅是收集证据而已。它有助于巩固关系，增进彼此尊重，并支持从片面的援助叙事（将人们划分为施予者或接受者）向其他叙事转变。整合志愿者、合作组织和社区成员的观点，是评估志愿服务全面影响的关键。海外志愿服务（VSA）组织采用的 360 度全方位方法使用工具综合其志愿者在亚太地区工作地所有相关利益群体的定量和定性数据。

海外志愿服务组织在设计这一衡量系统时，借鉴了多个关键研究框架，[46] 以及关于将国际志愿者重新定位为发展中的共同学习者所具价值的研究结果。这一转变催生了新的报告机制，用于追踪不同群体在技能、能力和发展成果方面的变化。自我评估工具综合使用数字评分和志愿者及合作伙伴组织的反馈，后者以五点量表形式聚焦多个关键指标。例如，志愿者针对其对国际发展的理解打分，对应方及合作伙伴组织则对其组织能力（如向社区提供高质量服务和方案的能力）打分。志愿者还在正式的职业发展会议后提交评估报告。活动结束后，整理后的数据将反馈给利益攸关方。

在任务执行的关键节点使用这些工具能让组织追踪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发生变化的方式和对象。这有助于揭示长期成长情况，如组织发展以及合作伙伴和志愿者技能或信心提升，同时也能揭示需要应对的挑战。

植根于太平洋文化习俗的参与式数据收集工具，如汤加的“塔拉诺阿”（Talanoa）和瓦努阿图的 storian 交流方式，让合作伙伴组织和社区成员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讲故事，进而衡量志愿服务的影响。结果显示，志愿服务间接改善了当地社区的服务和机会，同时加强了关系并构建了公共外交。

智能手机、可穿戴传感器和数字应用程序使志愿者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和国界，实时收集大规模数据。

直接参与其所服务事业的志愿者和社区是专业知识的重要来源。缺了他们的意见，衡量工作可能会遗漏重要且常被忽视的志愿服务贡献和经历（见案例研究专栏 2.3）。

印度尼西亚的“自主学习，自由校园”（Merdeka Belajar Kampus Merdeka）项目是支持高等教育与职场之间过渡的一项倡议，对项目志愿者反馈进行的定性分析提供了关于其促进社会责任、全球学习和技能发展的有力证据。它不仅衡量了项目参与率，还收集了志愿者对于在适应、资源以及平衡学业与志愿服务方面所面临挑战的看法。[47]

叙事方法将直接参与者的书面和视觉叙事视为通过志愿服务实现变革的证据，将志愿服务纳入更广泛的发展工作背景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孟加拉国的“志愿者故事”平台收集了来自不同领域 500 多名志愿者的叙述并创建了一个资源库，记录了他们的贡献并激励进一步参与（另见第 6 章案例研究专栏 6.2）。[48] 在分享故事时也能在情感层面吸引受众，激发进一步的行动。

“最显著变化”方法采用结构化叙事，[49] 并已在许多国家得到应用，以更好地理解志愿服务的影响。瑞士国际志愿者合作平台 Unité 采用了这一策略，评估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志愿者发展活动的效果。[50] 参与者从自身角度分享显著变化的故事，通过他们的回答，组织可以了解志愿服务的成果，并洞察利益攸关方在变革过程中的价值取向。[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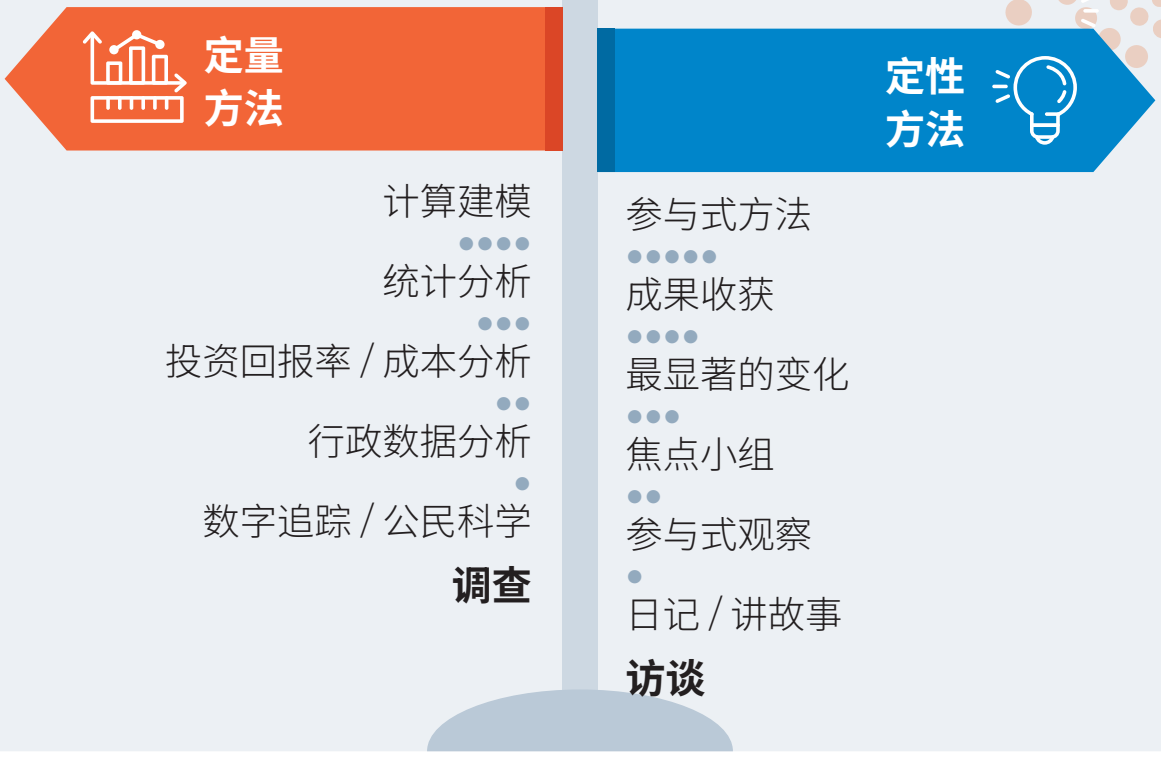
民族志观察，包括参与式观察，有助于在评估志愿服务和发展时更好地理解权力和话语权问题，布隆迪、菲律宾和塞拉利昂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52] 在意大利，这种方法被用于对卫生专业人员和志愿者进行研究，以考察护理、抵抗力及其对服务用户和志愿者（尤其是为难民和移民提供护理服务的人员）的影响（另见第 5 章案例研究专栏 5.2）。[53] 这种方法能够确保洞悉权力关系塑造志愿服务经历和影响的途径。

成果收获法也是一种评估方法，由“收获者”起草关于成果的描述，从信息提供者处收集数据，并与独立验证者合作。[54] 在志愿服务背景下，该方法可用于识别志愿者贡献和方案要素如何塑造成果，从而评估转型变革。[55] 加拿大团结联盟合作组织（SUCO）在其跨越八个国家的志愿合作方案中应用了这一方法，为当地合作伙伴提供支持。[56] 由于成果收获法侧重于贡献而非归因，因此在评估复杂环境中的志愿者倡议时特别有用，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活动和计划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定性和参与式方法的一个关键挑战在于其情境特异性。尽管扩大规模并确保可比性并非易事，但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和框架，就有可能汇集证据并产生更广泛的见解，同时保持与当地的相关性。哈萨克斯坦国家志愿者网络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系统，将年度定量数据收集与故事收集相结合。[57] 综合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志愿服务在国家和国际活动中的价值。

志愿组织和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采用参与式和定性方法。这些方法从一开始就融入了社区的流程、观点和需求，并与定量方法的进步相结合，继续以反映现实生活经历的方式塑造和拓展志愿服务衡量标准。第 4 章通过若干实例说明了将这些定性和参与式工具应用到

图 2.2. 衡量工具和方法库



衡量个人层面的健康、幸福感和就业能力成果。这些例子展示了定性描述如何整合或替代标准化的衡工量值式方法，而它们往往被政策制定者和资助者低估，甚至被视为逸闻趣事或“非循证”结果。

2.3. 衡量工作的多个不同目的

从过去情况来看，由于全球北方机构的推动，研究重点一直放在经济维度和正式志愿服务上，这造成了已知的显著差异。作为回应，近年来，研究人员和国际网络齐心协力，通过促进收集非正式行动的数据、在全球南方开展研究以及倡导参与式评估，以期逐渐抵消这种偏见。

关于衡量方法的讨论进展推动了定量和定性方法的融合。[58] 在公共政策和管理方法中，定量衡量方法特别适合且高度精炼，可用于确定志愿服务在公共服务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相比之下，定性方法能够捕捉志愿服务对于塑造社区、发展基于信任的关系、改变生活以及吸取经验教训的作用。这两种传统方法都在不断扩展技术和标准化数字工具的范畴，都能在参与式方式中用于收集和生成证据，确定衡量目标以及讨论和使用结果。在这一广泛的范畴内（见图 2.2），对衡量工具和流程的选择取决于工作者的资源和目标。找到正确的方法平衡点需要明确衡量工作的目的。

重要的是，衡量工作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使志愿服务的成果得以

“我的工作最让人满足的一点是放大女性志愿者的声音。在援助机构离开很久之后，社区志愿者 — 其中大多数是女性 — 继续提供照护服务，领导恢复工作，并将社区凝聚在一起。然而，她们的贡献往往被忽视。我认为我的职责是确保这些女性不仅得到认可，还要让她们领导自己的社区，主宰自己的生活。

Kudakwashe Sigobodhla，联合国妇女署驻津巴布韦的联合国志愿应急响应官员

显现和受到重视的一种手段。我们不应假定执行衡量工作的人所持观点是完全客观或普遍有效的。只有以透明的方式使用方法，并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组织背景，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这一点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这一原则既适用于统计式定量方法，也适用于定性和参与式方法。它同样适用于衡量工作的结果：公开分享证据并接受批判性审查有助于增加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价值。

2.3.1. 了解组织需求和能力

大多数组织出于实际目的衡量志愿服务，通常作为内部评估和研究的一部分，以更好地了解志愿者的工作条件、取得的成果以及产生的影响。一些组织还将投入的资源（如工资和工时）转换为成本。关注背景和不同的核算单位（如志愿服务所花费的时间或志愿者所开展的活动），有助于明确这些因素如何促进或阻碍志愿者的积极性及留存率。反过来，这些发现可以改善组织绩效，提升志愿者和社区的成果，同时激励其他人采取行动。

志愿者参与指数（IVE）是由美国志愿队（AmeriCorps）及其合作伙伴开发的一种基于研究的自我评估工具，旨在衡量和提升北美各组织的志愿者参与度。[59] 来自 200 多个组织的数据揭示了志愿者管理实践、组织能力以及志愿者贡献的经济价值等方面的见解。志愿者参与指数（IVE）不仅评估当前的志愿者参与情况，还指导方案改进和培训工作。评估结果用于方案规划和组织发展，表明志愿者的意见可以同时促进不同层面的衡量工作。

在组织、方案和社区层面，志愿服务的贡献往往通过与公共和私人资金挂钩的强制性报告来进行衡量。关于展示志愿服务影响、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努力主要由国际组织和捐助者推动，传统上会逐级下放到招募志愿者的地方行政机构和服务提供机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文化多元视角正在探索志愿者的动机、对志愿者自身的影响以及志愿服务对建设更强大社区的贡献 —— 如果主要通过治理和行政框架来核算志愿服务，则可能忽视这些方面。[60]

资助者驱动的评估实践的一大贡献在于，它有助于提升组织的能力，使组织能够吸引志愿者参与设计和批判性反思其干预措施。这有助于明确结果，并将关注点从单纯追踪活动和产出转移到其他方面。除了正式和强制性的报告程序外，这些结果还可以为与受益者和决策者的讨论提供信息，强调志愿行动的长期社会影响。

对方案和干预措施进行有效的衡量意味着要确保全面聆听志愿者与工作人员、公职人员和社区代表的意见。若排除志愿者的声音，可能会削弱关于干预措施作用方式和原因的解读；如果无法准确计算志愿者的贡献，可能会扭曲真实的实施成本。例如，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开发的“能力建设项目评估”(eCAP) 中，[61] 尽管志愿者在危机情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他们并未被明确纳入其中。这可能会无法全面反映全球健康行动的全貌，尤其是当志愿者已在之前未被察觉的领域发挥作用时。[62] 提高组织和方案衡量志愿者贡献的能力，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这一讨论提供了明确的机会。

认识到志愿服务是一种发挥关怀和社会影响作用的形式，突显了我们需要工具来捕捉志愿服务对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定性影响。例如，世界童军组织发起的“童军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不仅通过服务小时数和覆盖范围等定量数据来衡量志愿者的影响，还通过满意度、角色清晰度、动机、包容性和情感联系等定性指标来衡量[63]（另见第 5 章案例研究专栏 5.4）。[64] 再看另一个案例，一项调查使用结构化问卷对在韩国和美国的韩国籍（裔）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65] 结果显示，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和态度）和社会资源（如社会支持和网络）仅对移民群体而言是影响志愿服务的强预测因素，而在同时涵盖移民和非移民群体的结果中，教育和经济状况是决定因素。

总价值模型说明了综合法衡量如何帮助组织了解其需求和能力，同时捕捉到企业志愿服务对员工、公司和社区的全部价值（见案例研究专栏 2.4）。

2.3.2. 利用结果开展学习和问责

有效的志愿服务衡量流程包括数据生成、记录、分析、报告和使用的完整周期，无论是对于大型国际研究还是单个志愿组织而言，都必须据此进行设计和管理。通过多种方法收集的志愿服务相关证据有助于根据不同的受众和目的定制信息传递方式（见表 2.3）。

数据分析并不是衡量工作的终点 —— 只有当分享、讨论结果并将其付诸行动时，才真正体现了衡量工作的意义。政策制定者、资助者、合作伙伴和支持者、公民以及志愿者都可能是志愿者衡量数据的受众，他们对这些数据的需求也并非一成不变。他们也是重要的利益群体，可以为志愿服务衡量过程做出宝贵贡献。将利益攸关方纳入的共同设计和共同管理原则既适用于衡量方法，也适用于方案规划。在这一过程中，目标群体和社区的志愿者和关键信息提供者的声音至关重要。

专栏 2.4. 总价值模型：在实践中通过衡量工作理解企业志愿服务方案的价值[66]

有效衡量企业志愿服务方案的价值，意味着不仅要关注参与率，还要深入理解它们对员工敬业度、组织成果和当地社区的影响。由 Voluntare（一个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推广企业志愿服务的网络）实施的总价值模型[67] 综合了定量和定性维度，以更深入了解志愿服务如何促进员工经历、幸福感、个人和职业发展、职场文化、企业目标以及社会影响。

结构化调查提供了可量化的证据（例如，员工群体的参与度、志愿服务时长以及志愿服务前后的趋势）。这使得公司能够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衡量志愿服务的投资回报，并将其与员工留任率和生产力联系起来。访谈揭示了员工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志愿服务经历对增强其归属感、使命感和领导能力的作用，以及志愿服务为公司和社区带来的效益。这种混合方法将数据转化为对组织的深入见解。该研究还包含了具体的志愿服务倡议实例，明确了其中的行为体、活动以及对社会和组织的影响。结果显示，社区福祉和技能转移得到了提升，这为投资志愿者项目的决策提供了有力证据。

来自总价值模型的证据突显了三个组织层面的效益：增强对志愿活动的内部认可、与企业目标（如员工留任、领导力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相契合，以及与社区需求在战略上保持一致。在将组织层面的衡量工作作为与当地民众、目标和挑战互动的一部分时，它有助于转变观念，将志愿活动视为参与度、凝聚力、生产力和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进而转化为核心业务战略。

要想找到正确的方法平衡点，必须明确研究的目的。

表 2.3. 在衡量工作周期的不同阶段融入参与式方法

衡量工作所处阶段	合作对象	参与式方法举例	附加价值
全周期	所有利益群体	参与式行动研究	在整个过程中加强主人翁精神、责任感和持续参与度
共同设计	社区成员、志愿者、组织工作人员、合作伙伴、政策制定者	设计思维工作坊	确保提供以用户为中心、与情境相关的衡量解决方案
数据收集	社区成员、志愿者、组织工作人员	照片语音	使参与者能够塑造叙事，并直接为证据生成做出贡献
数据分析	社区成员、志愿者、组织工作人员	学习圈子	揭示了分析中常被忽略的本地见解和隐性知识
数据使用	政策制定者、志愿者、社区	意义构建会议	建立共识，并确定集体行动或政策应对措施

例如，坦桑尼亚海外志愿服务组织（VSO Tanzania）使用的“衡量学习与赋能影响力”框架采用了前向问责制，这种参与式方法让主要行为体、合作伙伴、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共同评估志愿服务的影响，强调共同责任和持续学习以改善未来成果。参与者通过共同学习和学习圈子，解读数据、增进理解并为决策提供信息。该框架已被应用于确定志愿者对青年发展的贡献。[68] 参与式方法日益被视为纳入、赋能和展示志愿服务独特性质的一项附加衡量工具。在英国，Teams and Dunston Alive (TADA) 倡议是一个由志愿者主导的系统变革项目，位于该国最贫困地区之一，侧重于通过志愿服务建立的关系来了解需求并创造安全空间。通过倾听、信任和互惠，动员社区成员和志愿者开展衡量工作，从而制定自下而上的策略来记录在当地的影响。[69]

衡量这些方面有助于生成可靠的数据，不仅可用于支持方案目标，而且加强了公众对志愿服务在简单危机应对之外对社会凝聚力所作贡献的认识（另见第 6 章）。随着全球政策和社会科学日益倾向于采用更具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方法来理解志愿服务与发展，通过多种方法得出的衡量工作的价值变得愈加清晰。

捕捉志愿服务中非一次性活动的特征，可以揭示志愿组织如何逐渐开辟一条通往可持续性的道路，从而增强个人和社区的韧性。这也可以唤起相关各方对志愿服务衡量工作过程的主人翁意识。在约旦，“ 我们爱阅读 ” 社区志愿者方案采用参与式 “ 模糊认知图法 ” 邀请叙利亚和约旦妇女参与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结果显示志愿服务对不同赋能维度（如文化、财务和心理）以及生活满意度提升的影响。[70] 在解释通过定性方法得出的衡量结果时，严格记录并透明报告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和程序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衡量模块可以在不同时间及不同空间和背景下进行复制，确保即使是小型的地方性活动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

从能力角度衡量志愿服务表明，个人资源（如人力、社会和经济资本）以及更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背景都会影响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能力。基于欧洲的数据，一些研究强调了支持性政策对于增强这些能力并扩大志愿服务范围的作用。[71] 目前，在全球政策领域，多方正在推动制定衡量和指导志愿服务卓越性的标准，以形成全球化标准，促进有影响和负责任的志愿服务并取得可衡量成果。[72] 然而，由于这些举措都不具有强制性，只有少数国家支持结构化的衡量方案，导致缩小了比较的范围。

2.4.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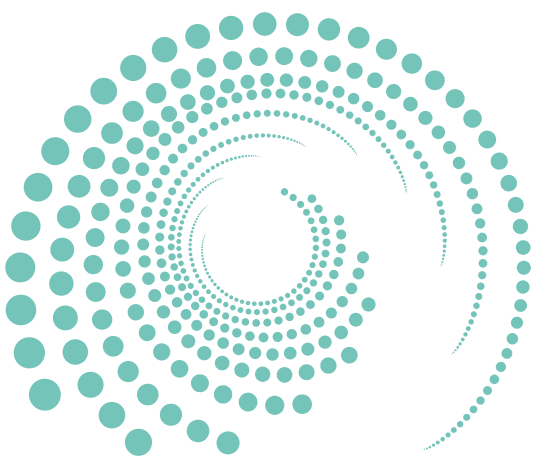
志愿服务衡量工作已从关注投入、经济价值和统计式衡量，发展到涵盖更大范围的志愿服务成果和影响。这与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引领的将关于幸福感和进步的衡量指标扩展到 GDP 之外的更广泛运动相契合。[73]

参与衡量志愿服务的人员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大学和统计局外，民间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和志愿者本身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评估志愿服务的价值、影响和贡献的工作中来。这些行为体利用其独特的优势，各自发挥特定的作用。统计和研究机构可以构建共享框架，制定有用的指标和方法指南，供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数据生产者使用。政府和国际机构可以将操作标准制度化，维持和推广基层衡量工作。国际志愿服务网络和志愿者支持中心可以促进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识别全球新兴趋势。志愿者及其所属组织不仅可以塑造衡量工作的过程，还可以利用衡量工作的结果来改进政策和实践。

志愿服务衡量工作方面的创新正在催生出契合当地情境和需求的方法。技术和数字工具，包括人工智能和公民科学，将在志愿服务衡量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数字鸿沟仍然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地区，但环境监测、社会生态和数字社区报告等方法 [74] 表明，创新可以扩大证据基础，提高志愿者贡献的可见性。数字叙事展示了低资源方法如何继续为未来志愿服务和发展的宣传工作提供证据。



联合国国家青年志愿者 Lina Toubasi 是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巴勒斯坦国拉马拉的人道主义外勤支助助理，她与社区和弱势群体合作，评估他们的需求并制定应对计划。*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



对志愿者工作的全球估测

关键信息

- **根据新的数据收集工作和先进衡量工具的估测结果，全球约有 34.5% 的劳动年龄人口（即 21 亿人）每月参与志愿工作。**这使我们对全球志愿服务参与的规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 **非洲的每月志愿工作参与率最高，**该地区 58.5% 的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志愿工作活动。
- **据估计，男性参与志愿工作的比率高于女性，**尤其是在女性参与家庭以外活动机会较少的地区。但是，在更广泛的志愿工作中，存在更大的性别差异模式。
- **大多数志愿工作仍直接进行，而非通过组织进行。**全球范围内，估计有 25% 的劳动年龄人口直接参与志愿工作，相比之下，只有 11.7% 的人参与基于基于组织的志愿工作。
- 展望未来，能否就志愿者工作比率生成**新的可比性估测数据将极大取决于能否持续并改进对**全球志愿者工作参与度的衡量。

3.1. 引言

我们对志愿工作的全球规模、性质和影响的理解仍然有限。关键问题仍然在于参与志愿工作的人数以及方式等等。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可靠、可比且及时的数据。这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活动，更是一种战略需要。新冠肺炎疫情清楚表明，当正式系统紧张或缺失时，社区依靠非正式志愿网络来维持生存和获得支持。[75]

志愿服务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它被公认为是落实整个议程的一项强大手段，且贯穿了各个领域。新的估测数据为倡导将志愿服务更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自愿国别评估提供了急需的基线结果。志愿服务的贡献往往被低估且报道不足。

本章基于以往的举措，提供了全球和区域层面志愿服务参与情况的新估测数据。尽管在国家层面衡量志愿者工作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特定时期内估测全球志愿者总数仍是一项复杂任务。如本报告其他章节所述，志愿者工作形式多样，涵盖广泛的活动和方式，从有组织的参与活动到自发的团结行为。其形式因当地背景、文化传统、治理结构和资源可用性而异。因此，关于何为志愿者工作并无普遍共识，且各国对志愿服务的定义往往各不相同**（见第 2 章）**。这些挑战可能影响国民账户和劳动统计数据在反映志愿服务程度方面的准确性。

如第 1 章所述，《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采用了一种宽泛的方法，遵循联合国大会在 2001 年对其的定义，即“志愿服务指自愿开展的一系列广泛活动，包括传统形式的互助和自助、正式服务提供以及其他形式的公民参与，其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利益，且金钱奖励并非主要激励因素。”[76] 此定义作为本报告**（见第 1 章）**的总框架和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见第 7 章）**的指导原则。它涵盖了更广泛的公益活动，以更好地体现公民参与和互助精神，同时也认识到在理解志愿服务时情境差异的重要性。

为了进行全球估测，本章采用了第 19 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对志愿工作的统计定义，该定义比联合国大会的定义内涵更窄（有关志愿工作定义的更多详情，请参见专栏 3.1）。根据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的定义，“从事志愿工作的人是指在一段较短的参考期内，从事任何无偿、非强制性活动，并为他人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劳动年龄人口。”[77] 本章包含的估测结果限制在此定义范围内，不涵盖参与任何其他形式的志愿服务，这对于统计目的而言十分重要。

专栏 3.1. 志愿者工作的含义

志愿者工作只是 2001 年第 A/RES/56/38 号决议中所定义的志愿服务的一种类型。它与其他形式的志愿服务（如公民参与）不同，仅指被认定为工作或生产性的活动。这些活动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进行，都会产生商品或提供服务。

本质上具有个人性质（即无法归属于他人）的人类活动不被认为属于工作范畴，因此也不被归类为志愿者工作。自愿性质的非工作活动包括抗议、抵制、罢工和献血等。

但是，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所述，如果这些活动是“出于自愿，为了公众利益，且不以金钱奖励为主要动机”，则可将其归类为志愿服务。

专栏 3.2. 基于组织的志愿者工作和直接志愿者工作

基于组织的志愿者工作是指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可以是非营利组织、私营公司、公共机构、社区、互助团体）提供的志愿者工作，或为这些组织提供志愿者工作。直接志愿者工作则是指直接为他人提供而不受组织管理的志愿者工作，如帮助邻居或朋友。区分这两种形式的志愿者工作对于分析参与趋势和制定支持各种形式志愿服务的政策至关重要。

本章所列的全球估测数据仅指参与志愿工作，并不涵盖参与任何其他形式的志愿服务。本章对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志愿者比率进行了量化 —— 志愿者比率定义为在特定时期内从事过任何类型志愿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15 岁或以上）所占的比例。

此外，鉴于志愿工作既包括通过组织进行的各项活动（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也包括个人在组织外自行开展的行动（直接志愿服务）—— 见专栏 3.2—— 本章将估测这两种志愿工作的普及程度，以揭示全球各国的本土环境如何塑造志愿工作的性质。

本章其余部分将介绍关于志愿者工作的现有数据以及估测全球和区域志愿服务比率的方法。本章还将进一步列出关于世界各地及不同区域劳动年龄人口中志愿者的比例和数量的最新估测数据。在本章确定了志愿工作的规模之后，后续章节将深入探讨统计指标未能完全捕捉的潜在动态。本报告后续章节将重点关注具体情境中的志愿服务衡量工作，探讨其多种形式、贡献和影响，以及在全球面临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危机之际，志愿服务可发挥的作用。

3.2. 关于志愿者工作的现有数据

我们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关于志愿工作的可靠估测数据，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a) 数据不足且采集不连续

从全球来看，自 2008 年以来，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193 个联合国会员国中的 64 个）通过国家统计数据对志愿工作进行了衡量（见图 3.1）。这些国家主要是高收入国家。即使是开展了衡量工作的国家，其数据也不连续，在 2008 年至 2023 年间，每个国家平均仅有两批记录。为了弥补这一显著空白，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于 2021 年和 2025 年对志愿工作进行了两次特别调查。[78]

图 3.1. 已开展志愿者工作国家统计衡量的国家图谱 / 名单

国家					
阿鲁巴	塞浦路斯	危地马拉	卢森堡	波兰	瑞典
亚美尼亚	捷克	克罗地亚	拉脱维亚	葡萄牙	瑞士
澳大利亚	德国	匈牙利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塔吉克斯坦
奥地利	丹麦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	俄罗斯联邦	乌克兰
比利时	爱沙尼亚	爱尔兰	北马其顿	沙特阿拉伯	美利坚合众国
孟加拉国	芬兰	冰岛	马耳他	新加坡	
保加利亚	福克兰群岛 / 马尔维纳斯群岛	以色列	蒙古	塞拉利昂	
巴西		意大利	荷兰	塞尔维亚	
加拿大	法国	日本	挪威	斯洛伐克	
哥伦比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哈萨克斯坦	尼泊尔	斯洛文尼亚	
佛得角		肯尼亚	新西兰	南非	
哥斯达黎加	希腊	韩国	秘鲁	西班牙	
		立陶宛			

b) 数据收集不完整

大多数衡量志愿服务的国家调查仅关注基于组织的志愿工作，而忽视了直接志愿工作，如帮助邻居。在有可用数据的 64 个国家中，仅有 40 个国家提供了关于总体志愿活动的信息。这些遗漏很可能导致低估志愿服务的真实规模。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牵头的 2025 年调查采用了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指导的更全面方法，根据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的定义，捕捉了所有形式的志愿工作，因此得出的志愿服务估测值显著高于许多国家的调查结果。

c) 缺乏数据可比性

各国在定义和衡量方法上的差异给数据可比性造成重大挑战。一个关键问题是用于衡量志愿者参与度的参考期各不相同。虽然第 19 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的定义采用了四周的参考期，但只有约 20% 的国家调查遵循这一标准。其余数据采用一年或一周的参考期时间范围，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复杂的数据统一过程来确保数据之间能够进行有效比较。

“我们在北京迈出的每一步，都与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更大变革息息相关。

Jialin Zhang，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中国区域联合国志愿项目分析师

3.3. 估测志愿者比率

为使全球和区域月度志愿者比率的衡量结果具有可比性，本报告遵循了四个主要步骤：[79]

步骤 1：数据统一

将所有关于志愿者工作的可用数据根据第 19 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的定义统一为通用的四周参考期。这涉及使用简单的调整系数将所有数据转换为四周等效值，使其在相同时间段内具有可比性。

步骤 2：数据验证与筛选

对现有数据进行审查，剔除所有被认为不可靠或与国际定义不符的数据点。若数据存在内部不一致（例如，直接志愿服务比率高于总比率）或因调查方法改变而出现显著断层，则予以排除。在此类情况下，保留最新数据，因为它们通常反映了更优化的衡量做法。

步骤 3：通过建模填补数据空白

对于特定类型的志愿者工作，采用建模方法来填补数据空白。如果调查提供了直接志愿服务或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数据，但没有提供总体志愿服务数据，或者反之，则利用同一国家同一年份调查中的可用信息来估测缺失的数据。

步骤 4：生成国家层面和合计估测数据

采用与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指标方法类似的建模方法，生成了按性别分列的国家层面志愿者比率。[80] 该模型在观测到的志愿者比率与国家特定特征（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本）之间建立起统计关系。[81] 它利用这些关系为没有数据的国家插补缺失的观测值。当没有可用信息时，该模型会使用根据拥有部分数据的国家得出的区域平均值作为基准。

最后，将这些国家层面的估测值汇总，得到区域和全球数据。这些估测值基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4 年修订版》进行了人口加权。为缓解对数据稀疏性的担忧，并平滑年度波动，本章中呈现的最终区域和全球估测值按 2022 年至 2025 年期间的平均值计算。[82]

3.4. 局限性

由于存在的若干局限性可能影响模型估测精度和可比性，请谨慎解读这些模型估测值。

参考期不一致

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在国家层面衡量志愿工作时缺乏一致的参考期。虽然数据统一过程有所帮助，但它依赖于对样本代表性的强假设，而这些假设可能并不完全成立。这一问题突显了全球范围内有必要与第 19 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标准四周参考期保持一致，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关于志愿者工作类型的数据缺失

另一项挑战在于，并非所有国家都收集了直接志愿工作的数据，这往往导致缺乏关于总志愿者比率的信息。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因为仅凭基于组织的志愿者工作数据有时无法准确预测总体志愿者工作的情况。

尽管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近期进行的志愿者调查引入了先进的衡量工具，但这些改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时间序列的中断。采用精细化方法，例如针对不同形式的志愿者工作提出具体问题，能够收集到更细致的数据，并可能导致与以往采用更通用衡量方法的调查相比较，估测出的志愿者比率有所差异（另见第 2 章）。此外，由于许多国家缺乏一致且重复的衡量数据，对长期趋势进行评估构成阻碍，需要在提高单个数据快照的准确性和监测长期发展的能力之间做出权衡。各国有必要投资能够追踪非正式和直接志愿服务的调查工具。在全球南方国家，直接志愿服务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这一点尤为关键。

3.5. 对于全球及区域志愿者比率的新估测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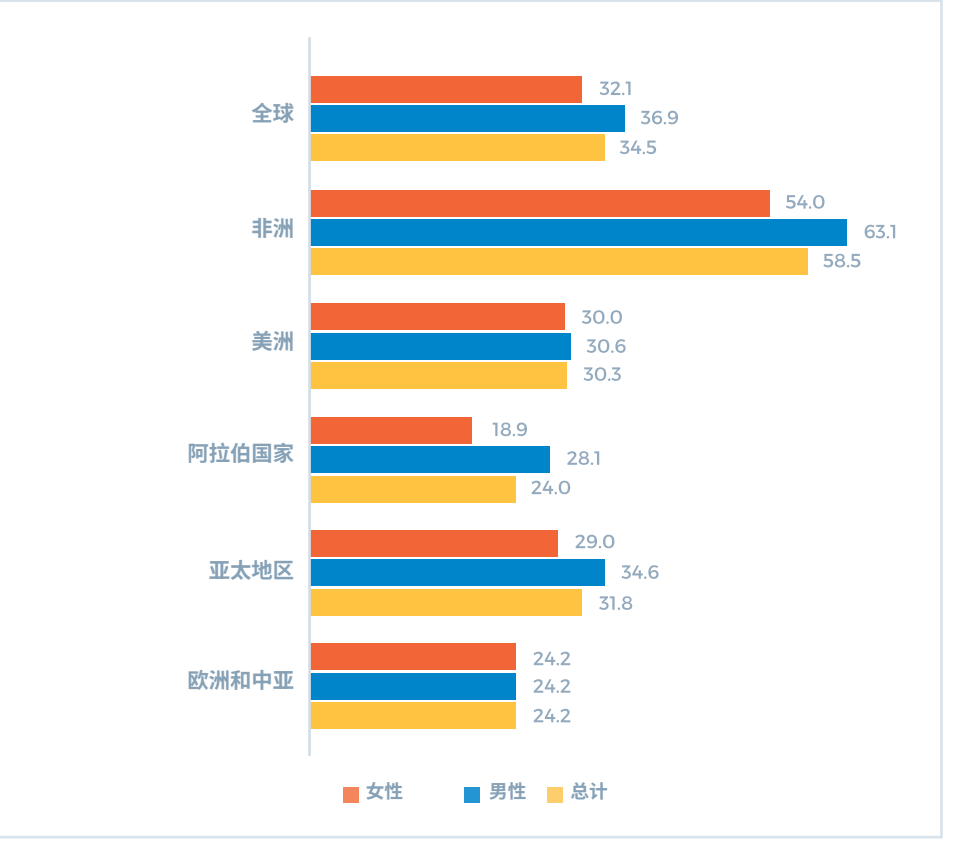
从全球来看，每月志愿者比率为 34.5%，其中男性（36.9%）的志愿服务参与程度略高于女性（32.1%）。[83] 以下分析将按区域细分这一数据，突显了世界各地志愿者参与度的显著差异（见图 3.2）。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照护工作和志愿工作的分布存在性别差异，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这一点已被更广泛的研究证实。[84]

总体而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在四周内参与过志愿活动，但区域模式和性别差异存在显著不同。非洲的参与比率最高，表现尤为突出。非洲志愿者比率估测值较高的部分原因在于，2021 年和 2025 年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调查采用了综合衡量方法，该方法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指导原则，并涵盖了更广泛的志愿者工作。

从各区域志愿者工作参与比率的估测差异来看，非洲的志愿者工作参与比率最高，其劳动年龄人口中有 58.5% 参与这项活动，其中女性占 54%，男性占 63.1%。这突显了志愿者工作在整个非洲大陆社会和社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美洲的参与率为 30.3%，且男女差异很小（女性 30%，男性 30.6%）。

在阿拉伯国家，志愿者比率相对较低，为 24%。这个区域的性别差异更为显著，劳动年龄男性的参与比率为 28.1%，高于女性的 18.9%。亚太地区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志愿者比率为 31.8%，但男性（34.6%）比女性（29.0%）更有可能参与志愿工作。这些差异可能源于多种因素，包括社会文化规范和制度障碍，这些因素往往限制了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欧洲和中亚的志愿者比率相似，均为 24.2%。尽管欧洲整体上没有性别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亚，女性占所有志愿者的 75% 以上。

图 3.2. 按地区和性别统计的总志愿者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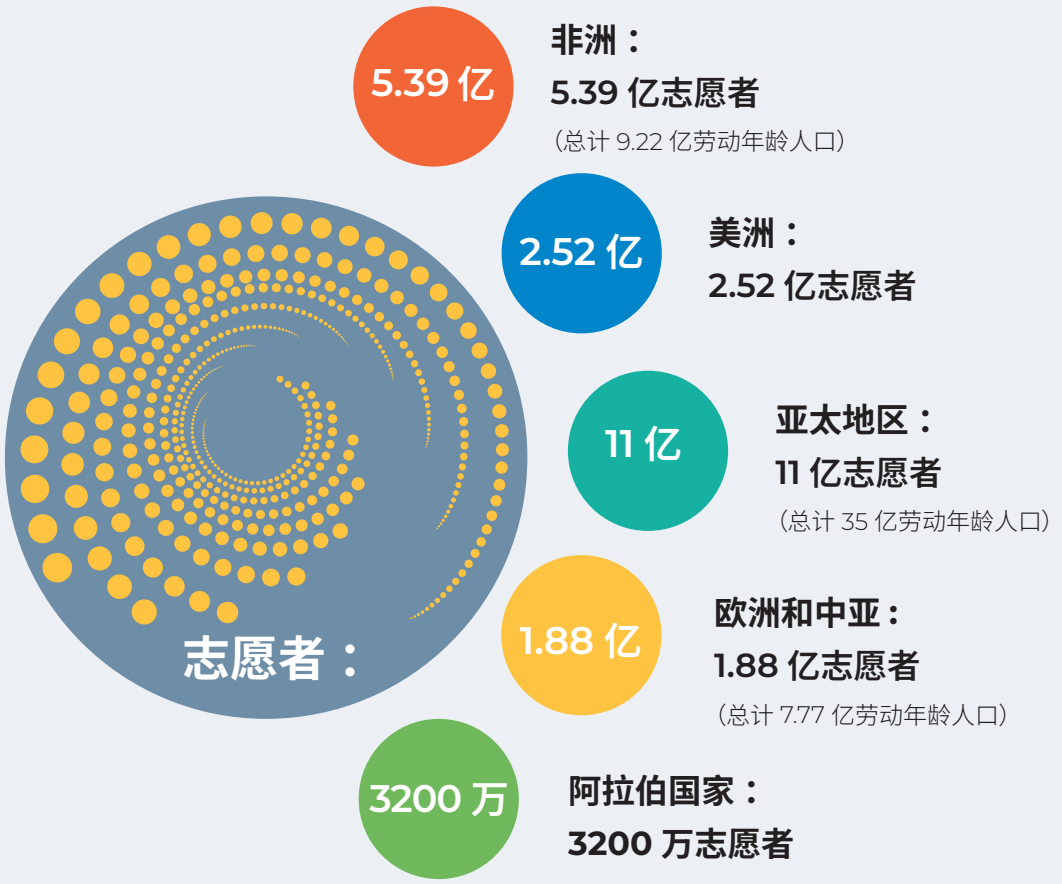


注：根据本章前文所解释的定义，志愿者比率表示在特定地区劳动年龄人口中，估计在一年中任意给定的四周时间内参与志愿者工作的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基于其统计司、2021 年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 盖洛普调查以及 2025 年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当百分比转化为绝对数字时，全球志愿者工作的庞大规模便一目了然。全球劳动年龄人口为 61 亿，34.5% 的志愿者比率意味着每月约有 21 亿人参与志愿服务。其中，约 11 亿人为男性。

3.6. 当前和以往的志愿者比率估测结果

图 3.3. 按区域统计的每月志愿者人数



这些数据表明，有大量人群定期参与志愿服务，突显了志愿服务对各社会和经济体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上述新的全球和区域志愿者比率估测值显著高于《2022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中公布的 14.9% 的全球比率。[85] 但是，这些数值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比例不低，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出现“志愿服务热潮”，而是由于改变衡量方法所致。这也印证了本报告的一个关键信息，即明确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方式及原因对于确保避免误报或滥用数据至关重要（见第 1 章）。

这一显著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纳入了 2025 年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调查的新数据。该调查采用了更完善的衡量方法，并经过专门设计，用于填补人口众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关键数据空白。由于新估测值依赖于这些关键国家的人口加权平均值，因此结果对总体数据产生了强烈影响，导致估测得出全球比率大幅上升。这些结果还对用于估测其他国家比率的区域平均值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非洲等区域尤其显著，因为之前的数据非常有限。

因此，新的全球志愿者参与比率变得更高反映的是衡量标准的变化，未必是志愿服务在现实世界中随时间推移实际增加。虽然自 2022 年以来志愿者工作可能有所增长，但根据现有数据无法确定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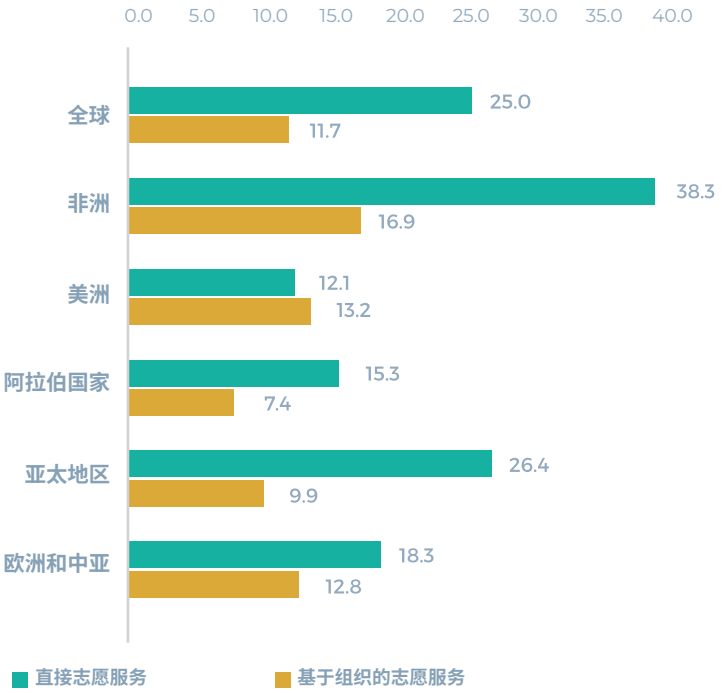
3.7. 按志愿者工作类型划分的志愿者比率估测数据

志愿者比率估测显示，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与直接志愿服务在普及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见图 3.4）。从全球来看，直接志愿者工作的普及程度是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的两倍多，劳动年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参与直接志愿服务，而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参与比率为 11.7%。这一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受全球南方直接志愿服务普及程度的影响，在这些地区，社区互助往往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层面（另见第 4 章和第 5 章）。直接志愿服务与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的比例（2:1）有力表明，对于世界大多数人口而言，韧性和社会资本通过点对点网络横向建立，而非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机构纵向建立。这对发展合作伙伴而言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通过注册的正式组织输送资源并开展能力建设工作，而这样做可能会忽视许多社区中充满活力且值得信赖的公民行动形式。

这一模式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例如，非洲在这两种志愿服务形式上的参与比率双双居首，其中直接志愿服务为 38.3%，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为 16.9%。相比之下，美洲地区的模式对比差距较小，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 (13.2%) 仅略高于直接志愿服务 (12.1%)。这很可能是由于北美地区成熟的非营利部门影响了该地区的平均水平。

阿拉伯国家的直接志愿服务比率（15.3%）和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比率（7.4%）均为最低，与其总体志愿者比率情况一致。与此同时，亚太地区报告称，26.4% 的人参与直接志愿服务，9.9% 的人参与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而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参与比率则相对均衡，直接志愿服务和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的参与比率分别为 18.3% 和 12.6%。

图 3.4. 按地区细分的直接志愿服务和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比率（%）



注：志愿者比率表示在特定地区劳动年龄人口中，估计在一年中任意给定的四周时间内参与志愿者工作的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基于其统计司、2021 年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 盖洛普调查以及 2025 年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出关键结论 —— 尽管非正式志愿服务是全球志愿服务的主要形式，但两种类型之间的平衡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



联合国妇女署的联合国志愿者 Anja Menninger 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营和收容社区支持女性发挥领导作用。由瑞士政府资助。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3.8. 结论：

行动的战略路线图

本章所呈现的调查结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球志愿者工作的参与比率。关键的估测数据 —— **即全球有 21 亿人，或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年龄成年人每月参与志愿工作** —— 意义重大。这展示了全球人类团结的力量。一支专注于社会公益的全球劳动力队伍，是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可再生资源。

然而，尽管志愿服务具有益处，但在经济或社会政策讨论中却鲜少受到关注。本报告后续章节将探讨这一疏漏，强调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幸福感、技能和就业能力以及发展成果（尤其是健康和教育方面）所做贡献的重要性。

这些影响以及参与的规模都要求全球和国家战略做出改变。我们必须正式承认志愿服务，并将其系统纳入国家发展计划、经济记录和社会政策框架中作为优先事项。当前的数据表明，个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贡献自己的时间、技能和精力。

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潜力，志愿者的贡献应纳入国民账户和劳动统计中。在国家层面系统衡量和报告志愿者工作，并记录直接志愿服务，可以避免低估，认可志愿服务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志愿者工作统计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反馈，指出公共服务、医疗保健和社区发展干预措施需要调整的领域。了解志愿服务比率可以帮助政府有效分配资源，并将资金和支持投向志愿服务最具影响的领域。

要想长期保持生成可靠的全球估测数据，需要各国继续定期按照国际统计标准衡量志愿工作的参与情况。特别是，使国家调查和统计系统与第 19 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对志愿者工作的定义保持一致，对于确保不同情境下的准确性、可比性和一致性至关重要。以这种方式加强衡量工作，不仅将提高志愿服务数据和相关估测的质量，还有助于确保志愿者对社会和经济做出的重要贡献得到充分认可，并有效纳入循证决策中。

通过采用这一路线图，全球社会将得以与公民建立一种新框架，承认其作用，支持其倡议，并携手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和有韧性的未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联合国志愿国际助产教育工作者 Selamawit Lake Fanta（左）正在向印度的助产士学员演示孕期检查。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4

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幸福感、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影响

关键信息

- **志愿服务可能同时为个人健康、**幸福感、技能和就业能力带来效益和风险。志愿服务可能对信心、韧性和技能产生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存在压力、排斥和机会不平等的风险。
- **传统衡量方法可能无法全面捕捉志愿服务的地方意义和实际经历。**必须扩大衡量范围，纳入适应性、情境敏感性和包容性的方法，同时考虑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情况。
- **综合不同方法和不同类型的数据，通过将定量数据的规模与定性洞察的深度相结合，**可以加强衡量工作。这样可以同时捕捉广泛的模式以及志愿服务个人经历对健康和就业能力的影响，从而深化衡量工作的洞察力和学习机会。
- **就个人志愿服务的影响得出更强大、更具包容性的数据，**可以支持组织和政府创建更公平的志愿服务途径，确保更多人能够享受到志愿服务的益处。

4.1. 引言

对于个人而言，志愿服务能够提升自信心、韧性和技能，但也可能带来压力、排斥和不平等的经历。要想全面捕捉这些结果，需要采用对文化背景敏感且包容多样化个体经历的衡量方法。[86]

本章将探讨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以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的多重影响。到目前为止，关于个人影响力的多数证据都来自全球北方（包括当地和国际志愿者）的个人经历。[87] 扩大关于如何衡量志愿服务的讨论，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背景下，可以得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志愿服务数据。这些更有力的证据有助于为未来的宣传提供信息参考，指导公平分配资源，并解决志愿者参与人员分布不均以及志愿者从中受益程度不同的问题。

4.2. 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和幸福感的贡献

健康应被理解为全面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幸福感，而不仅仅是未患病。[88] 对于志愿者而言，这种幸福感受到志愿服务行为本身的影响。因此，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的影响，需要评估它如何影响志愿者幸福感的这些方面。

一些研究表明，志愿服务确实有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例如，肯尼亚的社区卫生志愿者系统已被证明能增强志愿者的情绪韧性和目标感。[89] 印度尼西亚也有类似的情况，该国的卫生外联志愿者表示，通过同伴网络增强了自信心。[90]

志愿服务对个人带来的益处，如增强自信心、减少孤独感、提高生活质量，甚至在某些研究中还发现能降低死亡率，[91] 都值得且应该得到肯定。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高压力的角色，如参与人道主义救援，也可能导致过度劳累和心理困扰。[92] 边缘化群体可能面临额外的风险。例如，在印度，来自弱势背景的社区卫生志愿者表示受歧视的经历损害了自己的幸福感；[93] 在英国，残疾志愿者比非残疾志愿者报告自身健康受到负面影响的比例也更高。[94]

情境敏感的衡量工作对于全面理解志愿服务的深远影响至关重要。目前关于健康与幸福感的研究大多来自全球北方国家，这有可能忽视其他地区志愿者的独特经历。此外，如果未能考虑到志愿者的动机、所扮演的角色类型以及社会动态等关键因素，志愿服务、健康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可能会显得过于简单化。[95] 将标准健康数据与志愿者的个人叙述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揭示对信心、压力和目标感等关键因素的影响，这些正是单一指标容易忽视的方面。



2018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在塞尔维亚开展了一项计划，将罗姆青年安置在当地机构中，以协助他们开展影响社会和政治进程的活动。*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4.2.1. 衡量与绘制健康与幸福感

关键途径与方法

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与幸福感的影响可通过多种方法途径和工具进行评估，这反映了志愿服务情境的多样性。定量方法历来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政策制定者、资助者和卫生系统倾向于优先考虑标准化、可比的数据，以便进行规划和资源分配（另见第 2 章）。世界卫生组织五项幸福感指数量表（WHO-5）、[96]SF-36 健康调查简表 [97] 和自我报告健康数据集 [98] 等结构化指标涵盖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功能能力和生活满意度等核心维度。然而，这些工具可能无意中忽视了幸福感的其他方面，如归属感和个人能动性，而这些方面对志愿者尤为重要。[99]

大规模的全国研究，尤其是在全球北方国家，往往依赖于在某一特定时间点收集的数据来探究志愿服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同时考虑年龄、收入、性别和就业状况等变量。[100] 尽管这些调查对于识别人口趋势具有重要价值，但它们通常侧重于个人动机和个人成就，可能忽视了对健康和幸福感的文化理解，如家庭和谐、精神平衡和社区归属感。因此，它们可能会忽视决定志愿服务重要性的关键驱动因素，尤其是在低收入环境中。例如，在乌干达，乡村卫生队报告称，即使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志愿服务也能增强个人韧性和社会支持网络。[101]

由于数字本身无法捕捉到志愿者的全部主观体验，定性和参与式方法能够以特定情境的方式，为志愿服务对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提供进一步证据。深入访谈、生活史、民族志观察和社区记分卡等方法揭示了志愿者经历与健康相关结果（如情绪韧性、压力水平、社会归属感和履行职责的信心）之间的联系。这些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衡量个人志愿者的经历。但是，深入的定性研究可能会面临成本和可行性方面的挑战。在与边缘化人群合作时，这些因素尤为重要，因为信任、语言和文化习俗等问题在受访者体验和报告幸福感方面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参与式方法和志愿者思考日记可以帮助志愿者用自己的语言并根据自己的优先事项来表达他们的经历。对这类定性数据的批判性分析可以确保衡量工作不仅反映预先设定的成果，还能反映志愿者自身认为对其健康和幸福感最有意义的内容。[102] 例如，在老挝，通过将结构化幸福感量表与参与式摸底调查相结合，基层组织能够衡量年轻人通过志愿服务所体验到的情绪韧性和归属感（见案例研究专栏 4.1）。

关键问题：衡量工作面临的挑战

目前关于志愿服务对健康和幸福感影响的证据主要来自全球北方国家的数据，这些数据虽然极具价值，但往往侧重于正式志愿服务结构的结果，而非社区或非正式志愿服务的结果。[104] 因此，许多常用于评估幸福感的指标都基于更为个人主义的概念，如个人成就或收入保障，并可能忽视在其他背景下（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可能更为突出的集体和关系维度。[105]

在衡量志愿服务如何促进个人健康和幸福感方面，存在几大障碍。难以理解的术语可能会将不熟悉健康相关技术术语的志愿者排除在外。文化水平低可能使一些人难以完成书面调查问卷。围绕心理健康的污名化可能会阻止一些志愿者如实报告压力或情绪紧张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志愿者可能还会犹豫是否报告负面经历，如疲惫、压力或挫败感，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志愿服务角色、损害与组织的关系或面临同伴的评判。[106] 传统的衡量方法往往无法捕捉到这些较少被报告的显著风险，包括危机和紧急情况下志愿服务造成的心理社会影响和潜在创伤。 例如，在伊拉克，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志愿心理健康工作者报告了对自己所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但同时也谈到了高度的情绪疲劳，但这些影响在官方方案评估中却未被提及。[107] 这些例子揭示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更广泛缺陷，即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志愿者看似矛盾的经历（如压力与满足、脆弱与坚韧）的共存性。在受冲突、灾难或长期资源短缺影响的环境中，这种报告不足尤其令人担忧，因为这些环境中专业支持服务稀缺，对志愿者的需求却很高。

在许多情况下，尚不清楚是志愿服务改善了健康状况，还是健康状况更好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志愿服务。[108] 这导致更加难以解读各种证据，但结合使用多种工具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更清晰的见解。例如，变革理论方法首先建立关于志愿服务改善健康和幸福感的假设，然后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成立。[109] 贡献分析法认识到，除了志愿服务外，许多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观测到的变化，因此它有助于确定志愿服务在更大的规划框架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110] 成果收获法则相反：它首先确定特定范围内的变化，然后追溯这些

专栏 4.1. 从个人领导到社区转型：老挝青年志愿者的草根衡量工作 [103]

志愿服务衡量工作往往被认为代价不菲，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超出了小型项目或基层倡议的能力范围。然而，老挝社区青年学习与技能发展促进协会（APLSY）的见解表明，只需有限的资源就能取得有效的衡量结果。当地青年志愿者通过 APLYS“ 不要停止梦想团队 ” 部门在老挝首都和最大城市万象，运用定量和定性策略来捕捉志愿服务的价值。

虽然各式线上线下表格记录了志愿者小时数和参与率，但仅凭这些数字只能部分了解青年方案的成果。团队将这些衡量方法与访谈、反馈调查以及方案前后的评估相结合。混合方法不仅揭示了志愿服务参与的规模，还揭示了志愿者及其所支持的年轻人所经历的变化深度。衡量模式显示，志愿者逐步提高了自身幸福感和自信心，其领导能力和软技能也有所增长。

这使得该组织得以识别出方案中最有效的要素，并改进培训材料和方法。通过有针对性的评估和访谈，该倡议还确定了其软技能培训中最有效促进志愿者个人成长的具体方面。

变化与志愿服务的贡献之间的关系。它不需要指标或逻辑模型。在“收获”之后，可以对各种类型的变量进行交叉分析，以了解变化的趋势。[111] 例如，它首先确定已经发生的健康变化，然后回溯并查看志愿服务是否促成了这些变化以及具体作用方式。这些方法强调情境，并有助于确定志愿服务是否改善了个人的健康状况以及具体作用条件。

过去十年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应将心理社会因素（如能动性、融入感、尊严和希望）纳入衡量框架，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112] 这些方面往往是志愿者如何定义自身幸福感的关键，但在标准指标中却常常缺失。 衡量这些因素可能需要耗费大量资源，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发现负面影响，还可能具有政治敏感性。因此，将这些因素纳入评估框架的做法仍然缺乏一致性。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努力捕捉这些维度可以降低忽视志愿者关键心理社会成果的风险，同时也有机会为志愿服务及其对个人幸福感的贡献构建更全面、更可信的论据。

地理因素：具体情境及地点

志愿活动所处的环境会影响所衡量的健康和幸福感方面、信息收集的方式以及解释和评估结果的方式。标准化工具让跨国比较成为可能，但也可能会掩盖志愿活动的地方意义和实际经历对于个人意义的作用（另见第 2 章）。适应当地环境的志愿者健康和幸福感衡量方法能提供更有力的证据，同时也考虑了社会和政治环境对这些结果的影响。

例如，一项针对日本国际移民的混合方法研究 [113] 发现，志愿服务并不会自动带来更多幸福感，这与来自其他地方的证据形成了对比。这突显了在评估志愿服务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具体的背景和个体经历。



联合国志愿人员 Filippo Busconi 在乍得恩贾梅纳与前痿管病患者 Madjibeye Felicité 交谈。*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09

在肯尼亚，社区卫生志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角色有着强烈的动力和自豪感，但在服务不足的地区工作，缺乏持续的支持或报酬，也给他们带来了情感上的压力。[114] 尽管他们对卫生系统至关重要，但官方统计数据中却很少提及他们的贡献，也未能常规监测他们的个人幸福感。交通不便和物资不足等实际障碍也会影响志愿者的身心健康。[115] 如果数据未能捕捉到这些运作限制因素，就可能存在将负面影响仅归因于志愿服务本身，而不是归因于更广泛的环境条件的风险。[116]

在西班牙，“青年、志愿服务与幸福感”倡议探讨了青年志愿服务如何通过结合标准化心理健康指标（如生活满意度、孤独感和抑郁症状）以及志愿者参与的频率、持续时间和类型数据，成为促进情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工具。[117] 结果表明，通过志愿服务获得更高水平的自主性、能力和人际联系的年轻人也更有可能维持长期

> ***我开始把志愿服务看作是建设和平的一种形式。和平并不只与高级外交有关，它还可以从日常交往、相互尊重以及跨越国界的共同目标开始。***
>
> Eldana Karimov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泰国青年团队成员

承诺。幸福感与持续参与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强化了将志愿服务作为心理健康和个人发展的战略干预手段的方法，并指导公共政策朝着将志愿服务融入教育和公民参与计划的模式发展。

还有一些例子也展示了基于文化和社区驱动的工具的价值。在印度尼西亚，村庄健康倡议利用小组对话来追踪志愿者和受益人之间的情感成果，从而将评估转变为建立信任的活动。[118] 在坦桑尼亚，心理健康指标被加入常规健康外联报告中，提高志愿者幸福感在现有健康数据系统中的可见性。[119] 这些例子表明，将志愿者幸福感纳入现有数据系统可以提高衡量工作的可持续性，尽管仍存在隐私问题、洞察深度问题以及此类工具可能将志愿者经历简化为狭隘指标而忽视其他重要影响等风险。

无论是通过调整现有工具、将评估活动嵌入可信赖的社区流程中，还是利用技术获取定期反馈，衡量工作的目标都应该是提供证据，以决策者认为可信且对志愿者自身有意义的方式，捕捉志愿服务对志愿者健康和幸福感的多重影响。

4.2.2. 衡量个人健康与幸福感的工具及混合方法

综合使用多种工具才能最有力地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与幸福感的影响力。定量衡量方法（如标准化健康量表）提供追踪模式，并能比较不同群体的结果，定性方法（如访谈、焦点小组和叙事技巧）则有助于揭示志愿者所经历变化的复杂性以及评估这些变化的方式（另见第 5 章）。

志愿者的声音

参与式定性研究方法允许志愿者定义并追踪自己的健康和幸福感指标。例如，在伊朗，一项与健康志愿者合作的参与式行动研究项目采用了思考日记、深入访谈和小组会议等方式，以捕捉志愿者在明确角色、发展技能和情感变化方面的经历，结果显示，志愿者的知识、能力和满意度有了显著提升，同时继续担任其角色的信心和动力也得到了增强。[120] 这一过程还鼓励志愿者之间持续对话，使衡量工作本身成为其支持系统的一部分。

准确性和可比性

标准化定量健康与幸福感量表（如 WHO-5、SF-36）对于构建跨情境可比数据集仍然至关重要。在根据当地语言和文化背景对这些量表进行适当改编之后，它们可以提供稳健的基准比较，同时不失其相关性。在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CCIVS）开展的全球志愿服务研究中，研究人员进行了参与志愿服务前后的调查，以收集来自世界各地志愿者的证据，然后与定性访谈相结合（见案例研究专栏 4.3）。[121] 一方面，调查设计采用了既定量表来评估志愿者感知到的幸福感，并特别关注了能力获取和志愿者学习方面的要素。另一方面，深入的定性访谈探讨了社区参与和跨文化关系等主题，深入剖析了国际志愿服务经历如何塑造志愿者的幸福感和自信心。[122] 这使得研究既保持了跨国可比性，又尊重了当地对幸福感的解读。



联合国国家社区志愿者 Felly Kalonji Kambala 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 青年卫士 ” 之一。*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

健康与参与数据之间的联系

一些方案将健康与幸福感指标融入现有的志愿者管理系统，将结果与参与模式联系起来。在苏格兰，国家志愿服务中心 “ 苏格兰志愿者 ” 与专门衡量社会影响和价值的公司 “ 生活状态 ” 合作，将关于志愿服务频率的国家调查数据与心理健康指标联系起来。这使得能够量化志愿服务在个人和群体层面的社会价值。分析显示，对于残疾人或长期病患者而言，志愿服务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尤为显著，而对于每周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员，其幸福感也持续保持正向提升。[123]

三角互证的价值

三角互证涉及结合不同类型的数据和视角来理解某一情况，是一种交叉验证结果以增强可信度和洞察力的方法。在志愿服务衡量工作中，这可能意味着将调查评分和参与人数等定量数据与访谈、个人故事和观察记录等定性数据相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使从业者能够验证结果，还能捕捉到单一方法可能遗漏的健康和幸福感变化。如果应用得当，三角互证可以揭示志愿者影响力的规模和深度。重要的是，它还能揭示出现某些模式的原因，帮助组织调整策略，并应对与志愿者健康和幸福感相关的意外挑战。老挝的例子说明，混合方法并非专属于资金充足的大型方案。基层团体凭借创造力和当地主导权，也能结合多种衡量方法，生成可信且可操作的证据（见案例研究专栏 4.1）。将定量工具的严谨性与定性见解的丰富性相结合，有助于加深理解，支持组织学习，确保衡量结果不仅反映志愿者的健康和幸福感状况，还能捕捉到背后的人类经历。

4.3. 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技能和就业能力发展的贡献

技能发展可定义为 “ 与劳动力相关的技能或能力的发展 ”，[124] 就业能力则是指 “ 能增强个人利用现有教育和培训机会能力的可转移的能力和资格，以确保获得并保持体面工作，在企业内部和不同工作之间取得进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劳动力市场条件 ”。[125] 志愿服务可通过不同方式提升志愿者的个人素质或特质，例如培养新技能、领导素质和自尊。[126] 这一关注点在政策和学术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强调年轻人的技能培养和就业途径。[127]

不同形式的志愿服务为提高个人技能和就业能力提供了不同的潜在途径。为了充分利用这一点，混合方法可为志愿者、社区、政

策制定者、研究人员、组织以及推动、支持或经常依赖志愿服务作为技能和就业途径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可靠数据。

4.3.1. 衡量与绘制技能和就业能力

关键途径与方法

到目前为止，志愿服务、个人技能与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定量方式来衡量，且大多数现有研究都集中在全球北方国家。[128] 这些研究通常侧重于衡量志愿服务后继续就业的个体比例，并追踪通过各类方案获得正式认证的志愿者数量。研究结果普遍表明志愿服务与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29] 这对于志愿服务部门展示其对于个人生计的价值很有帮助。同时，这也有助于证明志愿服务应成为更广泛的政府就业政策的一部分。然而，这些结果可能较为复杂，有时相关性或关联性较弱。在探索志愿服务、技能与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时，一系列指标可能具有相关性，如志愿者角色、志愿服务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志愿者的动机和激励、管理、监督和支持、志愿者的人口特征和社会身份，以及志愿者的教育或就业背景和 / 或其职业生涯阶段。然而，实际操作中存在过于简化志愿服务与就业之间联系的风险，因为二者之间有时并非线性联系。[130]

通过获取美国现时人口调查 [131] 和英国家庭追踪调查等大型国家数据集和调查，我们可以定量证明志愿服务与就业能力之间存在可衡量的联系。[132] 这类研究利用截面数据或纵向数据来评估就业能力结果，将志愿服务定位为失业人员获得工作的途径。这种方法揭示了重要见解，但也带来了挑战。我们缺乏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数据集，尤其是对于全球南方国家，且各国数据集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关于影响因素的信息也可能较为有限，阻碍了确定因果关系。更广泛的研究还表明，志愿服务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志愿服务本身的意义、价值和社会认知，以及对于理解获得额外 “ 技能提升 ” 或培训机会的不同途径，都至关重要。在为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制定循证解决方案时，这一点对政策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与衡量对个人的其他影响（包括前文讨论的健康和幸福感）类似，通过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如自我思考调查、访谈、焦点小组和日记法，也可以揭示志愿者自身对志愿服务提升其技能和个人发展的看法。这可能包括提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积极公民意识，以及增强信心和提高个人对未来就业的期望。[133] 这些技能更难追踪和衡量，但个人对其经历的反馈提供了重要证据，证明了志愿服务对个人的变革性影响。研究还指出了志愿服务可以向潜在雇主传递的积极信号，这反过来又能提高人们自我感知的就业能力。[134]

关键问题：不平等和不同环境

基于全球北方且完全依赖定量方法的衡量工具可能无法考虑到参与调查的障碍以及获取志愿者机会的不均等性（另见第 5 章）。证据显示，由于不平等现象，一些志愿者无法获得提升技能和就业能力的机会，尤其是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135] 这包括无法获得相关职位，或者缺乏利用这些技能并提高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知识。如果衡量方法能够捕捉到此类不平等情况，则可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制定包容性的志愿服务政策提供证据。组织也可通过识别障碍，调整其实践做法，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志愿者体验（见案例研究专栏 4.2）。

衡量工作对于应对更广泛的技能和就业能力干预措施所面临的长期且紧迫的挑战，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挑战，同样至关重要。[137] 当前的青年就业政策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例如，为年轻人创造提升技能的机会），而非需求侧的现实情况（例如，为年轻工人创造就业机会），而需求侧的现实情况受到结构性不平等、全球经济变化和就业机会匮乏的影响。[138] 鉴于这些挑战，我们呼吁加强多部门合作，为志愿者提供其可以利用的技能，以实现切实的就业能力成果，如认证和特定培训。[139] 改进衡量策略不仅可

以支持组织的招聘、留任和实践活动，还可以为政府提供证据，揭示志愿者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更广泛的经济差异。

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表明，针对特定情境的衡量至关重要，这能确保数据捕捉到志愿服务与劳动力市场特定特征之间的关系。

4.3.2. 衡量个人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工具与混合方法

以互补的方式综合使用多种衡量工具和方法，可以确保收集到更有力的证据，证明通过志愿服务所培养的一系列技能。[140] 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完全采用定性或定量方法。例如，位于菲律宾奎松市的世界城市学院在菲律宾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仅基于思考随笔进行定性研究（而非记录的小时数或其他定量指标）来关注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影响力具有重要价值。[141] 从社区推广服务的学生志愿者那里收集的数据，促成了一种基于结构化反思的替代性服务学习模式。[142] 另一方面，来自德国的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境下，纯定量调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weltwärts” 方案涉及 130 个德国民间社会组织与全球南方 1000 多个合作伙伴的合作。该方案在过去十年间通过一项年度调查持续评估国际志愿者在方案中的经历。[143] 这使得能够对参与者满意度进行更广泛的评估，既支持了方案管理，也跟踪了个人技能的发展。

本节采用已在健康与幸福感部分讨论的混合方法，展示了定量和定性方法如何为技能和就业能力提供不同的见解 —— 前者用于追踪就业结果或培训参与率等模式，后者则用于揭示志愿者技能发展及实践应用经历（见案例研究专栏 4.3）。

因此，虽然以有形就业成果为主要量化关注点确实能提供见解，但混合方法研究能揭示可能影响志愿服务转化为技能和就业能力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在低收入环境中），从而增添细节。此类证据对于设计包容性的志愿服务方法至关重要，有助于确保最广泛的人群都能享受到这些效益。

专栏 4.2. 通过志愿服务衡量工作打破壁垒：改善户外运动志愿者的体验 [136]

志愿服务衡量工作不仅仅关系到记录志愿活动的效益，还能识别志愿者面临的障碍，并寻找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全球慈善机构 parkrun 通过户外运动和社会联系将社区凝聚在一起，吸引了全球超过 45,000 名志愿者参与。其评估和提升志愿者参与度的策略主要依赖于两个工具：每半年进行一次的 “ 志愿者体验调查 ” 和每两年进行一次的 “ 志愿者障碍调查 ”，这两项调查分别于 2019 年和 2022 年启动。

志愿者体验调查向具有代表性的志愿者样本分发问卷，用于追踪在 parkrun 倡议中开展志愿服务的效益与挑战。2024 年新增的志愿者净推荐值（VNPS）为分析满意度和倡导度提供了明确指标。另一方面，障碍调查则关注不参与或脱离志愿服务的原因，重点关注了参与者之间利益冲突以及难以提前承诺等问题。通过这两种调查工具衡量对比指标，是生成可操作见解的有效方法。例如，针对志愿者感到与组织总部脱节的反馈，该倡议推出了新闻组、网络研讨会和志愿者反馈池，以期加强参与度和决策过程中的包容性。通过关注目前未参与志愿服务或在新冠肺炎疫情后未被留用的志愿者的经历，调查结果对于开发灵活参与机会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这包括当天参与以及将志愿服务机会与体育活动相结合的选择方案，以满足多样化的偏好并减少障碍。

因此，组织通过将定期反馈与有针对性的障碍分析相结合，可以利用循证衡量方法了解志愿者的个人经历，调整活动，提高可及性、参与度和影响。这样一来，衡量工作就成为了推动组织成长、志愿者支持及社区发展的工具，而不只是一项报告工作。

就业能力

如果以就业能力作为组织或志愿服务倡议的关键目标，则必须采用能够结合个人发展方面的定性见解与就业安置和创业见解等定量指标的衡量策略，并让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孟加拉国非正式社区倡议组织 “Achieve17 Youth Club” 的经验表明，衡量工作可以超越单纯计算志愿者小时数，转而捕捉更长期的影响，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和技能发展等。该社交俱乐部的策略将志愿服务所获工作岗位的定量数据与赋能和成长的定性叙事相结合。[145] 国际志愿服务组织（VSO）在莫桑比克开展的 “ 为女孩学习与赚钱赋能（EAGLE）” 项目也采用了混合方法来衡量其影响，将志愿者推动的数字素养培训评估与追踪失学少女的生活技能和创业能力相结合。该项目的衡量策略涉及多个利益群体，包括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志愿者参与组织、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和志愿者本身。[146]

生计

关于乌干达年轻难民志愿服务的研究揭示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其生计的特殊影响。随着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和志愿服务机会减少，这些年轻人维持生计的手段也随之减少。[147] 为了应对这一复杂性，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结合了对 3053 名年轻难民的大规模面对面调查和一项涉及 20 名年轻难民的参与式照片语音项目。照片语音项目邀请参与者通过摄影、叙事讨论、讲故事或访谈来记录他们的生活经历。这种综合方法通过全面了解特定人群志愿行动的数量和模式，以及其对个人生活和整体生计的影响，展示了其价值。[148]

专栏 4.3. 衡量短期国际志愿服务方案的价值：全球视角 [144]

国际志愿服务常因促进文化交流和培养技能而受到赞誉，但其对志愿者和社会的影响往往未得到系统性的衡量。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CCIVS）采用了一种稳健的混合方法，以评估志愿服务在全球的影响。

委员会对来自 91 个国家的 800 多名志愿者进行了前后对比测试调查，衡量了包括跨文化交流、领导力、公民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知识在内的 11 个技能领域。结果显示，78% 的志愿者报告在全球意识方面取得了显著提升，这有力证明了短期志愿服务的教育价值。基于数据的见解继续为方案设计提供信息参考，并帮助各组织完善志愿者技能发展培训。

除了调查外，委员会还在 31 个国家进行了 150 多次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这些活动吸引了当地协会、公共机构和社区成员的参与，共同探讨参与度、跨文化关系和项目连续性。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社区成员认为志愿工作是推动当地持续倡议（如环境项目）的催化剂，有助于组织将活动与社区需求相结合，并增强项目的相关性和可持续性。数据揭示了一些普遍规律，如技能和能力的一致提升，以及针对特定情境的见解。

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成员通过确定优先事项和使用参与式工具开展衡量工作，共同开发了评估框架。这确保了成果由当地主导，并增强了项目自主权。例如，社区界定的跨文化参与指标提高了方案的一致性，从而直接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接受度。学术合作伙伴支持准实验调查设计及建设和平工具的应用，增强了方法的严谨性和可信度。这一学术见解验证了这些发现，使其对政策受众更具说服力，并为倡导国际志愿服务的价值奠定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数字平台

日益增长的数字参与度和社交媒体平台为在不同背景下衡量志愿服务提供了可能性。俄罗斯的 dobro.rf 是一个志愿者注册数字平台，覆盖全国，提供综合政府服务和内置分析功能，使志愿者能够注册、捐款和参加社区活动，同时提供全国范围内志愿者活动的数据。[149] 在因预算限制或通路问题而无法在实地采取其他衡量方法的情况下，此类平台尤其有用。 在莫桑比克，e-Voluntários 平台支持志愿者认证和注册，为衡量相关数据提供了便利。[150] 这表明，数字工具可将在线参与数据与结构化认证系统相结合，既扩大了衡量的范围，又增强了其可靠性。

4.4. 结语

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健康、幸福感、技能和就业能力的贡献，能更全面地展现志愿服务对个人的价值。这些贡献之间也存在联系。志愿服务有助于提升自尊，这既是一种软技能，也是幸福感的一种体现。有效的衡量方法可以揭示志愿服务如何在生活的不同方面为个人提供支持，同时也能突显他们所面临的个人挑战。

关于志愿服务如何影响个人健康、幸福感、技能和就业能力的证据，有助于利益团体更好地分配资源，促进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从而加强志愿服务在推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衡量工作必须在全球框架与尊重当地现实和志愿者多样贡献的情境特定见解之间取得平衡。混合方法和三角互证对于捕捉这些多维度影响尤其有价值。如果我们能更准确、有效和全面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的影响，就能让更多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技能和就业需求最大的边缘化社区的人享受到志愿服务带来的效益。



联合国国际志愿者 Mackendy Jeunay 作为社会与行为改变沟通干事在刚果实施了社会与行为改变活动。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5



国家联合国志愿专家 Mazayannisa Suyuthi 在 RCO Indonesia 担任志愿服务主流化官员。*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

5 衡量志愿服务对发展的贡献

关键信息

- **志愿服务对经济发展、健康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成果具有多重影响。**获取这些信息需要开展细致入微且针对特定情境的衡量工作，以应对志愿服务所带来的复杂变化。
- **在经济维度衡量志愿服务不能仅限于货币估值，**还应分析福祉、赋能和社区凝聚力变化所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这有助于识别、支持并发展更多元化的志愿活动。
- **在衡量健康志愿服务方面，最近的发展趋势越来越重视非正式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的工作，**以及他们对更广泛的健康相关发展成果的贡献。这些贡献可能更具有关系性，且不那么具体可见，往往被报告和衡量方法所忽视。
- **志愿者对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系统的贡献涉及多个方面，因此需要采用能够衡量其影响的评估方法，**不仅要评估其对教学和学习的影响，还要评估其对更广泛成果的影响，如包容性、留校率和社区参与度等。
- **需要采用创新性和混合方法，包括参与式方法，以吸引不同的行为体，**并形成有意义且相关的衡量结果，从而捕捉到细微的变化。这些方法为追踪志愿服务在各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推动发展的具体及多样化方式创造了机会。
- **收集和分析分列数据**对于了解志愿服务如何帮助减少社会不平等以及确保方案不会无意中强化现状至关重要。

5.1. 引言

人们普遍认识到，志愿者对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章将重点衡量志愿者对经济增长、卫生和教育以及解决不平等问题（尤其是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贡献，这些问题已被确定为发展的关键维度。本报告其他部分将涵盖衡量志愿者对其他重要发展成果（包括气候变化和人权）的贡献。

全球论坛已强调了志愿人员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要性，并着重指出了他们在加强问责制、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同时支持“不让任何人掉队”议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151]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国家层面报告强调了正规和非正规志愿服务在支持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152] 这些分析强调，我们迫切需要开展系统性和多维度的数据收集工作，以使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政府和组织都能了解这种贡献的规模和性质，从而改善社会成果。变革与发展是复杂及非线性的，评估志愿服务所做的贡献也并非直接明了。因此，衡量方法必须能够捕捉到包括社区志愿者在内的各类志愿者的贡献，以了解志愿者工作对关键发展成果的独特影响。来自全球南方的实例为这一背景下的衡量工作提供了特别创新且有效的例证。

5.2. 衡量志愿者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被公认为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另见第 2 章），但其局限性 —— 如未能反映社会和非市场贡献 —— 促使我们开发了更广泛的方法。[153] 这些方法包括关注基本人类需求、不平等和福祉的指标，如人类发展指数。[154]

表 5.1 志愿服务经济维度衡量方法概述

方法	目的	最适合的用途	优点	误用或误解的潜在风险
替代成本法	利用劳动力市场等价物来估测志愿者时间的经济价值	国家统计数据、宏观经济比较（如GDP）	清晰、可扩展且在不同情境下具有可比性	可能被视为对价值的全面衡量；风险在于仅将志愿服务简化为货币衡量
志愿者投资与价值审计（VIVA）/人员价值延伸百分比（PPVE）	评估志愿服务在方案或组织层面的价值和效率	方案评估、内部报告、宣传	易于应用；突出投资回报	可能过度简化复杂结果；不同情境下可比性有限
社会投资回报率（SROI）	将投入的资源与所产生的社会价值进行比较	方案评估、影响报告、资金合理性说明	捕捉包括利益攸关方观点在内的多样化成果	资源密集型；对假设敏感；可能夸大价值
影响力评估（定性或混合方法）	确定志愿服务带来的具体变化和成果	社区发展、教育、健康和社会关怀	情境化、灵活性，有助于深入理解	因果关系可能不明确；结果并非始终具有普遍性
福祉指标	衡量志愿者和受益者的主观获益	心理健康、个人发展、社会凝聚力	反映生活经历；与更广泛的发展目标相一致	结果可能受到短期因素或自我报告偏差的影响
数字与实时分析	利用应用程序和平台监测与分析志愿者活动	数字志愿服务、青年参与、快速反馈	及时、可扩展，能够提供行为洞察	存在数字排斥风险；隐私和算法偏见问题

在评估志愿服务的经济贡献时，认识到定义和指标的多样性至关重要。这进一步强调了需要采用灵活且对情境敏感的衡量方法，这些方法不仅要反映志愿服务的货币价值，还要体现其社会和人文效益。

正如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已超越了国民收入衡量指标，用于衡量志愿服务经济维度的方法也同样如此。早期的方法侧重于为志愿者时间赋予货币价值（另见第 2 章）。这些方法通过将志愿者的贡献转化为经济术语，将以往不可见、无偿的工作纳入了总体经济和政治讨论中。以往对全球志愿服务的估测表明，如果将全世界所有志愿者组成一个国家，它将成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国，其经济规模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也将跻身世界前列。[155] 将这种方法在中国进行应用，结果显示，志愿者工作的价值约为 270 亿

美元，[156] 相当于 GDP 的 15.82%。[157] 在肯尼亚，同样的计算结果显示，超过 1300 万注册志愿者贡献了约 18 亿美元，[158] 相当于 GDP 的 3.66%。[159]

这些数据虽然突显了志愿活动的庞大规模，但也揭示了货币估值的局限性，因为它无法捕捉志愿活动带来的更广泛成果。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具创新性和以成果为导向的方法。

5.2.1 采用创新方法衡量志愿服务对经济发展的价值

衡量志愿服务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仍然是一项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挑战。一些方法侧重于定量数据，如西班牙志愿服务平台，它根据志愿者的反馈，结合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就业能力、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卫生系统节省的费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他一些方法则依赖于定性或混合方法设计，捕捉以非货币形式表达的结果 —— 如福祉、赋能和社区凝聚力 —— 并将其与长期经济效应联系起来。这种多样性丰富了人们对志愿服务经济贡献的理解，同时也使得选择方法和解释结果变得更加复杂。此外，每种方法都包含关于“价值”的假设，这些假设可能既反映外部优先事项，也反映当地现实情况。[160]

表 5.1 总结了衡量志愿服务经济价值的主要方法，概述了每种方法的主要目的、典型应用、主要优势以及可能存在的错误解读风险。表格展示了经济视角的广度，表明影响力评估、福祉指标和数字分析等方法，尽管并不能严格视为经济方法，但对于捕捉传统指标可能忽视的价值形式至关重要。

虽然福祉指标与本报告其他部分讨论的社会和健康维度有所重叠，但将其纳入此处旨在强调主观效益（如改善心理健康、增强韧性、提升社会凝聚力）如何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和强化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价值。

诸如志愿者投资与价值审计（VIVA）工具（见案例研究专栏 5.1）和人员价值延伸百分比（PPVE）[161] 等工具帮助组织了解他们在志

专栏 5.1. 衡量志愿者投入与经济价值：成本效益分析 [163]

志愿者投入与价值审计（VIVA）工具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来衡量和传达志愿服务的价值。在财务考量影响决策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一框架提供了能够支持决策的证据。重要的是，它还强调志愿服务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不是单纯替代有偿工作。

志愿者投入与价值审计（VIVA）的核心是一个成本效益工具。它计算开展志愿服务方案的成本与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经济价值之间的比率。投入成本包括志愿者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志愿者费用的报销。产出是将工资水平（通常是平均值或特定行业的工资水平，而非最低工资水平）乘以特定时间段内的志愿者总工时。比率若为正数，则表明该方案具有成本效益。

应用志愿者投入与价值审计（VIVA）通常能为利益团体提供三大主要见解。首先，志愿服务并非完全免费。对基础设施、人员配备和志愿者支持的投资对于志愿者的蓬勃发展至关重要。其次，它通过财务和运营概览全面捕捉志愿者的贡献。第三，它创建了一个结构化的系统来收集和管理志愿者数据，从而能够在方案设计和实施方面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这种衡量策略使世界各地的组织能够通过投资回报的视角来审视其志愿服务活动，认识到通过志愿服务对发展成果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需要深思熟虑的前期投资。

愿服务中投入的每一美元或每一小时所能获得的价值。这些方法基于成本效益逻辑，需要谨慎应用和解读，以避免得出过于简化或有偏见的结论。它们在方案评估、战略规划和倡导方面尤其有用。在缺乏这些指标的情况下，进行持续投资的经济理由往往依赖于局部性输入信息（例如仅有小时数的信息），而非能够比较价值的指标。[162]

志愿者投资与价值审计（VIVA）和人员价值延伸百分比（PPVE）是能够展示志愿者方案效率和效益的工具。这对于政府和资助者在分配公共预算时具有直接相关性，因为它能够显示与资源的替代用途相比，对志愿服务的投资是否能产生可衡量的经济回报。

社会投资回报（SROI）模型借鉴自商业领域，它不局限于数字统计，而是将志愿服务与更广泛的社会成果（如提升社区福祉、增强包容性和强化地方网络）联系起来。该模型将志愿服务既视为投入（如时间和专业知识），也视为产出（如韧性、信任和赋能）。[164] 社会投资回报模型的关键优势在于它捕捉到了某些无形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是货币指标往往忽略的方面。[165] 但是，该模型需要大量数据和资源，可能对其在小型组织或资源匮乏环境中的应用造成限制。尽管如此，社会投资回报模型已在阿富汗被用于量化志愿者工作的长期效益，如提升就业能力、增加家庭收入、降低健康相关成本以及增强社区韧性。[166] 尽管社会投资回报模型通常被视为一种通用评估工具，但它具有很强的经济相关性，因为它捕捉到的许多成果（如提升就业能力、降低健康成本和强化社区网络）都能转化为节约长期成本或提升生产力。这使志愿服务与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优先事项直接联系起来。

总体而言，对志愿服务经济维度的衡量缺乏充分批判性反思可能造成错误解读。若缺乏适当的情境化处理，经济指标可能会夸大



联合国国际青年志愿者 Kyra Grace Haberlin 是联合国区域协调办公室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气候变化与青年事务助理。*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

影响或掩盖重要贡献。当这些数据被用于指导政策或资助决策时，这一问题尤为令人担忧。[167]

衡量方式决定了哪些信息会显现出来。替代成本或全职等效等经济工具使志愿服务在预算框架内的贡献更加明显。但是，这些工具往往强调可衡量的劳动投入，而非社会或发展成果。若单独使用，它们可能会将志愿服务描绘成有偿工作的替代品，而非一种独特且具有变革性的参与形式。[168] 除个别工具外，联合国《非营利机构手册》和国际劳工组织《志愿者工作衡量手册》[169] 等系统层面的框架为评估志愿者的贡献提供了国际标准。多个国家采用的国家卫星账户将这些衡量指标纳入国家经济统计中，从而更全面地展示了志愿服务如何促进 GDP 及其他方面。尽管这些框架对从

业者而言可见性低，但它们对于确保宏观经济层面的可比性和政策相关性至关重要。

在传统经济指标占据主导地位时，志愿服务有可能被简化为节省成本或提高生产力的手段，而无法被视为一种公民参与或社区自主的形式。长此以往，这可能会窄化受到重视和支持的志愿服务形式，因此我们有必要采用互补性衡量方法。在衡量志愿服务对经济发展的价值时，关于其方法、假设和局限性的透明度对于确保衡量工作成为不断学习和改进的工具，而非仅仅是一项报告工作至关重要。

5.3 衡量志愿者对促进社会健康成果的贡献

健康是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它依赖于个体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合作。[170] 这体现在各类卫生方案中，它们是地方和社区规划的核心，也是更广泛福利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减少卫生领域的不平等是全球发展的基本要素。志愿者积极参与提供健康服务、提高认识、加强卫生方案，并在卫生危机期间增强社区韧性。

志愿者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包括社区卫生志愿者、非专业卫生工作者和基于社区的结构化网络中的健康促进者，以及家庭或村庄层面的非正式志愿服务。[171] 合格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除了履行其专业职责外，还会参与志愿服务，包括医务人员执行任务和从事无偿工作。[172,173] 全球北方的医学生经常在全球南方进行志愿服务，尽管这一做法的伦理困境现已得到广泛认识。[174] 除了这些角色外，当地卫生专业人员和妇女健康专家（如志愿助产士和生殖健康促进者）以及心理健康从业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这种多样性对于志愿服务在促进社会健康成果方面的价值至关重要，但它也使得追踪和衡量志愿者的贡献变得复杂。此外，在此背景下，志愿者的身份认定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Théo Martin 受法国政府资助，代表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塞内加尔的蔬菜种植情况进行实地考察，以支持农民田间学校和气候适应力项目。*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17

从历史情况来看，循证卫生政策以随机对照试验为中心，通过产出和因果模式来衡量变化。[175] 近期衡量工作领域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认识到非正式健康志愿服务活动可能因此被忽视。

5.3.1 衡量志愿者在健康领域的贡献

了解志愿者在健康相关倡议中的贡献规模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倡议依赖于志愿者来维持干预措施。临终关怀需要大量非专业志愿者参与，[176] 而大规模免疫接种活动和社区卫生保健则需要训练有素的志愿者持续投入。[177] 衡量这些贡献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了解志愿者工作在实现健康成果方面的重要性。

> ***在人道主义救援中，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人，而是真正有人性的人。这正是志愿者的定义：在面对最大的不公时，展现出完全而深刻的人性。***
>
> Catalina Ignacia Lam Órdenes，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智利联合国志愿人员

志愿者健康项目通常由地方主管部门、非政府组织、个体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国家政府计划协调，各方在数据收集能力上各不相同。国家资助的倡议在捕捉健康志愿服务规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就是明证。[178] 在泰国，公共卫生部采用国际劳工组织现行工资法，[179] 对 100 多万名乡村卫生志愿者的贡献进行了衡量。在国家层面之外，国际组织也收集关于健康志愿者影响规模的数据。六大青年组织联盟（The Big Six）报告称，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恢复期间，56 个国家共动员了 218,692 名青年志愿者。[180]

除了统计志愿者人数，衡量他们投入的时间也是捕捉对健康相关成果贡献规模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非正式劳动可见性低且更难追踪的情况下。在边缘化、偏远和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志愿调解员和健康促进者对于实施健康项目至关重要，他们贡献了独特的品质，比如同伴间的同理心方法、使用当地语言和文化、建立理解和信任以及树立榜样等。他们的贡献往往跨越数年的漫长时程，因此衡量他们投入志愿服务的时长尤为重要。[181]

针对社区卫生志愿者所投入的时间（往往是无偿时间）的衡量工作采用了混合方法，包括问卷调查、观察和时间日志。[182] 这些方法表明，志愿者的贡献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但是，它们也对衡量方法带来了挑战，包括如何计算劳动力的适当替代成本，以及如何调和观察时间和自我报告时间之间的差异。[183] 此外，志愿服务有时并不是线性、持续的活动。一些健康志愿服务有偶发性，或是周期性参与（例如每年一周），或是为应对灾难、冲突或病毒性疾病爆发等特殊情况而参与。[184] 衡量方法应有足够的灵活性，以捕捉这种偶发性和危机驱动型志愿服务的价值。

志愿者贡献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健康统计数据来衡量。干预前后的指标让组织能够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了解健康志愿者如何在社区层面推动变革。例如，在也门，通过调查来衡量各村庄的疫苗接种覆盖率、营养不良和发病率与是否有社区卫生志愿者的关系。[185]

除了组织自身进行的监测和评估外，官方统计数据也展示了志愿者在地方层面推动健康结果变化的情况。在赞比亚，志愿者实施霍乱控制综合社区战略后，霍乱病例的发生率有所下降。[186] 在美国，纽约的免疫接种率变化被用来评估志愿者推动的免疫接种计划的有效性。[187] 但是，这种性质的前后研究往往难以将志愿服务的效应与其他因素区分开来，因为志愿服务很少作为一项完全独立的干预措施进行。这些例子强调了从多个来源对数据进行三角互证的重要性。

大型二级数据集也能揭示志愿者对社会成果的影响。在西非，一项结合了调查、健康和人口普查数据的跨国分析显示，在志愿组织和宗教组织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埃博拉病毒的持续时间较短。[188] 证据还表明，在高收入国家，正式志愿服务的水平越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死亡率就越低。[189] 然而，尽管当地和社区志愿者在疫情期间支持弱势群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非正式活动大多游离于官方报告系统之外。[190] 这突显了在志愿者非正式贡献往往记录不足的情况下，全面捕捉志愿服务对结果（例如，死亡率等）的影响所面临的持续挑战。

结合定性和定量衡量工具有助于克服这些局限性。意大利 Camminare Insieme 项目的例子展示了混合方法的价值，它捕捉到了健康志愿服务中无法量化的维度，如志愿医生在支持难民和移民医疗保健过程中付出的情感劳动和所做的倡导工作（见案例研究专栏 5.2）。

5.3.2. 衡量志愿服务对健康领域影响的创新方法

为获取关于志愿服务对健康领域影响（包括其长期结果）的稳健且可操作的证据，必须采用多维方法。[192] 创新方法能捕捉到志愿服务对健康领域产生的无形影响，例如在哥伦比亚，小丑医生志愿者为住院儿童提供的情感支持。[193] 在英格兰，一项针对低收入社区的研究将问卷与个人和小组访谈相结合，以评估妇女接受志愿者导乐支持的经历，展示健康志愿服务如何为她们带来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不同的成果。[194]

倾听不同利益攸关方的观点有助于捕捉志愿服务对健康领域产生的无形影响。除了收集志愿者的意见外，患者、医护人员、方案管理人员和社区的见解可突显优先事项和成果，强化方案规划。在加纳，社区的声音在衡量志愿服务的影响和制定医疗保健政策

专栏 5.2. 衡量志愿医生对难民和移民医疗保健的影响[191]

在全球范围内，志愿者在改善医疗保健可及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面临社会经济挑战的社区。这一点对于难民和移民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可能因语言、法律地位或其他因素而无法利用正规医疗系统。与欧洲志愿医生合作的研究表明，结合多种衡量工具有助于捕捉志愿服务对改善健康结果的贡献。这包括志愿服务的关系层面以及这项工作对志愿者及其服务对象产生的情感影响。

在意大利都灵，有一家由志愿者运营、名为 Camminare Insieme（携手同行）的当地医疗诊所。志愿服务时长和患者数量等传统的志愿者指标提供了关于志愿服务影响的信息，虽然有用但却不够完整。志愿者医生中许多本身就是移民，他们提供医疗咨询，用多种语言解释治疗方案，并指导患者办理住院手续。他们还帮助患者在医疗系统中进行登记。这些志愿行动改善了患者随访、治疗依从性和求医的信心，而这些方面在现有指标中往往未被涵盖。因此，采用混合方法进行衡量能更清晰地展现结果。定量数据记录了志愿者的咨询、转诊和完成的治疗情况。定性访谈以及与志愿者和患者的参与式互动记录了志愿者在建立信任、文化调解和解决问题技能方面的影响。这些方法共同展示了志愿者如何增加服务获取途径，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这些都是仅凭活动量统计无法体现的。

这个例子促使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重新思考如何在卫生部门衡量志愿服务。它倡导采用超越现有指标的方法，以承认志愿服务在消除卫生不平等和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变革性影响。

专栏 5.3. 通过志愿服务加强多哥的卫生和教育[199]

衡量志愿者对卫生、教育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做出的贡献，需要不同群体之间的持续合作。多哥的公民参与志愿服务方案基于早期研究，旨在了解如何通过结合多种结构化衡量方法，使志愿服务的价值得以显现，从而加强其在当地发展中的作用。

该方案由多哥国家志愿服务机构（ANVT）牵头，此前得到了该国国家经济和人口统计研究所的支持。方案衡量了志愿者在该国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为健康和教育成果所做的贡献。在教育领域，评估了师生比例以及初高中考试的通过率。在卫生领域，衡量了志愿者在抗击传染病（即疟疾和艾滋病毒）以及改善孕产妇健康方面所做的贡献。方案还在这两个领域分析了招募志愿者的财务成本效益比。

根据调查结果，公民参与志愿服务方案的衡量体系自此围绕三个要素构建。首先，它开发了特定的工具来追踪志愿者的贡献，包括一个逻辑框架、一个实时监控活动的仪表板以及标准化的数据收集表。然后，通过多层次流程收集和验证数据。在地方层面，由主管、主办组织和社区代表收集和验证志愿者表现信息，以确保准确性。这些数据随后在区域层面进行整合，并在国家层面进行集中处理，以生成关于志愿服务对发展目标贡献的报告和统计数据。

这有助于将志愿服务纳入该国的国家权力下放战略，并加强了对政策认可和支持的宣传。该方案还创建了包容性论坛，志愿者、社区、地方主管部门和主办组织可以在此分享经历、挑战和教训。这确保了能够通过衡量工作深入了解各项举措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让不同群体参与其中可以建立信任，并增强他们对方案的主人翁意识。

这个例子表明，志愿服务的结构化衡量工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多个团体持续合作，以建立和维持有效的体系，从而展示志愿服务对发展成果的贡献，特别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95] 社区记分卡也被用来让社区成员回忆就医等待时间和医疗资源可得性等经历，从而监测和衡量志愿者支持的医疗保健服务的质量。[196]

在意大利，讲故事和音频日记等创新方法为捕捉志愿者对与健康相关的社会成果所产生影响的细微感知提供了另一种途径。[197] 在乌干达，照片语音被用于探索男性和女性社区卫生志愿者的不同影响力。[198] 尽管从技术上讲，他们的职责相同，但这种视觉记录方法揭示了他们角色的性别差异，这是其他方法可能难以捕捉到的信息。这加深了对于塑造志愿者健康工作的性别规范的理解，并为决策过程提供了信息参考。

针对特定情境的方法来衡量志愿服务的基层影响，这对于指导各个部门开展有目的性的方案规划至关重要。多哥的经验表明，在结构化衡量系统中结合多种方法，可以在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提高志愿者对卫生和教育事业所作贡献的可见性（见案例研究专栏 5.3）。

5.4 衡量志愿者在教育领域的贡献

教育是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其重点是提高入学率和出勤率，减少文盲和数学盲，并确保各级教育都能实现性别平等和终身优质学习机会。[200] 志愿者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他们在全球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体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这包括支持课程开发、教学、课堂支持、性别平等工作和学生保有率。[201] 志愿者还通过家长 - 教师协会参与学校治理，并支持课后开放的社区中心。家庭既是志愿者，也是这些举措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他们还采取集体行动，如开展宣传和倡导活动，以改善学校治理并保障女孩的教育权利。[202]

在某些情况下，志愿者通过在贫困地区或危机情境中教学来弥补服务提供方面的空白。一个重要方面是提供在线活动，如远程教学。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流离失所人群中，面对数字不平等进一步加剧障碍和性别差距的情况，这些努力受到了特别关注。[203]

对于正式招募、培训或领取津贴的志愿者，其人数往往会被纳入监测系统。但是，其他方面 —— 如他们提供的教学小时数、接触的学生人数以及与志愿者参与对改善学习成果的作用等 —— 则缺乏一致的衡量过程。组织一般通过调查收集教育环境中国际志愿者安置情况的数据，这些调查往往侧重于志愿者个人所受的影响，如跨文化意识、技能和信心的变化 [204] **（见第 4 章）**。然而，如本报告其他部分所述，非正式和社区志愿者的工作，如直接与学校合作或通过自助团体以及在低收入环境中工作的人员，往往未被报告。

专栏 5.4. 平衡全球覆盖与包容性，以衡量志愿者对社区发展的影响 [205]

对于组织而言，尤其是在全球运营的组织，在规模、方案效果和包容性之间取得恰当平衡对于衡量志愿者对发展成果的影响至关重要。自 2018 年以来，由世界童军运动组织（WOSM）领导的“童军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已动员了来自 176 个国家的 5400 多万名青年。该倡议通过非正式教育，鼓励不同年龄段的青年积极参与公民活动，从而增强社区影响力和机构能力。

童军运动采用一个整体框架来衡量志愿服务，将能力发展、情感参与和成本效益融为一体。这种方法将服务时长和覆盖范围等定量数据与志愿者满意度和角色明确度等定性见解相结合。该体系被 95% 的国家童军组织采用，记录了资助及非资助行动。自该体系建立以来，已记录了 1600 万项非资助活动的 27 亿小时服务时长，并与资助项目进行了基准比较。衡工量值式模型显示，非资助倡议的成本低至每名受益人 0.001 美元，在不损害包容性的前提下突显了效率。

世界童军运动组织（WSOM）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行动嵌入各项方案中，建立了一个可复制的系统，用于追踪全球范围内由青年主导的分散式志愿服务所产生的影响。志愿者通过数字平台记录指标、财务数据并提供照片证据，促进各方协调和故事讲述活动。通过追踪世界童军平台 35,000 名月度用户提供的数百万服务小时数和记录的成果，衡量结果可显示出志愿服务如何促进社区改善并增强生活技能。一项全球研究发现，童军志愿者比非童军志愿者在团队合作和领导力等能力方面的表现高出 16.2%。[206]

这些证据还能为战略和投资优先事项提供信息参考，尤其是旨在提升教育作为发展成果的特定战略和投资优先事项。在波兰，波兰童军与向导协会（ZHP）根据当地情况调整了全球倡议（如“和平使者”倡议和“地球部落”倡议），使得一年内参与和平建设和环境项目的青年志愿者人数增加了 20%，这表明证据驱动的战略能够增强志愿服务的影响力。在印度，巴拉特童军与向导协会将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教育纳入其方案中，使知识得分提高 30%，并增强了公民参与度，这突显了志愿者驱动的倡议所具有的量化价值。

这些例子表明，通过将大规模数据与特定情境下的见解相结合，全球组织可以衡量志愿者行动的影响范围和可持续性，从而加强其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联合国志愿国际助产教育工作者 Selamawit Lake Fanta 在印度演示如何使用皮纳德听诊器检查婴儿的心跳。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志愿服务对教育成果的贡献可通过出勤率、自信心、志向、教育成就以及对女童教育的态度的变化来衡量。在多哥，志愿教师的影响体现在班级人数减少和学习成果提升上，推动了实现确保儿童完成免费、公平和优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目标（见案例研究专栏 5.3）。

当志愿服务成为结构化方案或计划的一部分时，教育监测系统中的基线数据和终线数据可以追踪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一般通过调查或组织绩效分析来实现。世界童军运动组织系统地衡量其 95% 的国家童军组织的志愿者贡献，利用其非正规教育方法来增强社区影响力和机构能力。通过一个数字平台记录志愿者小时数、项目指标、财务数据和定性见解，帮助组织评估资金效益、效率和资助工作与非资助工作之间的差异（见案例研究专栏 5.4）。

在紧急情况和偏远地区，志愿者往往能填补关键空白，例如在资源匮乏的学校进行教学。在这些情境下，一般通过量化指标来评估他们的影响力，如提高出勤率、考试成绩以及学习材料的可获取性。但研究表明，志愿教师有时也会为学生提供经济支持和教学材料。[207] 能否捕捉到这些贡献对于确保利益攸关方全面理解教育志愿活动的重要性至关重要。

定性方法对于理解交互关系如何逐步建立并塑造教育成果特别有用。这些方法提供的情境证据表明志愿者为教与学乃至更广泛的目标（如包容性、学生保有率和社区参与）做出的贡献。深度访谈、



国际联合国志愿人员助理政策干事 Vibhu Sharma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协助制定了残疾包容政策和住宿指南。*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焦点小组、日志记录和课堂观察等方法可以捕捉学生、家长、教师、社区成员、工作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以进行多维度的衡量。这些方法可以融入常规监测或方案评估中，并与定量数据相结合，以加强证据基础。

在尼泊尔，国际志愿服务组织（VSO）的“姐妹互助”倡议为面临辍学或未能升入中学的女孩们安排了具有相似生活经历的志愿者导师（也是女孩）。该项目采用的衡量方法评估了“小妹妹”们在生活技能、自信心和自尊心方面的变化，以及“大姐姐”志愿者导师在就业技能方面的变化。通过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内部文件分析，提供了多样化的定性数据，以衡量志愿服务在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方面的影响。[208]

5.4.1. 通过教育相关成果衡量志愿者的影响

教育领域的影响力评估旨在评估干预措施是否直接改善学习或相关教育成果，而不仅仅是描述进展或看法，以回答因果关系问题。[209] 此类评估通常采用实验方法，如随机对照试验或准实验设计，对干预前后的结果进行比较。教育环境中的志愿者贡献也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评估 —— 例如，在某些学校引入志愿者导师，在其他学校则没有，或者随机分配志愿者为某些学生提供额外课程，并比较其考试成绩。这些方法通常被捐助者和监管机构视为“黄金标准”，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仍十分常见。[210]

然而，久而久之，实验策略被批评为难以应用到现实的教育环境中，因为创建可比小组和随机分配享受志愿服务非常复杂。如果故意回避为某些学生或学校提供支持，也会引发伦理问题。此外，此类研究的成本高，且普遍适用性往往有限。对教育项目的审查表明，将评估资源用于收集信息以改善项目绩效往往更好，而不是仅用于评估其影响。[211]

统计建模可以通过分析因果关系来估测影响力，它通常在纵向研究中进行，以解析单一观察结果背后的多重影响因素，正如巴基斯坦的实地经验强调的一样。[212] 然而，与卫生部门的情况类似，我们很难将志愿服务作为影响教育成果的单一因果因素来单独考虑。

基于理论的方法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评估教育项目中的志愿服务，这些方法侧重于理解干预措施实现（或未能实现）成果的原因。通过考察变革理论中的因果路径、机制和情境因素，[213] 这些方法有助于解释基于志愿者的教育倡议的影响力，而这原本可能需要多年才能显现。[214] 但是，这些方法的确需要一些可识别的变化，因此在早期尚未确定成果时或在高度实验性项目中，它们的用处



联合国志愿人员支持了 “Let's Do It Bosnia and Herzegovina” 活动，该活动在包括萨拉热窝和斯雷布雷尼察在内的六个城市种植了 2000 多棵树苗，作为一天内种植 100 万棵树苗计划的一部分。*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2*

就会大打折扣。例如，印度使用成果映射法评估 “ 教育组合 ” 项目中的技术援助部分；[215] 哥伦比亚使用现实主义评估法探究行之有效的方法、对象、情境、原因 [216] 并将其用于评估教育政策。[217]

这些多维方法不仅揭示了志愿服务倡议在教育领域是否有效，还揭示了它们在社区层面产生变化的不同方式。

5.4.2. 衡量志愿者在教育领域影响的创新方法

参与式方法在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以捕捉学生、教师和社区对于志愿者参与的经历。这些方法通过与直接相关人员合作，支持联合数据分析和基层对变革的反思。这些衡量方法可以让受影响最大的人群直接参与分析，并突出社区志愿者的贡献，从而促进权力动态的转变。[218]

由澳大利亚志愿者计划（AVP）领导的参与式行动研究和组织能力强化项目展示了如何通过参与式方法帮助其在斐济、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斯里兰卡的合作伙伴组织吸引志愿者，实现由当地主导的变革。[219] 该项目以当地专业知识为中心，评估了培训、指导以及与国际志愿者的合作如何引入新的视角和创新，从而提高了组织能力。证据表明，志愿者增强了社区层面的效率和网络。[220]

“ 最显著变化 ” 方法是另一种用于监测和评估教育方案绩效的参与式证据收集方法。该方法通常从服务或方案中收集故事，然后系统解释这些故事与促成变化之间的关系（另见第 2 章）。在西岸的青年学习中心，青年志愿者帮助收集了 170 多个来自同龄人、家长和教师的个人故事，讲述他们观察到的变化。[221] 参与者从中挑选出他们认为最能代表通过志愿者活动取得的有意义成果的故事。

最后，照片语音法也是一种常用的参与式研究方法，可更好地了解志愿者在教育环境中参与活动的成果。例如，在南非，参与社区服务学习项目的志愿者学生使用照片语音法来记录并反思他们的经历以及对学习者、社区和他们自身志愿服务实践的影响。[222]

5.5. 衡量志愿服务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中的贡献

志愿者在全球范围内为解决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不平等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实现全球发展的根本。在持续存在严重经济、社会、政治或环境不平等现象的地方，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凝聚力。

不平等现象的形成模式受到基于性别、种族和民族、年龄、残疾、性取向、宗教和移民身份的歧视的影响。如乌干达的情况所示，

> ***在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时，我们不能只依赖假设。数据会显示有多少是妇女和儿童，有多少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或者有多少人患有残疾。这有助于我们设计出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
> Yoojeong Jeong，联合国难民署的联合国志愿业务数据管理助理

新冠肺炎疫情也在某些情境下加剧并深化了志愿服务中的不平等现象。[223] 本章中的实例强调了志愿服务对经济发展、卫生和教育所能做出的贡献，从而解决不平等问题，促进社会变革，并推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议程。

性别不平等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最持久且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形式之一。[224] 在衡量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努力时，定量方法可以突出志愿活动的具体成果，如减少性别暴力事件或改善孕产妇和生殖健康服务的获取途径。但是，我们还需要其他工具来了解志愿者方案如何促进宣传、增强当地社区妇女和女孩的权能，以及帮助转变人们对性别平等的态度。在柬埔寨、加纳、肯尼亚、老挝、塞内加尔和越南，无国界兽医组织北美分会采用混合方法评估其志愿方案对加强合作伙伴组织能力的影响，进而为小农户，尤其是妇女和女孩提供支持。[225] 通过让志愿者、当地专业人士、社区领袖和农民自身参与知识交流，志愿服务衡量过程变得更具参与性，更能响应当地需求。

定性测量方法 —— 通过志愿者、工作人员、合作伙伴组织、社区成员和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 —— 可以揭示社会规范如何造成志愿者角色和责任方面的不平等。反过来，这些数据可以为支持更具包容性和性别敏感性的志愿者倡议提供针对具体情境的建议。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志愿者举行的倾听会探讨了他们的经历、挑战和应对策略，为了解性别如何在各种紧急情境中塑造志愿服务提供了新的证据。[226] 这表明，采用整体方法来衡量志愿服务可以揭示挑战，并为挑战性别化的社会规范提供机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联合国志愿人员 Samapti Chakma（右）在孟加拉国兰加马蒂支持社区主导的气候适应工作。她的任务由特别志愿人员基金（SVF）资助。*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虽然志愿服务往往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但这并非必然，重要的是确保志愿服务举措本身不会无意中加剧不平等。[227] 衡量工具必须具备足够的敏感性，以捕捉志愿服务活动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变化，无论是积极变化还是消极变化。如果忽视或低估

某些形式的志愿服务，就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突显了必须开展能够认识到志愿者贡献多样性的衡量工作。[228]

分列志愿服务数据对于理解性别差异和其他交叉差异至关重要。[229] 这适用于参与程度、参与度、角色和责任以及志愿者方案成果等各个层面。因此，我们必须收集关于志愿者性别、年龄、残疾、种族和民族的信息，同时还要对当地背景保持敏感。这样的分类有助于揭示志愿服务如何反映和影响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当前的报告机制有时无法实现这一点，而缺乏详细数据给衡量工作带来了挑战。在评估志愿服务如何应对不平等现象时，关键是要了解负责衡量志愿者贡献的主体及其工作方式。印度的孙德尔本斯地区将志愿者参与式方法（即照片语音、生命之河、性别特定工作坊）和对性别敏感的社区绘图活动的做法相结合，在探索妇女和男子的志愿服务角色、他们独特的经历以及他们在社区中如何合作或独立工作等方面特别有效。[230]

尽管发展干预措施经常采用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来实现女性赋能的叙事，但这并非必然结果。[231] 如果志愿者方案不挑战社会规范，反而强化对女性作为无偿照护者的期望，可能反而会固化性别等级制度，对改变女性的社会权力和经济地位也毫无贡献。[232] 以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方式衡量志愿服务的影响，可以揭示志愿者生活实际中未被充分表达的见解。例如，埃塞俄比亚的混合方法衡量结果显示，女性社区卫生工作者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因此建议志愿者方案应谨慎管理选拔工作，确保女性的参与不会加剧社会经济或健康方面的差异。[233]

5.6. 结语

志愿服务在解决健康、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上具有巨大潜力。但是，这并非必然结果。若要更好地理解和追踪志愿服务对发展的影响，就需要创新的衡量工具来生成分列数据。社会变革并非一蹴而就。因此，衡量志愿者的贡献应使利益攸关方能够捕捉到志愿服务的长期效应，证明不平等现象减少以及社会规范和价值观逐步转变。衡量志愿者对发展的贡献还需要认识到健康、教育和经济成果之间的相互联系。例如，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教育不仅能改善健康状况，还能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并支持长期的经济稳定。教育程度影响健康状况，而健康状况又影响学习和生产力。要证明志愿服务如何促成这些多维影响，需要采用互补的衡量方法，将关于发展成果的多个数据集的洞察力与志愿者及其所支持社区的实际生活经历相结合。

创新性和参与式方法对于不同群体参与评估志愿者参与的活动对社区的影响尤其有价值，使这些群体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塑造衡量工作的结果。重要的是，这些衡量方法应捕捉难以被看到的志愿服务形式，特别是非正式和社区志愿服务。综合使用这些方法有助于捕捉志愿服务带来的独特社会效益，包括志愿服务如何促进“不让任何人掉队”议程，建立更公平的关系，产生新知识以支持实现关键的发展成果。



一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在厄瓜多尔地震后为应急响应和早期恢复提供支持。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16

6 在多重全球危机之中衡量志愿服务

关键信息

- **志愿者在应对多重危机引发的复杂且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提供至关重要的紧急救援、长期恢复服务，并鼓励社区逐步增强韧性。
- **现有的衡量框架往往将危机视为独立要素，**或仅关注紧急响应阶段，忽视了志愿者在复杂情况中所发挥的多样、交叉作用的全貌。
- **综合且创新的衡量方法能够揭示志愿服务本质和危机动态的信息。**它能够展示志愿服务的演变过程、其多样性、支持社交网络的方式以及对志愿者的影响。此外，它还能揭示危机的演变和联系，以及系统失效的问题。
- **协作开发的适应性混合方法能够实现灵活衡量，**以应对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背景和实践。结合标准化及本土设计的指标能增强可比性，同时对重叠危机不断变化的性质保持敏感。
- **参与式和基于本土的方法可以确保倾听志愿者的声音，**发现隐藏的贡献（尤其是来自边缘化群体的贡献），并追踪志愿活动不断变化的作用、能力和风险。这些方法可支持协调的规划和响应，以匹配社区的能力和需求。
- **衡量工作需要反映志愿者对危机的跨领域响应。**这有助于提高认识，增强团结，并鼓励对多重、重叠危机采取更公正的应对措施。在此过程中，衡量工作积极推动加强韧性，塑造治理，并促成集体行动。

6.1. 相互交织的多重危机中的志愿服务

近年来，气候变化、冲突和经济不稳定等多重全球危机不再相互独立，而是因果关系相互交织，人们也日益意识到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23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这些事件的复合性质描述为“两个或多个可能相互独立或相互关联的危机在因果关系上相互交织——即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剧了各自影响的严重程度——从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显著降低全球行星健康，进而影响人类福祉的前景。这些跨越时空、相互影响、连锁发生的事件或突发（非线性）危机会同时发生，因此造成的危害大于这些危机在孤立状态下（即其宿主系统未如此深度互联）所产生危害的总和。”[235]

尽管危机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并不新鲜，但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相互关联的挑战数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其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各不相同，全球南方的社区往往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236]

志愿者站在应对这些危机及其综合影响的最前沿。与其他行为体相比，当地志愿者往往同时在不同危机内部和之间工作，提供紧急救援和长期恢复，并衔接这些优先事项。当系统不堪重负时，基层努力对于维系社区团结至关重要，[237] 利用当地知识来应对危机对社会造成的综合影响。当地、国家和国际志愿者在危机应对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带来了新的能力、技能和知识，以应对突发威胁和加剧受影响社区现有压力的风险。这些应对重叠危机的活动可以创造一系列新的机遇，催生创新、跨部门合作和行动，其成效超越了应对单一危机情景。

志愿服务跨越了人道主义和发展思维与实践的常规界限，志愿者所承担的角色往往既可归为人道主义，也可归为发展，甚至是其他。

志愿者在危机中的经历不一定与组织应对危机的方式相一致。[238] 志愿服务跨越了人道主义和发展思维与实践的常规界限，志愿者所承担的角色往往既可归为人道主义，也可归为发展，甚至是其他。[239] 同一位志愿者既有可能在地震后自发从废墟中救出人员，也可能参与某个组织清理海滩及防止垃圾污染海洋的活动。他们可能会为住院的邻居送去食物，为遭受丧亲之痛的人提供心理社会支持来促进社会凝聚力，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也承受着精神负担。[240] 在一个被多重危机撕裂的世界中，志愿者的重要性体现在他们能够灵活、迅速地应对多种挑战和情境。

志愿服务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在危机期间，给衡量和理解其范围和影响带来了挑战。志愿者的贡献往往被视为日常应对策略和团结互助 [241] 的一部分，而非被视为志愿服务。[242] 由于这种志愿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纳入统计，[243] 因此我们对于志愿者在应对当前危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仍只了解了一部分。志愿者的贡献跨越了不同组织的优先事项，可能与项目的时间表不匹配，并且根据其具体情况，参与的深度也可能有所不同。志愿者在应对危机后果方面可能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样也无法避免这些后果。在某些情况下，志愿者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情况就是明证。评估危机对志愿服务的影响，对于确保保护和培育开展志愿服务的环境也至关重要。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联合国志愿人员 Zxyleman Nor（右）在菲律宾与联合国驻地协调员 Gustavo Gonzales 交流。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现有的志愿服务衡量方法往往孤立地考虑危机或项目。虽然这可以提供重要的初步概况，了解提供帮助的主体和方式，知晓危机前线的关键信息，志愿人员在应对不可预测且动态变化的环境时

所展现出的灵活性和响应能力，往往不符合传统的干预措施规划或影响评估方法。这意味着，在多重危机背景下，志愿服务的复杂性和贡献可能被忽视。志愿服务能够同时应对个人、社会和地球挑战的证据，可以为制定更广泛的应对策略提供见解。将志愿服务衡量与其他危机数据相结合，有助于更好地匹配志愿服务与这些危机带来的挑战。因此，志愿服务衡量需要超越单个项目、部门和特定时间点。它还需要超越仅仅计算参与人数或评估孤立行为或倡议的影响力。它涉及认识到不同形式的志愿服务如何在不同类型的应对措施中相互联系和相互加强。通过这种方式，衡量工作还可以揭示危机的发生方式、相互联系，以及系统失效的环节和机制。本章通过不同类型的危机及其相互联系的实例，展示了创新的衡量方法如何捕捉志愿服务在应对交叉挑战中的作用，以及这一作用的重要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国际联合国志愿者 Ji Sun Park 支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未爆弹药领域实现性别主流化。*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2*

6.1.1 在相互交织的多重危机中衡量志愿服务的重要性

志愿者们每天都在应对世界各地层出不穷的危机，填补正式系统在压力下出现的空白。[244] 例如，在乌克兰，志愿者在向平民和军事人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法律和心理援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45]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社区志愿者参与了治理与和平会议，以解决流离失所和冲突问题，同时为和平建设工作做出贡献。[246]

志愿者在全球范围内为难民提供支持，包括在欧洲倡导和促进难民权利。[247] 越来越多的证据还表明，难民不仅是援助的接受者，还在非洲和中东的社区中积极从事志愿服务。[248] 作为减少灾害风险活动的一部分，志愿者在泰国协助进行粮食准备工作；[249] 在印度，[250] 他们帮助管理飓风避难所并建造具有气候韧性的住房。志愿者在日常减缓和适应工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在美国植树造林，[251] 在喀麦隆重新造林，[252] 在全球多个国家清理海岸线 [253]。

志愿者还积极促进气候行动的长期能力发展，例如在太平洋岛国倡导气候正义，[254] 在贝宁推广新的生计方法。[255] 除了在危机期间提供现场工作外，数字志愿者还负责翻译信息、绘制受影响地区地图、核实数据以及共享资源，为民众和应急人员提供支持，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256] 以及中国近期应对洪水灾害时所见。[257]

对危机的即时反应可能更容易衡量，因为它们发生在人们高度关注和担忧的时期，并且会产生明显且有序的志愿者响应。[258] 然而，随着危机变得更为复杂且相互关联，需要更细致的衡量方法，以帮助各类行为体更有效地应对这些多重挑战。衡量志愿服务可



Fatoumata Abdoulaye 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在马里的传播与社区参与助理。*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以捕捉社区在面临多重压力和冲击时持续、即时且具有适应性的响应，揭示危机的发展过程和人们的感受。追踪志愿者的行动可以揭示某些事件如何相互触发或加剧，从而有助于确定有效且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干预措施。

在多重危机背景下，志愿服务不仅仅是提供即时响应。通过加强社区在压力下集体行动的纽带，志愿服务能够支持和建立信任、网络和连续性，而这些正是长期韧性的基础。衡量方法需要捕捉这些不同的贡献及其在应对危机中的不同作用。

衡量志愿服务的多元贡献和形式，并理解志愿服务如何融入社会并随时间变化，有助于识别响应的主体、方式以及条件。这可以揭示自下而上、注重关系且往往即兴发挥的志愿行动如何帮助社区应对持续的压力，以及在紧急危机中的动员能力。如果因为难以衡量而忽视这些贡献，尤其是在相互关联的脆弱和受危机影响

专栏 6.1. 在人口流动和流离失所情境下衡量志愿服务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5 年发布的一项研究 [259] 揭示了志愿工作如何受到流离失所经历的影响，以及如何对这些经历作出回应。该研究得出结论：

- ***志愿者填补关键的保护和服务空白：***在流离失所的环境中，特别是在紧急情况和长期危机中，当正规系统不足时，志愿者往往在卫生、教育、性别支持和包容方面发挥作用。
- ***志愿服务与生计息息相关：***对于许多流离失所者而言，志愿服务与生存策略紧密相连。它提供了融入社交网络、学习技能甚至创造收入的机会，从而模糊了公民行动与经济需求之间的界限。
- ***志愿者影响治理与政策：***流离失所的志愿者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他们还是倡导者、领导者，并为地方和国家层面移民与融合政策的制定做出了贡献。
- ***伦理风险：***在人口流动背景下推广志愿服务时，必须认识到给弱势群体增加额外负担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任何记录或支持流离失所背景下的志愿服务的努力，都需要考虑权力动态和剥削风险。

该研究建议，各国政府在将志愿服务作为正式机制纳入国家行动计划时，应提供指标来追踪和衡量志愿者的贡献，以支持对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采取更安全、更有效的应对措施。

的环境中，可能会低估志愿服务的价值和潜力。这些知识可以为更协调、更有效的危机规划和应对提供支持，例如在人员流动和流离失所的背景下（见案例研究专栏 6.1）。

衡量工作能够揭示志愿者在危机情境中所经历的累积情感、身体和社会损失。[260] 在不稳定局势中，志愿者会承担起正式行为体（往往受到组织政策的更好保护）无法履行的职责，此时，这一证据尤为迫切。它也可能挑战聚焦于志愿者“英雄主义”的叙述，但这样做会分散人们对志愿者需要保护和支持的关注。衡量工作如能考虑到志愿者生活经历及其志愿服务条件，[261] 则可为承认并解决志愿者对其所面临风险理解的政策和实践提供支持。这有助于对危机做出更安全、更可持续的应对。

6.2. 危机时期志愿服务衡量的创新方法

在多重危机交织的情况下，衡量志愿服务是一项复杂任务，需要采用能够捕捉其灵活性以及融入社会方式的衡量方法。由于单一方法不足以解决问题，并且不是所有内容都能够或应该被记录下来，因此需要采用一种创造性的混合方法。这种方法能更好地捕捉志愿服务不断演变、具有情境特异性和关系维度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往往被孤立指标所忽视（如第 2 章所述）。

6.2.1. 危机期间志愿服务的发声与参与度衡量

通过外部指导方法收集预先定义的衡量指标，然后衡量志愿服务，这对于进行比较而言非常重要。但是，在危机相互重叠和相互作用，且其影响相互叠加的情况下，孤立的标准指标可能会限制衡量志愿服务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的机会。[262] 这些指标还可能遗漏志愿服务中不太明显且具有特定情境的方面，如非正式支持和自发响应。

让志愿者和受危机影响的社区参与衡量过程，有助于提高所收集数据的质量。参与式、叙述性和社区主导的方法侧重于倾听最接近危机影响和一线应对人员的声音。在危机期间，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可能会加剧。这意味着参与式方法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确保衡量方法涵盖通常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及其利益。这些方法还为志愿者和社区提供了空间，让他们反思并交流在地方层面工作的相互关联性，揭示出适应性、创新性和针对特定情境的应对措施，以及志愿服务的隐性影响。这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区的意义、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以及志愿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见第 2 章）。

结合参与式策略 —— 如日记、绘图和长期嵌入式观察 —— 也有助于捕捉危机中关键且普遍存在的非正式行动形式，以及支撑这些应对措施的网络和相互联系。在孟加拉国，当地青年领导的组织采用了数字叙事、社区见证和社区主导评估等参与式方法，来衡量卫生突发事件和灾害期间的志愿服务情况（见案例研究专栏 6.2）。这使我们了解了志愿服务在各种危机中的社会影响以及对社区志愿者的情感影响。

参与式方法还能增加衡量过程的透明度。在危机时期，这些方法可以防止志愿者数据被滥用。它们能让志愿者定义衡量活动的术语和范围，确定和选择合适的方法，收集和解释数据。例如，在乌干达进行的关于青年难民志愿服务的研究采用了共同设计的方法来设计研究工具。青年难民帮助定义了志愿服务纳入研究的方式，并审查了调查工具，从而揭示了当地对志愿服务的理解和实践。

专栏 6.2. 衡量志愿者在孟加拉国应对多重危机中的影响[263]

在孟加拉国，由当地青年主导的数据收集工作在追踪志愿者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卫生突发事件和反复发生的饥荒期间。其中一种创新方法是利用数字叙事来衡量影响，这一方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地志愿服务激增的启发。通过数字档案，来自 AIM 倡议基金会（Aim Initiative Foundation）的志愿者记录并分享他们的经历。该组织通过分析这些个人的定性叙事，深入了解社区志愿者的情感和社会影响。这包括志愿服务如何支持福祉、增进社区凝聚力，以及在危机中激发认同感和使命感等信息。这种基于叙事的方法还捕捉到了志愿者行动所带来的希望和积极影响，并将故事分享到网上，以激励孟加拉国及其他地区更广泛的参与。

该国采用的另一种衡量方法是在受粮食影响的地区（特别是在 2024 年受到粮食严重影响的费尼、库米拉、诺阿卡利和吉大港地区）开展由社区主导的影响评估。在这些地区，来自人类服务组织（SHBO）的年轻志愿者面对广泛存在的流离失所问题，在分发粮食、提供医疗护理和社区恢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缺乏数据收集机制来衡量志愿者贡献（尤其是自发志愿者的贡献）的情况下，人类服务组织引入了社区见证和参与式评估，直接从居民处收集定性证据，以评估志愿者支持的有效性。这些见解使该组织能够实时调整策略，倡导国家对志愿者的贡献给予更有力的认可。

这些例子表明，衡量危机情境下志愿者的影响，需要灵活且扎根于当地的方法，捕捉到正式和非正式志愿者的具体成果和个人经历，并与受影响社区密切合作。



在葡萄牙波尔图举行的 2025 年第 16 届世界童军辩论赛上，一名童军主持了一场关于青年领导力的对话。*图片来源：*Pablo Cuadra Caro，*世界童军组织*

在将人道主义应对措施本地化以应对危机的背景下，自下而上的衡量方法尤为重要。这意味着，受危机直接影响的人能够针对危机出现和加剧的多种不同方式收集更全面信息。这有助于将危机的不同方面与应对措施联系起来，从而促进协调，避免干预措施相互抵消的情况。

6.2.2. 衡量志愿服务与社会凝聚力

多重危机可能因导致流离失所、不信任和争夺稀缺资源，在社区中造成分裂。志愿者通过在社区内部以及在更广泛的行为体和机构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在促进社会凝聚力[265]和鼓励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桥梁作用在传统的志愿者数据中可能不太明显，

但在应对危机和支离破碎的环境时至关重要。在卢旺达，Abunzi 志愿调解员在解决社区纠纷过程中展现的高成功率，说明了基于社区的志愿服务能够加强社会凝聚力并防止冲突升级，这对于应对多重重叠危机至关重要。[266]

混合方法研究有助于描绘出志愿服务在危机情境中构建社会凝聚力的画面。一项评估采用了前后对比的方法，结合了调查、焦点小组、访谈和“最显著变化”故事，衡量了涉及黎巴嫩和叙利亚年轻难民的社区间志愿服务活动的影响。评估结果显示，即使是短期的志愿服务，特别是当围绕共同目标展开并与软技能培训相结合时，也能显著缓解紧张局势，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在难民和当地社区之间建立信任。[267] 这一结论为黎巴嫩的青年融入政策提供了参考，影响了该国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年轻难民。在印度尼西亚，关于志愿者在灾害管理中作用的社区见证和调查数据显示，由于志愿者的努力，社区的抗灾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268] 在英国，通过将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研究，研究人员得以衡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互助进行的当地志愿服务如何促进团结感；来自斯洛伐克的混合方法证据表明，志愿服务与普遍信任和社会凝聚力水平可相互促进（见案例研究专栏 6.3）。

将衡量方法和工具置于具体情境中以分析社会凝聚力也尤为重要。在厄瓜多尔，一项混合方法研究分析了志愿服务生态系统 —— 使用地域标准来阐释实践做法，研究了 2016 年地震和新冠肺炎危机，以及利益相关者关于志愿服务促进社会凝聚力的看法。[270] 这项研究提出了“潜在志愿服务”的概念，承认参与志愿服务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和机遇，并探讨了其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它认识到了各地区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历史和社区动态，确保了以反映当地条件的方式衡量志愿服务。

专栏 6.3. 衡量危机时期志愿活动的社会和关系动态[269]

最近的研究表明，衡量志愿活动的社会和心理维度可以增强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并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基础设施，在危机时期为志愿者提供支持。

在斯洛伐克，马杰伊 · 贝尔大学在教育部的支持以及志愿者中心与组织平台的协助下，对 1020 名成年人开展了一项调查。该调查衡量了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特别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志愿服务。调查评估了志愿服务的频率、类型和背景，以及信任和社区归属感等社会变量。该研究将这些变量同时视为志愿服务的原因及其结果，因此能够采用双向衡量模型。研究显示，信任是志愿服务的动机，而志愿服务反过来又加强了社会联系，尤其是通过非正式的危机驱动活动。研究还观察到，在危机期间，非正式志愿服务有所增加，这为组织在中断期间优先考虑基于社区的举措并维持志愿者参与提供了证据。

在英国，赫瑞瓦特大学采用混合方法，将调查（如频率、时长）与访谈相结合，以探索与社会认同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该研究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出发，结合定性和定量衡量模型，揭示了志愿服务行为与提升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地志愿服务活动营造了一种团结的氛围，有助于减轻志愿者的焦虑情绪。这一发现为与政府磋商提供了依据，并使各组织能够制定以身份认同为重点的策略，以增强志愿者项目在应对危机时的有效性。

这些方法揭示了考虑志愿服务的关系维度和心理维度的重要性，有助于理解如何放大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通过衡量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的频率，并结合信任和身份认同等社会因素，利益相关群体可以了解这些要素如何相互强化，并在危机时期增强社区的韧性。

专栏 6.4. 衡量乌干达年轻难民的志愿服务情况

在流离失所的背景下，志愿服务很少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往往与年轻难民日常生活中的挑战紧密交织在一起。乌干达难民青年志愿服务项目的衡量结果具有多维性，结合了定量调查、定性访谈和视觉照片语音数据。[274]

重要的是，衡量过程并非从问卷开始。团队首先协作建立了合适的基础设施。由年轻难民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帮助制定了志愿服务的定义。他们还参与了调查问卷试点阶段的审查工作。与人道主义和发展组织以及当地政府的主要代表进行访谈，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实践中对志愿服务的理解，而不是基于国际经验做出假设。

这些流程确保了调查工具能够捕捉到可能被忽视的流离失所者的经历。经过这一共同设计流程，调查数据显示，在 3053 名受访者中（均为年轻难民），有 70% 的人表示曾参与过某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证据不仅显示了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数，还揭示了志愿服务与年轻难民经历的关键维度之间的交集，主要包括：

- ***技能：***志愿服务为技能发展提供了途径：40% 的年轻人参与志愿服务是为了学习或获得新技能，而 26% 的年轻人则是为了保持现有技能。但是，定性数据显示，获得机会往往取决于某些特定的技能组合（如语言熟练程度）。
- ***流动性：***72% 的年轻人主要在其所在村庄进行志愿服务，定性数据也显示，志愿服务机会的获取受到流动性的限制。
- ***生计：***在流离失所的背景下，志愿服务尤其与生存和创收紧密相连，对于 33% 的现有志愿者而言，“ 赚钱 ” 是其主要动机。
- ***多种动机：***73% 的受访者选择了不止一个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反映出需要超越 “ 一刀切 ” 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渴望建立社会联系（例如，参与志愿服务以帮助社区和结交朋友）。

6.2.3. 评估志愿者在危机应对中的双重角色

在危机情境中，志愿者往往身兼多重角色。他们提供支持，同时又是自身工作的社区和环境内的成员。他们甚至可能本身就是援助的接受者。这可以塑造他们对当地需求的理解以及参与动机，但也会给衡量工作采取的策略带来挑战。例如，当难民在人道主义响应中做志愿者时，[271] 他们 “ 难民 - 志愿者 ” 的双重身份 [272] 可能导致他们被报告忽略。在衡量方法中妥善考虑志愿者身份的这些方面，可以提供数据，确保根据志愿者的贡献和需求量身定制对他们的支持。

在乌干达，一项研究聚焦于来自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索马里的年轻难民的志愿者经历。这项研究不仅探讨了志愿服务对年轻人的意义，还探讨了志愿服务如何与生计、流动性和身份相关联，如前所述。[273] 在当代危机中，流离失所者往往仅被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加纳办事处儿童保护初级干事 Yubin Cho 通过创新且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法，打击童工现象并增强青年能力，同时借助韩国国际协力团资助的倡议，支持加纳的《加速行动计划（2023-2027）》。*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视为被动的援助接受者，这种方法对衡量工作所使用的假设构成挑战。它展示了年轻难民如何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在应对危机的同时以反映其身份的方式塑造自身角色（见案例研究专栏 6.4）。

在评估志愿者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双重角色时，安全、安保和福祉问题尤为重要。在印度尼西亚锡纳朋火山爆发期间，志愿者在面临环境危害、流离失所和经济困难等多重挑战的情况下迅速动员起来。[275] 他们的努力被视为社区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暴露在有毒火山灰中且未配备适当的防护装备，这让人回想起他们作为应急响应者和社区成员所面临的严重风险。[276] 志愿者安全标准，如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制定的标准，为评估志愿者是否得到充分保护提供了框架，也可作为一种间接的衡量手段。[277]

专栏 6.5. 衡量志愿服务对气候行动和社区韧性的贡献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 年发布的一项研究 [278] 指出了志愿服务长期来看对气候行动和社区韧性贡献的四种主要方式：

- ***知识与能力建设：***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作为培训师、学习者、教育者和知识分享者发挥作用。
- ***灾害防范与应对：***志愿者在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中充当第一响应者。
- ***减缓与适应措施的实施：***志愿者通过执行减缓与适应行动，助力实施国家气候计划。
- ***气候治理：***志愿者积极参与制定和参与气候政策。

除了这些领域外，性别平等和青年主导的气候行动被确定为与所有问题相关的主题，因为志愿者通过性别平等和青年领导力来推动气候正义。本研究建议继续衡量和报告志愿者对气候行动和社区韧性的贡献，以便为国家和全球规划提供信息参考。

6.2.4. 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志愿服务时间衡量

志愿者在危机期间及危机之间持续发挥作用，他们不仅应对日常压力，还在特定紧急情况（无论是突发性还是渐进性）发生前、发生期间和发生后的关键时刻进行动员。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志愿行动中，环境、社会和经济压力交织并逐步演变，志愿者在不同时间框架内参与重叠的活动（见案例研究专栏 6.5）。衡量此类贡献时，需关注随着人们能力、角色和动机的变化，志愿服

在危机情况下衡量志愿服务时，需要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国家和不同志愿者之间公民空间的差异。



国际移民组织 AMOR 中心的联合国志愿专家 Milagros Assuero 及其同事们在厄瓜多尔基多的大街上向移民和难民分发食物、卫生用品包和重要信息。*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2

务如何逐渐变化。危机对社区韧性和个体福祉的累积影响力可能会对参与模式产生影响。可见性较低的志愿服务形式及其影响可能只有在长期内才会显现。侧重于特定时期或时刻的常规监测和评估可能会遗漏一些宝贵信息。调整衡量方法，考虑并纳入纵向指标，有助于突出和加深对个体和社区影响的理解，并为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信息。

纵向视角可以融入定量和定性方法中，例如通过调查或时间使用日记，或采用人种学技术，包括口述历史和叙事访谈，这些方法可以探究逐步变化的动机、经历和影响。自 2019 年以来，一项持续八年的纵向研究一直在追踪澳大利亚志愿者，以分析国际志愿服务如何逐步塑造个人、职业和公民成果。[279] 通过多轮深入的定性访谈，在志愿者在不同国家服务之前、期间和之后对他们进行跟踪，随后在大规模调查中对结果进行检验，以捕捉个人轨迹和更广泛的趋势。[280] 这揭示了志愿者在服务结束后继续向合作组织提供大量非正式支持的新认识。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志愿者还转入了亲社会职业，这表明志愿服务除了应对短期危机任务外，还具有长期的发展影响。这揭示了国际发展援助资金对志愿者项目长期影响这一常被忽视的方面。[281]

6.3. 在危机时期开展志愿服务衡量的挑战与机遇

当多重危机交织在一起时，这会给志愿服务衡量带来挑战，产生众多需求且需要不同的应对措施。志愿者的角色范围从紧急危机应对和减少灾害风险到社区护理、环境保护、宣传和提高认识等长期工作。[282] 志愿者可能会根据新出现的需求转换角色或承担多重角色。这些角色的多样性及其相互重叠的方式，使得衡量行为主体、内容以及确定志愿者的具体贡献变得极具挑战性，尤其是在他们与其他人一起工作时。

某些群体和活动的可见性低，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在危机期间，妇女、青年、移民和少数民族的贡献往往处于社区关怀和互助的最前沿。但是，现有的衡量方法往往主要捕捉更显眼贡献者的行动，这意味着边缘化群体的自愿努力可能被隐藏起来。这不仅歪曲了个人和社区在此背景下的动员方式，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些群体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结合能够平衡可比性与对当地差异敏感性的工具，为新的衡量策略提供了机遇。如前所述，关于印度孙德尔本斯地区志愿活动的参与式研究[283]使参与者（尤其是女性）能够通过自己的照片和日记记录其活动对自己社区的影响。这表明，志愿活动不仅有助于气候适应，还能增强女性的声音和生计机会。这种衡量方法能够捕捉到志愿活动超越气候行动，以应对长期存在的社会挑战的信息。

但是，要想让这些隐性志愿服务形式变得可见，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复杂性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将衡量范围扩大到包括非正式、团结互助或政治敏感的志愿服务形式，可能会使个人和团体受到不必要的关注或审查，甚至可能破坏被视为更具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形式。如果数据显示出志愿服务的能力，还可能增加对“提供服务”的无偿劳动的期望。数据有可能被用来为撤回支持或资源提供理由，从而加剧危机的影响。在危机情况下衡量志愿服务时，需要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国家和不同志愿者之间公民空间的差异。在收集志愿服务信息时，必须承认并减轻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产生的风险，包括在整合志愿者自身的经历和实践做法并将其置于当地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基础上时[284]（另见第 2 章）。

在多重和重叠危机期间出现的状况，也可能破坏衡量志愿服务所需的系统，因为基础设施和机构的削弱限制了数据收集的能力。[285]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可能难免出现损害参与者和研究人员的安全、保障和福祉，甚至是在伦理和数据管理等问题上偷工减料等问题。审查发展和人道主义倡议中的现有衡量活动，可以为志愿服务提供证据，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风险。在发生多重危机时，与当地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并了解志愿者开展工作的背景，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孟加拉国的情况就是明证（见本章前面的案例研究专栏 6.2）。

虽然危机状况带来了限制，但它们也为基于当地洞察推动创新提供了机会。[286]危机局势促使衡量工作考虑到志愿者角色的复杂性、影响、重叠和相互联系，以及权力关系塑造志愿服务的方式（特别是哪些贡献被看到和被重视）。制定更多基于当地的衡量方法，确保捕捉到边缘化群体的经历和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解决衡量风险的问题，并将志愿服务衡量与其他数据来源相结合，这些都是更广泛地衡量志愿服务的重要经验教训。

开发相关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为了生成更多数据，更是为了提升认可度、增强团结，并为应对危机局势提供更综合、更公正的对策。灵活且适应性强的方法可以将衡量方式从自上而下的交付模式转变为反映志愿者自身应对危机的多种方式的策略。如此一来，衡量本身便可成为韧性建设、发展反思、危机治理和公民行动的一部分。

专栏 6.6. 在多重重叠危机期间进行志愿服务衡量的原则

1. 记录志愿服务如何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在应对多重重叠危机（从日常压力、缓慢发展到紧急情况）的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
2. 随着条件的发展，调整所衡量的内容，以反映不断变化的背景、压力和需求，以及志愿者为满足这些需求而不断变化的活动
3. 将志愿行为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当地规范、关系、治理结构、经济制度和公民的角色与责任
4. 认识到非正式、日常和网络化的活动，包括往往处于危机应对前沿、可见性低或被边缘化的志愿行为形式
5. 追踪对危机的即时反应，以及对社会凝聚力和韧性的长期贡献
6. 考虑到志愿者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尤其是在长期或多重危机中工作的志愿者

6.4. 结语

志愿服务是社区应对当今世界多重且相互交织的危机的核心所在。它跨越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网络，将个人、社区和机构紧密相连。志愿服务灵活且不断发展，往往是为了弥补系统性空白而出现，既有助于救援工作，也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社区韧性和促进和平。危机期间的志愿服务不仅限于即时响应工作，还能为促进和平与发展创造新的、多方面的机会。

本章阐述了在危机时期衡量志愿服务的重要性，以及衡量工作的挑战性。有效的衡量工作能够揭示志愿服务的演变方式、志愿者贡献的不同形式、支持志愿服务的网络、获得认可或被忽视的努力，以及志愿者自身受到的影响。此外，它还能提供关于危机演变方式及相互影响的信息。

当危机相互交织、叠加出现时，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状况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策略，以有效衡量志愿者在应对多重且相互交织的挑战时所做出的努力。本章重点介绍了相关工具和方法，它们可通过政府、组织、研究人员和社区共同开发的参与式、适应性和情境敏感的方法帮助捕捉这些信息。在世界面临多重并发危机之际，为确保衡量原则的相关性和有效性，特提出以下原则（见专栏 6.6）。



国际联合国青年志愿者 Seshiru Muraki 是国际移民组织在马达加斯加的一名项目支持助理。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

7 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

关键信息

- **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指标来评估志愿服务的影响。**基于时间和金钱的数值衡量并不能捕捉到志愿服务的全部价值。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可衡量志愿服务对个人、社区和经济体的贡献。
- **GIVE 指数建立在四个权重相同的核心维度之上，**分别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促进志愿服务的环境，而志愿服务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环境。
- **数据缺口依然存在。**志愿者数据不完整且不一致，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同的定义对相互比较造成困难。GIVE 指数框架旨在通过严格选择指标和统一数据来缓解这一问题，尽管它仍然需要进行定性评估。
- **GIVE 指数是一个实用且灵活的行动工具。**它采用简单的等权重评分和灵活的指标，可适应各国国情。GIVE 指数旨在指导政策制定，并鼓励公民参与发展。

7.1. 引言

正如本报告前几章所述，要真正理解志愿服务的意义，必须从整体上加以审视，不仅要看到志愿者的数量和贡献的小时数，还要认识到它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个人、社区、经济和情境因素塑造的复杂、多维概念。针对这些多元要素的有效策略对于促进和管理志愿服务，以最大化其效益和积极的人类影响至关重要。

本报告估计，目前全球劳动年龄人口中有 34.5%（约 21 亿人）每月参与志愿服务（见第 3 章）。这些志愿者为应对贫困、饥饿和不平等这些重大全球挑战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地区。[287] 正如志愿服务为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一样，[288] 它现在被广泛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组成部分。[289] 这种全球认可肯定了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关键战略资产的地位，进一步强调了充分发挥其潜力的必要性。

志愿服务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在发展领域，仍缺乏一个全面且标准化的衡量指标来捕捉志愿服务的多维范围，以及其为个人、社区和经济带来的巨大效益。人类发展指数 [290] 和多维贫困指数 [291] 等既有的综合指数提供了对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评估，并考虑了除收入或消费模式之外的重要因素（另见第 5 章），与此不同，目前尚无等效框架来捕捉志愿服务的多维贡献。如本报告前文所述，过度依赖以志愿者人数和志愿服务小时数为重点的指标，导致我们低估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以及吸引志愿者参与的网络的真正价值。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在 21 世纪初，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及其他几个合作伙伴携手合作，牵头并倡导制定国家数据收集标准工具的举措。通过采用通用志愿服务衡量框架的概念，指导生成及时、可靠且标准化的志愿服务数据。

本章将概述如何构建 GIVE 指数框架，这是使用标准化工具和方法衡量志愿服务的关键步骤，有助于提高世界各地数据的可比性。本报告提出的 GIVE 指数是一个标准化、多维度的综合指数，旨在捕捉和促进全球志愿服务的贡献。GIVE 指数可提供全面的衡量指标，将成为一项强大的宣传工具，用以指导政策制定、为志

愿服务领域的投资提供信息参考，鼓励公民更多参与发展。GIVE 指数生成的数据将有助于衡量志愿服务在各个发展领域的贡献，并将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GIVE 指数框架超越了与志愿服务相关的数字指标，如志愿者人数、捐赠的小时数或工作对应的货币价值等直接与志愿服务行为本身相关的指标。与此相对，其整体视角植根于通过志愿服务所取得的成果，表明志愿服务对个人、社区和社会具有重大影响。这响应了前几章所述的对于多维度衡量方法的需求。GIVE 指数旨在增进对志愿服务真正价值及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社会进步和整体福祉方面作用的理解。

7.2. 志愿服务的定义和关键概念

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采用联合国大会 2001 年通过的关于志愿服务的定义（第 A/RES/56/38 号决议）：“ 志愿服务指自愿开展的一系列广泛活动，包括传统形式的互助和自助、正式服务提供以及其他形式的公民参与，其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利益，且金钱奖励并非主要激励因素。”[292] 与第 3 章中关于全球志愿者工作估测所采用的方法相比，此定义范围更广，涵盖了传统互助、自助、公民参与和有组织的服务提供等多种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在中非共和国的通讯官员 René Ifono 支持一名社区动员者，以提高人们对班加苏尼亚卡里市场麻疹疫情的认识，并动员社区共同抗击疫情。*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

7.3. GIVE 指数的范围

GIVE 指数的构想将其作为衡量志愿服务的一个多维指标，强调志愿服务为个人和社区带来的福祉、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效益。经过广泛的研究以及与包括学者、联合国、政府间组织以及志愿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在内的利益攸关方的深入交流，GIVE 指数纳入了多种视角，使其成为评估志愿服务在个人、社区和经济层面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的有力工具。这些效益之间相互关联且相辅相成。[293] 志愿服务在各个层面都创造了相互关联的效益，但这些效益的程度取决于志愿服务所处的环境。[294] 为了衡量志愿服务的这些方面，GIVE 指数由四个维度组成：

1. 志愿服务为个人提供的独特价值，促进个人成长和满足感（对个人的价值）

2. 志愿服务对社区和社会的贡献，加强联系和韧性（对社区的价值）
3. 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展示其对地方和国家经济的贡献（对经济的价值）
4. 营造一个支持志愿者并为其赋能的环境（有利环境）。

7.4. GIVE 指数的指标

GIVE 指数使用关键指标来衡量志愿服务的直接和间接效益。这包括志愿服务对个人幸福感、社区福利和经济的影响。

7.4.1 志愿服务对个人价值的指标

如本报告第 4 章所述，志愿服务有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促进个人成长，发展技能，创造经济机会，并提高整体生活满意度。例如，研究表明志愿服务与健康效益相关，包括降低死亡率、改善身体机能和更好地管理疾病。[295] 志愿服务还能提升自尊、自我效能和心理健康，从而增强个人的韧性。此外，结构化的志愿服务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减少抑郁症状和改善生活质量相关。[296]

7.4.2 志愿服务对社区和社会价值的指标

如本报告第 5 章所述，志愿服务是社会凝聚力、公民参与和提供有效服务的关键驱动力，为社区和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研究表明，志愿服务能增进社会联系，促进信任，减少孤独感，增强社区韧性。[297] 这些影响在危机期间尤为明显，志愿者在加强灾害防备、应对和恢复的同时，也促进了团结（见第 6 章）。志愿服务还能支持基本服务，特别是在医疗保健领域，比如提升患者体验和帮助在压



Kasunjith Satanarachchi Devesurenda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斯里兰卡办事处的联合国青年志愿者，与残疾人伙伴合作。*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

力下维持卫生系统。[298] 此外，它还可支持教育、环境保护和灾害应对。[299]GIVE 指数可通过衡量志愿服务如何构建社会资本和社区韧性来捕捉其价值，展示志愿服务在促进社会联系和有效提供服务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7.4.3 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指标

志愿服务为个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它构成了国家劳动力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降低服务提供成本为整体经济做出贡献。[300] 如本报告第 5 章所述，关键指标包

GIVE 指数的构想将其作为衡量志愿服务的一个多维指标，强调志愿服务为个人和社区带来的福祉、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效益。

括志愿服务小时数及其替代成本、减少非营利性运营费用、对当地企业的贡献以及更广泛提升社会资本和社区凝聚力。[301] 志愿服务方案还可以为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技能和提高劳动力准备度提供支持。例如，实验证据表明，参与志愿服务增加了获得有薪就业的可能性。[302] 志愿服务还可能支持创新和社会创业。[303]

7.4.4 关于有利环境的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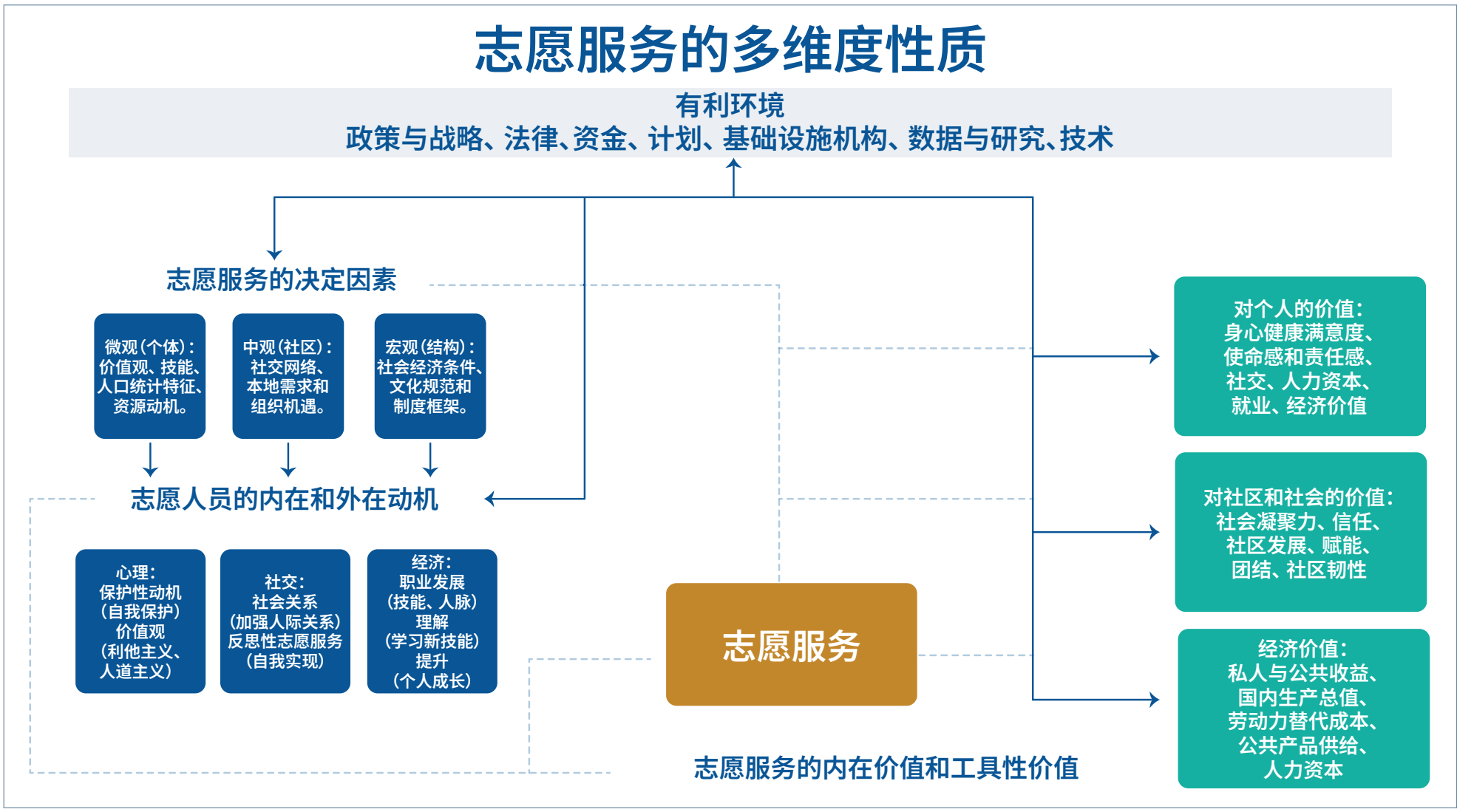
志愿服务所处的环境对于在各个领域加强志愿服至关重要，可确保其产生的效益超越个人收益，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影响。有利环境可帮助将社区努力融入更广泛的发展议程，使经济贡献在国家框架内得到体现。将志愿服务纳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强调，需将志愿服务系统地融入国家战略，并辅以能够展示其经济和社会影响的衡量体系。[304] 成功纳入志愿服务需依赖政治、法律、体制和文化支持，因此，明确的定义和支持性立法至关重要。关于志愿服务的有效法律和政策可以消除障碍，鼓励公民参与，并促进一个国家志愿服务的发展。[305]

本节将重点介绍创造推动志愿服务部门蓬勃发展的有利环境所包含的基本要素：

- 政策和战略整合：将志愿服务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家发展框架；系统地衡量志愿服务的贡献
- 法律和监管环境：制定法律保护志愿者、确保符合道德伦理的实践做法并保护志愿者免受剥削
- 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志愿者中心、数字平台、宣传活动和透明的资助系统
- 组织和管理实践：强有力的领导、明确的角色、专业的志愿者管理和战略整合
- 激励和认可：非财务奖励、灵活的招聘和报销方案
-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行为体之间的紧密合作
- 数据与问责：针对案例研究（如附录 C）开展研究、影响力衡量和透明化报告，揭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明显差异。

在加拿大、挪威和英国等国家，志愿服务框架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消除法律障碍，使志愿者基础设施制度化，并扩大公民参与。这些环境由长期的国家资助和赠款制度维持，体现了浓厚的福利传统。相比之下，在南非和肯尼亚等国家，志愿服务政策往往是为了应对紧迫的发展挑战而出台，如 HIV/AIDS、青年失业和冲突后重建等。在这些背景下，资金往往更多地依赖于捐助方、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政府则更多地发挥促进作用而非核心作用。

图 7.1. 志愿服务的多维度性质



志愿服务治理模式的另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国家主导与民间社会主导。中国和印度代表了强有力的国家主导模式，政府利用中央机构动员志愿者参与国家优先事项。巴西、墨西哥和黎巴嫩等国家则体现了民间社会驱动的倡导模式，即通过基层运动推动国家志愿者法律的实施。来自非洲（特别是南非和肯尼亚）的证据表明，国家可采用传统做法与现代做法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塑造志愿服务，同时辅以有选择性的国家政策。这些发现突显了一个事实：志愿服务的有利环境不仅需要正式立法，还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机构合作以及与当前社会集体行动方式相契合的文化氛围。

总之，志愿服务在个人、社区和经济层面的效益是紧密相连且相辅相成的。但是，它们依赖于一个使志愿服务合法化、得到保护和促进的有利环境。通过包容性政策、法律框架、机构支持和认可机制来加强这一环境，确保志愿服务不仅能够蓬勃发展，还能为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转型做出有意义的贡献。GIVE 指数四个维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图 7.1 所示。

图 7.1 展示了志愿服务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系统。其各个维度通过一系列由政策、法律、资金和基础设施等有利环境促成的双向影响紧密相连。这种有利环境并非被动的背景，而是主动促进或限制志愿服务的一股力量。这个框架表明，志愿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包括其展现的经济价值）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馈循环。这一价值成为提供持续资金支持和扶持性政策的明确理由，而这些政策和资金反过来又增强了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这将创造一个良性循环，通过稳健的有利环境培育志愿服务，志愿服务又产生了切实可见的价值，进而巩固和加强了使之成为可能的环境。这突显了该系统深度互联且自我维持的特性。

7.5. GIVE 指数的构建方法

与其他知名的全球指数类似，开发和计算这个多维度志愿者指数也包含几个关键步骤。本报告提出的 GIVE 指数通过一系列指标从四个维度评估志愿服务：对个人的价值、对社区的价值、对经济的价值以及有利环境。首先，将各指标统一到相同尺度，范围从 0 到 100。然后，计算每个维度内各指标的算术平均值，然后计算四个维度的几何平均值，作为每个国家的 GIVE 指数得分，范围同样为 0 到 100。得分越高，表明志愿服务的前景越有利。如需了解更多详细信息和示例，请参阅附录 C 中的技术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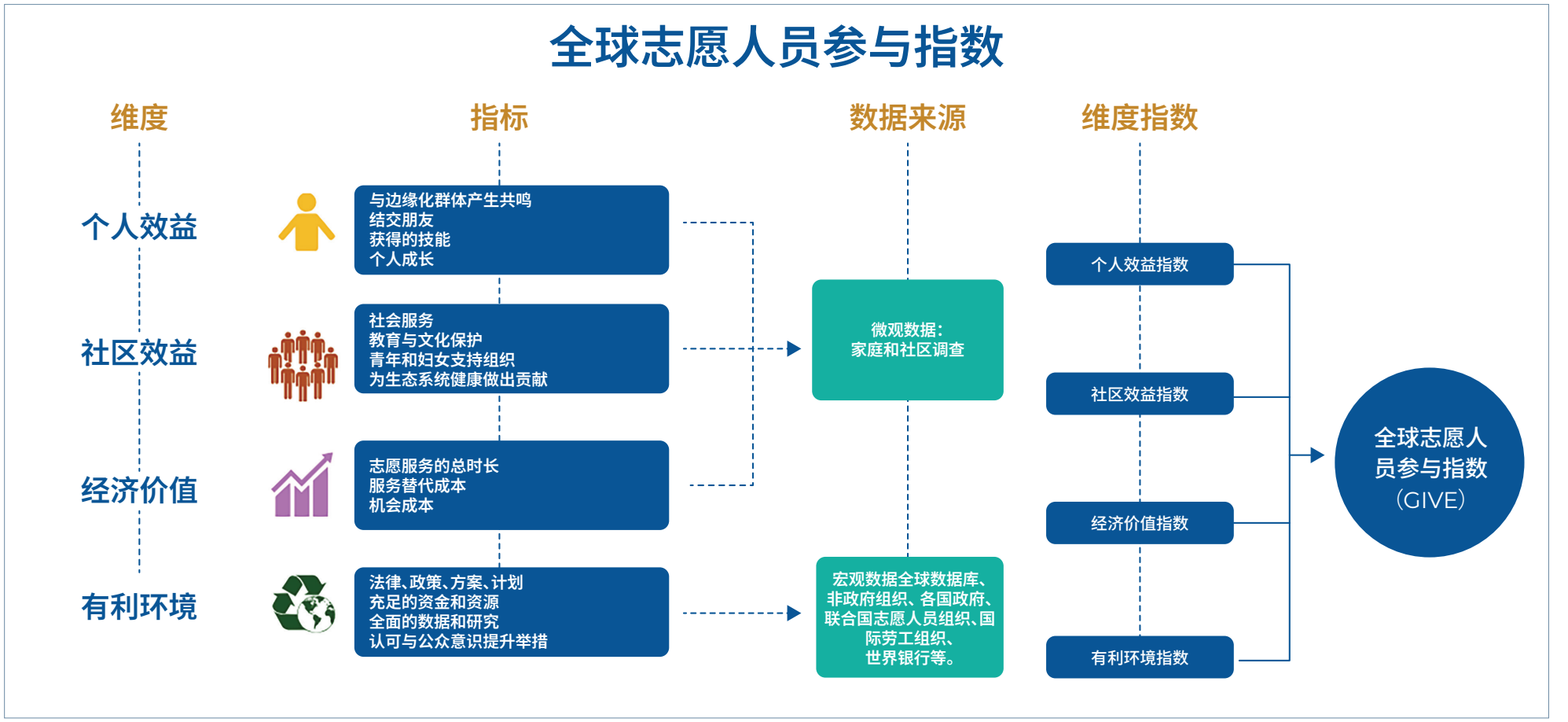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本国联合国志愿人员 Saad Bou Chahine 正在监测黎巴嫩贝卡地区卡布埃利亚斯（Kab Elias）提高青年就业能力的活动。*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

7.5.1 志愿服务数据的来源

为全面了解全球志愿服务数据状况，我们开展了一项全面的数据来源摸底工作，动用了涵盖志愿服务活动不同方面的国际、区域和国家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全球住户调查，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全球晴雨表调查、欧洲和西方代际社会调查、世界捐赠指数调查、时间使用调查、国际劳工组织志愿者活动调查以及针对特定国家的住户调查。这些调查提供了关于志愿服务相关变量和指标的不同定义和覆盖范围，且调查频率各不相同。这些来源共同提供了对志愿服务的广泛见解，涵盖了参与率、动机、公民和政治参与、有利条件以及志愿者贡献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图 7.2. 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



但是，数据摸底工作也揭示了一项重大挑战，即缺乏一种通用方法和跨来源的统一数据，使得进行全球层面的比较变得较为复杂。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摸底工作为未来的标准化提供了宝贵的基线，指出了现有数据框架可以调整的方面，以及需要采用新方法来促进包容性和可比性的方面。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可根据要求提供一份全面的数据矩阵报告，其中包含各种数据来源和相应志愿服务变量的详细信息。

7.5.2 背景和变量的差异

不同调查中变量类型的差异尤其显著。例如，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所有自愿参与的受访者都被要求回答一组 14 个问题，每个问题都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从 1（非常不重要）到 5（非常重要）。该调查的样本指标包括帮助有需要的人、为社会做贡献、提升个人技能和扩大社交网络。在南非的志愿者活动调查中，受访者可以选择的回答选项包括：为自己所信仰的事业提供助力、

为全面了解全球志愿服务数据状况，我们开展了一项全面的数据来源摸底工作，动用了涵盖志愿服务活动不同方面的国际、区域和国家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

因朋友参与志愿服务而参与、获得技能和工作经验、履行宗教义务、发掘个人优势、利用技能和经验以及因个人亲身经历了组织所支持的事业而参与。[306]

同样，非洲社会调查重点关注志愿行为的原因，捕捉动机、社会驱动因素和个人效益。[307] 其他调查，如 “ 时间利用调查 ”，则侧重于满意度、志愿活动的障碍和留存率等方面，生成与感知到的个人效益和志愿机会的包容性相关的变量。[308] 此外，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全球志愿者调查记录了组织和情境指标，如志愿者管理实践和有利于志愿活动的环境。

7.5.3 确定并提取指标变量以构建 GIVE 指数

GIVE 指数的数据选择和收集过程涉及各地区利益攸关方的分析和投入。我们从一开始就进行了磋商，以确定维度和指标。参与者包括来自联合国机构、学术界和区域团体（包括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志愿工作者、统计人员和指标制定者。我们通过这些初步会谈，确认了对于创建志愿服务指数并提供全球衡量工具和统计数据的支持。他们还澄清了一些概念变量和维度，以及方法、统计和数据方面的问题。

为了说明 GIVE 指数背后的计算方法，我们将真实数据和人工数据相结合，创建了两个混合合成数据集。GIVE 指数框架包括四个关键维度，如图 7.2 所示。为了改进加权和汇总的方法，我们与非洲开发银行和学术界的统计师进行了详细讨论。这有助于根据案例研究和结果来选择和加权指标。第 7.2 节对与这四个维度相关的定义和概念进行了解释，并强调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挑战和复杂性。

7.5.4 稳健性检验

本章对多维志愿服务的分析基于若干关于加权和汇总方法以及指标标度的决定。它们是为了验证指数在各子群体中的一致性、稳健性以及所有其他要素。 我们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以评估项目选择、指标标度和加权方案对结果的影响，包括其他连续和分类标度，以及加法和乘法方法。上述检查证明本报告研究结果在各种分析框架下均可维持有效性。有关结果的完整综述，请参阅附录 C 技术说明中的详细部分。

7.6. 结语

本章提出了一个志愿服务综合指数框架，旨在量化并分析全球范围内的志愿服务参与情况。研究表明，直接加权求和聚合方法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它既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损失，又能与早期研究得出的理论见解相契合。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该指数框架的实用性，表明其能够衡量不同数据集的志愿服务活动。该框架以聚合过程中权重相等的假设作为基础。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调整这些权重如何影响推动志愿服务的各项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该框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数值指标（如志愿者贡献的小时数及其工作相关的替代价值）并不能全面反映志愿服务的广泛影响。相反，它们只能代表志愿服务众多方面和内在价值中的一小部分，这突显了考虑更广泛评估维度的重要性。

志愿服务的数据状况，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存在不均衡、不完整等问题。由于传播不畅和缺乏开放获取途径，高质量的分列数据往往已过时且未得到充分利用。志愿服务定义不一致导致指标不足，对开展国际比较造成障碍。非正式志愿服务和数字志愿服务很少被纳入考量，数据收集时间不规则限制了时间序列分析。关于 GIVE 指数的一项关键见解是，尽管它具有结构效度，但由于各种工具中的基本概念本身不同，导致来自各种不同调查的基础数据不一致，而且从根本上无法比较。这是全球指数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GIVE 指数框架试图通过严格的指标选择和数据统一过程来缓解这一问题。但是，为了真正实现全面评估，必须结合定性标准，印证本报告前几章的观点，即采用多维度方法来衡量志愿服务的重要性。

建议使用全面、高质量的家庭调查数据集进行 GIVE 指数计算，如国际劳工组织志愿行动调查（ILO-VAS）、时间使用调查或类似的大规模调查所提供的数据集，这些调查通过家庭而非组织收集关于志愿活动的可比数据。应协助没有志愿者数据的国家开展家庭调查，以评估全球志愿服务的范围、特征和影响 —— 包括正式（通过组织）和非正式（直接帮助个人或社区）志愿服务 —— 通过国家统计局增强对数据和由此得出的 GIVE 指数的承诺和自主性。

政府将逐渐认识到 GIVE 指数作为一项有用的工具，可帮助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志愿者在实现国家目标中发挥的作用。

7.7 关于实施 GIVE 指数的建议

GIVE 指数是承认志愿服务对个人、社区、经济和整个社会多方面效益的决定性步骤。作为一项具有全球可比性和情境敏感性的指数，它应促进我们将志愿服务理解为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鼓励循证决策，并推动公民参与。本质上，GIVE 指数应讲述世界各地人民如何帮助创建更强大、更公平、更具凝聚力的社区，而不仅仅是衡量志愿服务。根据利益攸关方的优先事项，为保证其有效性、采用率和可持续性，提出以下建议。

7.7.1 会员国和政策制定者

政府将逐渐认识到 GIVE 指数作为一项有用的工具，可帮助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志愿者在实现国家目标中发挥的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应：**

- 将志愿服务纳入国家计划和统计中。通过使用 GIVE 指数，展示志愿服务如何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发展优先事项。
- 鼓励数据整合和能力建设。利用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方法，协助国家统计局将标准化的志愿服务模块纳入劳动力或家庭调查中。
-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指标。在保持全球可比性的同时，允许灵活增加与志愿服务文化相关的方面，特别是非正式和社区活动。

7.7.2 联合国实体和多边机构

GIVE 指数是联合国机构用来强调人民参与发展价值的一项工具。

- 将 GIVE 指数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将 GIVE 指数的调查结果与志愿者及公民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联系起来，以展示其作用。
- 鼓励机构间合作。鼓励联合国各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妇女署和国际劳工组织）在利用 GIVE 指数指导关于包容性公民参与的宣传和规划方面进行合作。
- 鼓励技术协调与指导。成立一个专项工作组或技术小组，为各国提供咨询，并确保数据的统一、质量、可比性、技术标准和结果分发。

7.7.3 学术界与研究机构

研究人员应发挥重要作用，完善 GIVE 指数框架并确保其能反映实际经历。**研究人员应：**

- 采用严谨的方法。为保证科学严谨性并提高科学有效性，应不断测试指标、数据来源、加权技术和归一化技术。
- 支持当地研究中心。通过增强大学在志愿服务方面的研究能力，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地区，使它们能够共同主导志愿服务的数据收集和情境分析。



特别志愿人员基金（SVF）支持在哥伦比亚卡利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的志愿者动员工作。*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 通过公开 GIVE 指数的数据和见解，鼓励在衡量社会价值方面开展新的研究和创新。
- 推动开放数据获取。公开 GIVE 指数数据和见解，以鼓励在衡量社会价值方面开展新的研究和创新。

7.7.4 民间社会与志愿者组织

GIVE 指数以志愿者组织和民间社会为核心。其演变必须由它们的声音来塑造。**志愿者组织和民间社会应：**

- 确保参与度和包容性。让基层和地方组织参与收集轶事和验证指标，以展示志愿活动的社会影响。
- 在宣传工作中运用 GIVE 指数。将指数结果转化为易于理解的视觉辅助工具，以支持增加资金和志愿者认可度的论点。
- 展示志愿者的工作成果。利用这些发现来指导改进志愿者管理、激励和认可体系。

7.7.5 企业志愿服务和私营部门的利益攸关方

企业志愿服务和私营部门在实施 GIVE 指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私营部门应：**

- 纳入与企业志愿服务相关的指标。认识到企业如何鼓励基于技能的参与、社会责任和员工志愿服务。
-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将 GIVE 指数与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相匹配，以展示共同的社会影响。

7.7.6 跨领域技术建议

通过扩大对数字、社区和非正式志愿活动的衡量范围，将性别、年龄和多样性纳入考量，尤其是针对妇女、青年和边缘化群体，可增强数据的包容性。**参与使用和实施 GIVE 指数的各方应：**

- 沟通清晰明确。为鼓励公众参与和政策采纳，应创建直观的工具和可视化仪表板，使所有人都能获取 GIVE 指数结果（包括国家概况）。
- 继续完善 GIVE 指数。为确保其保持时效性、透明度和灵活性，应安排定期审查和利益攸关方磋商，以使指数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

7.8 下一步：实施 GIVE 指数

为将 GIVE 指数从概念框架推进为可操作的综合性指数，我们将遵循一项策略，详细阐述如何使该框架在四个维度上（个人影响、

社区影响、经济影响及有利环境）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全面标准化志愿服务衡量指标。该策略将整合全球数据源，为各国和各地区计算 GIVE 指数，并通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互动平台传播结果。**其分阶段的方法包括：**

1. 数据汇编和质量评估：将通过严格的数据质量评估来评估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各国之间以及随时间推移的可比性。将记录数据缺口和局限性，并提出改进数据覆盖面的策略，如将 GIVE 指数相关变量纳入现有的国家或地区家庭调查中。将通过验证官方来源、统一指标、审查元数据、统计调整以及国家层面专家的验证来解决国家数据集中的差异，确保指数的数据可靠性及可比性。
2. 指数构建：此阶段将基于现有和选定数据集，将框架细化为一个全面 GIVE 指数。这包括关于归一化的讨论、加权、聚合、可靠性和试点测试。将为部分国家计算一个原型 GIVE 指数，以评估其有效性和可解释性。
3. GIVE 指数和维度得分的验证、磋商与同行评审： 将举办区域性和全球性研讨会，以展示 GIVE 指数并收集反馈，确保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政策相关性。通过这个迭代过程完善 GIVE 指数。
4. 全球报告与传播：这包括生成 GIVE 指数报告，对各国进行比较并强调主题发现。通过区域性和全球性平台分享 GIVE 指数，包括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联合国和伙伴组织的平台，以及在研讨会期间进行分享。将与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将 GIVE 指数纳入志愿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将通过交互式可视化、地图和仪表板等形式展示发现结果，以提高可访问性并促进政策实施。



国家联合国志愿专家 Wang Caihong 在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担任项目分析师。*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5

5. 制度化与可持续性：为确保 GIVE 指数的长期相关性，将建立制度化机制。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下专设的 GIVE 指数技术工作组将负责数据维护、定期更新和方法审查。GIVE 指数的指标将被纳入全球和国家志愿行动衡量体系，国家统计局的能力也将得到加强。通过国际组织的所有权、定期更新、透明的方法、磋商网络以及纳入政策框架，支持 GIVE 指数的可持续性。



在 10 月 9 日至 13 日举行的波黑可持续发展周期间，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 letsdoitbih 进行了合作。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

8 向前迈进：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下一步是什么？

8.1.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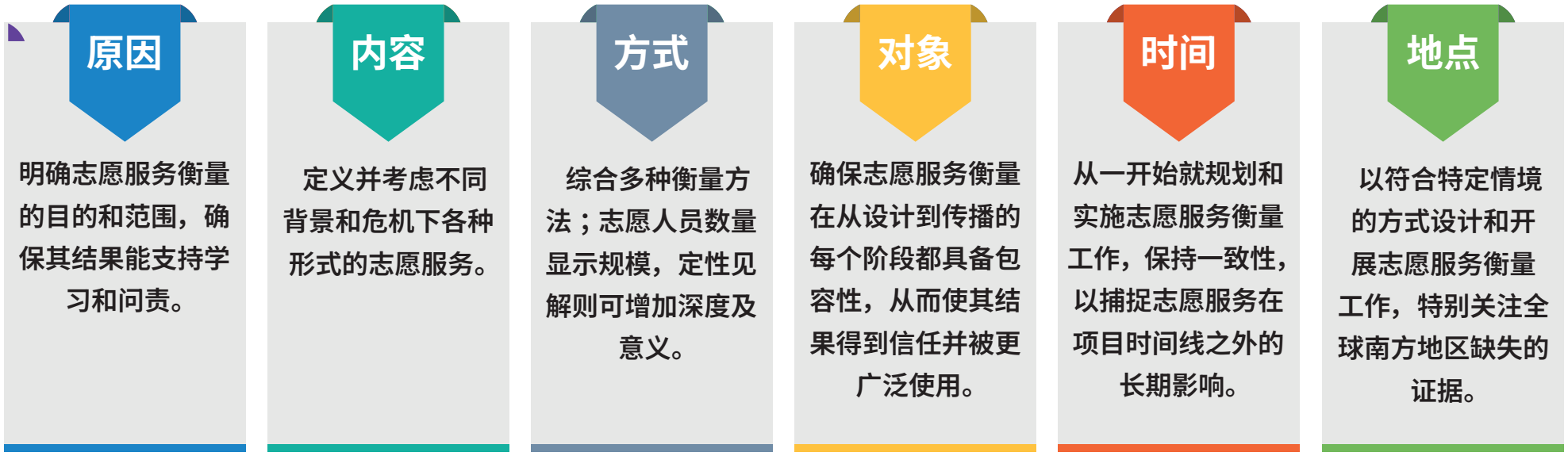
志愿服务衡量工作不断发展，反映了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方法和背景。《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通过参与关于志愿者衡量的最新全球讨论，展示了衡量工作如何捕捉志愿服务在部门内和跨部门对个人、社会、经济和系统所做出的多重贡献。衡量工作展示了志愿服务行动的规模和多样性，提高了其可见度，并支持创造或加强使志愿服务得以蓬勃发展的环境。报告还展示了如何将严谨、可比的数据与包容性强、对背景敏感的方法相结合，以强化在志愿服务衡量讨论中往往被忽视的声音，揭示隐藏的贡献，并推动更公正有效的政策、方案设计和实施。

本章提炼了报告中的关键信息和政策建议，以推进志愿服务衡量工作。它呼吁为志愿服务确定清晰且包容的定义，采用共同设计的多样化衡量方法，注意数据使用的透明度及目的导向性，将衡量工作纳入超越单个项目和危机的长期政策之中，采取能够识别多样化背景且具有全球相关性的方法。在概述推进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途径时，这些建议旨在深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支持更深入地参与可持续发展，并在未来通过志愿服务积累更多知识，以增强个人和社区的韧性。



联合国妇女署的联合国志愿者 Kamila Saidova 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发起的“16 天反性别暴力行动”活动。
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图 8.1.《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关于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建议概览



8.2. 关键信息与政策建议

基于《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的见解，以下关键信息和建议有助于加强志愿服务衡量方面的讨论与实践。本章将重点探讨为获取更具包容性和可比性的志愿服务证据，开展衡量工作的内容、方式、对象、原因、地点和时间。

• 原因?

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衡量志愿服务的原因。若将为其他目的收集的数据脱离原有情境重新使用，可能影响其可靠性或产生误导性。透明地记录关于志愿者和志愿服务数据收集的原因和方式，有助于利益攸关方正确解读结果。将衡量工作视为一项学习工具，有助于在营造有利于志愿服务、志愿者实践和政策的环境方面实现持续改进，同时强化问责制。我们需要全球协同努力，将衡量标准转化为普遍实践。

主要建议：

- **学术和研究机构、民间社会和涉及志愿者的组织以及国家统计局：**明确记录并分享志愿服务衡量工作的原因以及数据收集方法，以确保用户理解其有效性和局限性。
- **会员国、民间社会和涉及志愿者的组织：**将志愿服务衡量工作构建为一项实用工具，以支持学习、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参考并加强问责制，确保积极利用调查结果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
- **会员国和国家统计局：**加大对志愿服务统计数据生产的投入，扩大国家统计局在生成志愿服务数据方面的技术知识，到 2030 年将其作为劳动力或家庭调查的一部分。
-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和会员国：**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继续向会员国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以将标准化的志愿者数据纳入国家调查，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

• 内容?

志愿服务涵盖基于组织的角色和非正式角色、互助、偶发性和持续性参与以及线上和线下参与。这些形式往往涉及特定的发展成果、项目和危机情境。在衡量志愿服务时，一个清晰、可操作且能反映这种广泛性的定义可以防止低估，确保在证据和决策中体现多样化的贡献。在组织和国家政策以及报告标准中使用这样的定义，并清晰说明得出结果的方式，有助于提高可比性，同时认识到志愿者经历的广泛性。衡量志愿服务必须超越单纯计算参与比率，才能捕捉其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这包括开发定量和定性评估方法，以评估正式和非正式志愿者的贡献，特别是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目标相关的贡献。收集此类信息可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以便认可并加强正规结构之外基于社区的社会安全网。

主要建议：

- **会员国、民间社会和涉及志愿者的组织：**采用清晰且包容的志愿服务定义，充分体现志愿服务形式和经历的多样性，并将其纳入国家政策中。
- **国家统计局、民间社会和志愿者组织：**将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纳入报告系统、数据框架和相关立法中，以确保系统、一致地记录所有内容。
- **学术和研究机构、民间社会和志愿者组织：**开发和完善方法论，以捕捉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的影响及社会经济贡献，并将结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指标和社区韧性联系起来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联合国志愿者 Nao Tojo（左）正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工作人员讨论营养教育材料。她的任务得到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支持。*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 方式?

结合多种方法的设计对于捕捉志愿服务的规模和意义至关重要。定量方法能展示其普及程度、强度和趋势，定性方法则能阐释其动机、障碍和变革机制。综合运用多种策略能提高研究的有效性，揭示单一方法可能遗漏的志愿服务维度。清晰的规程、透明的文档记录以及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衡量方法指导，能够确保一致及高质量的衡量过程，同时提高社区的参与度和主人翁意识。

主要建议：

- **会员国、民间社会和涉及志愿者的组织：**推广并激励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评估和正式报告，以生成关于志愿服务的更全面、更细致、更可靠的证据。
- **会员国和国家统计局：**支持将志愿者工作模块纳入国家住户或劳动力调查，并在关于发展报告的过程中纳入对结果的系统分析。
- **学术和研究机构、民间社会和涉及志愿者的组织以及国家统计局：**采用 GIVE 指数并应用其四个关键维度（对个人的价值、对社区的价值、对经济的价值以及维持有利环境）来衡量志愿服务

对象?

如能以包容的方式设计和实施衡量工作，其结果将更具可信度和相关性。让涉及志愿者的组织、社区网络和过去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尤其是来自全球南方的群体）参与其中，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归属感。与志愿者、社区成员、捐赠者、方案管理人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共同设计衡量方法，可增强其正统性。确保畅通的沟通渠道及负责任的数据共享，使不同群体能够利用衡量结果进行学习，加强志愿者推动变革的行动。

主要建议：

- **学术和研究机构、国家统计局、民间社会以及涉及志愿者的组织：**在设计、实施和分析志愿服务衡量工作时，应融入多元视角。
- **联合国实体、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及涉及志愿者的民间社会和组织：**通过线上线下的实践社群，促进学习和知识交流，以探索、测试和完善衡量工具及方法
- **联合国实体、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及涉及志愿者的民间社会和组织：**制作内容清晰、成本实惠的指导工具，并以多种语言和易于获取的格式呈现结果，以便不同群体能够使用和应用衡量工作得出的见解。

时间?

志愿服务的长期影响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感受到。因此，我们应从一开始就规划和实施衡量工作，跨越整个项目生命周期。设计长期的后续活动，可以捕捉到志愿者、社区以及人与国家关系的持续成果，而不仅仅是短期的产出。将这些承诺纳入战略和政策中，可以确保连续性，避免将衡量工作视为事后补充的环节。

主要建议：

- **会员国、民间社会和志愿者组织：**从一开始就将衡量框架纳入志愿服务战略、政策和项目的规划及设计阶段。
- **会员国、民间社会和志愿者组织、学术和研究机构：**开发衡量工具和流程，以便进行长期跟踪、后续评估，并整合能够捕捉项目时间线之外变化的指标

地点?

具有全球意义的衡量标准必须反映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植根社区且应对危机的志愿服务。认识到权力关系如何塑造衡量标准有助于生成更具包容性的证据。应鼓励通过试点和同行学习来关注当地情境，同时酌情保留维持各国和各地区志愿者经历可比性的核心要素。



Rahma Ally Juma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坦桑尼亚的一名国家联合国社区志愿者，同时也是 Bahari Maisha 项目的沿海社区动员者。*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5*

8.3. 结语

如本报告所示，志愿服务既能建立日常联系，促进社会凝聚力，又能在危机时刻提供重要的应对措施。通过有效衡量志愿服务，利益攸关方不仅能认可其对个人、社区和经济的深远贡献，还能为维持和加强志愿服务的有利环境提供必要的证据基础。本报告提出的建议为推进包容、严谨且适应不同部门和背景的衡量实践提供了路线图。

随着志愿服务不断演变以应对全球挑战，理解和评估志愿服务的方法也必须随之发展。通过携手合作改进志愿服务的衡量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支持全球数百万志愿者，他们所作的贡献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为所有人建设更公平的未来至关重要。

主要建议：

- **会员国、民间社会和志愿者组织、学术和研究机构：**分析现有的定义和衡量工作的做法，揭示权力动态如何塑造志愿服务的定义，并调整方法以捕捉被忽视但与当地相关的活动。
-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民间社会和涉及志愿者的组织、学术和研究机构：**为各种群体创造参与空间和工具，以分享知识并促进创新，从而采取更具包容性的衡量方法



来自乌干达的 Evelyn Happy Katono 是联合国难民署在尼日利亚的一名助理外勤干事。*图片来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

附录 A：方法说明

A

公平的伙伴关系与协作工作方式

公平的研究伙伴关系始终是编制《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的核心。我们创建了一个协作且包容的项目合作体系，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作者及合作者能够共同发声，分享经验，塑造报告的主题章节。因此，最终报告能够呈现多元化的声音和经历。

本报告的主题章节（第 1、2、4、5 和 6 章）由来自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技术专家共同主导。诺森比亚大学全球发展中心发挥了关键的协调作用，确保了叙述的连贯性。为确保本报告的撰写符合公平伙伴关系的原则，我们制定了每个章节的编写计划，并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团队达成一致。随后，我们在 2025 年期间对各章节进行了迭代式编写和审查。这一方法强化了 2015 年和 2018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所倡导的弥合地方与全球行动之间鸿沟的合作精神。

伦理考量

为《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第 1、2、4、5 和 6 章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已获得诺森比亚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本报告在编写过程中遵循健全的伦理框架，该框架涵盖了数据完整性、包容性、协作和问责等要素。所有二手数据的使用均符合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和版权法。在引用时，我们特别注意了准确性、相关性和透明度。我们严格遵守个人数据保护规定，确保不包含任何可识别或敏感信息，保证所有线上存储数据的安全。合著者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通过开放式沟通、共同决策和透明文档记录开展合作，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密切协调，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

案例研究

《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的一手数据收集工作侧重于在线上公开征集的案例研究资料，并将其作为对报告所进行的综合二手数据分析的补充。案例研究征集活动持续两个月（2025 年 3 月至 4 月），广泛征集了世界各地用于衡量志愿服务创新方法的实例。征集对象包括个人、组织和从事社区、组织和学术层面志愿服务价值与影响评估的研究人员。在此过程中，我们仅收集了极少的个人数据（即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组织隶属关系），以及每个案例的描述性信息，包括其背景、创新点、成果和经验教训。整个过程自愿参与，且基于知情同意，受访者可以选择匿名提交材料（如被选中发表）。案例研究由诺森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共同选定，以确保方法和区域代表性的平衡。保留的所有可识别细节均已与提供者书面商定，以确保透明度和对其贡献的认可，同时维护项目的道德标准。

除了上述案例研究外，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还精选了大量联合国志愿人员发言并在报告中引用，其收集和使用过程均遵循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道德准则。本报告中使用的所有图片均由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或案例研究方提供，符合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第三方图片使用政策。

《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政策研讨会

作为针对《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建议和影响路径策略的信息工作的一部分，诺森比亚大学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于 2025 年 9 月国际志愿者合作组织（IVCO）年会之前，在柬埔寨暹粒举办了一场关于志愿服务衡量的政策研讨会。研讨会采用参与式方法，来自不同领域的 16 名参与者出席了研讨会，重点关注收集战略性见解，探讨他们面临的挑战，确定创新的知识共享方式，开展建设能力以加强全球志愿服务衡量工作。这确保了本报告的建议和传播方式能够满足行业利益攸关方的需求。

2025 年举行的《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政策研讨会由以下人员参加：Aziza Rahman（孟加拉国统计局）、Edem Mensan Kossi Agode（多哥国家志愿服务机构 - ANVT）、Huong Tran（澳大利亚志愿者计划 - AVP）、Jay Ancheta（国际仁人家园 - HFHI）、Juan Ángel Poyatos（Volies - Voluntariado y Estrategia）、Lucie Morillon（法国志愿者组织）、Mayuko Onuki（早稻田大学）、Mel Godwaldt（加拿大世界大学服务组织 - WUSC）、Papa Diouf（英国志愿服务组织）、Ratherford Mwaruta（津巴布韦工作营协会和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 - CCIVS）以及 Zhai Yan（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本次研讨会由 Bianca Fadel 和 Matt Baillie Smith（诺森比亚大学）以及 Emiliya Asadova（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共同主持，并得到了 Laura Beckwith 和 Janet Clark（诺森比亚大学）的支持。

附录 B：对志愿者比率的全球估测

B

方法说明附件

志愿者比率是指在四周的参考期内，劳动年龄人口（15 岁及以上）中参与志愿工作的人数占比。15 岁及以上人群的志愿者比率区域和全球估测值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统计部为估测劳动力市场指标而开发的方法进行计算。表 A1 列出了志愿者比率估测所涉及的五个区域的国家构成。

本方法说明附件更详细地描述了 (i) 志愿者比率的现有数据，(ii) 数据统一和输入审查的过程，(iii) 在全球和区域层面估测志愿者比率所使用的方法体系，以及 (iv) 为了构建建模方法中使用的协变量而收集和汇编的其他国家层面数据集。

表 A1. 区域构成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阿尔及利亚	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林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安哥拉	阿根廷	伊拉克	澳大利亚	安道尔
贝宁	巴哈马	约旦	孟加拉国	亚美尼亚
博茨瓦纳	巴巴多斯	科威特	不丹	奥地利
布基纳法索	伯利兹	黎巴嫩	文莱达鲁萨兰国	阿塞拜疆
布隆迪	玻利维亚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柬埔寨	白俄罗斯
喀麦隆	巴西	阿曼	中国	比利时
佛得角	加拿大	卡塔尔	库克群岛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沙特阿拉伯	斐济	保加利亚
科摩罗	哥伦比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法属波利尼西亚	海峡群岛
刚果	哥斯达黎加	阿联酋	关岛	克罗地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古巴	也门	中国香港	塞浦路斯
科特迪瓦	多米尼加		印度	捷克
吉布提	多米尼加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	丹麦
埃及	厄瓜多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爱沙尼亚
赤道几内亚	萨尔瓦多		日本	芬兰
厄立特里亚	法属圭亚那		基里巴斯	法国
斯威士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埃塞俄比亚	格陵兰		大韩民国	格鲁吉亚
加蓬	格林纳达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德国
冈比亚	瓜德罗普		中国澳门	希腊
加纳	危地马拉		马来西亚	匈牙利
几内亚	圭亚那		马尔代夫	冰岛
几内亚比绍	海地		马绍尔群岛	爱尔兰
肯尼亚	洪都拉斯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以色列
莱索托	牙买加		蒙古	意大利
利比里亚	马提尼克		缅甸	哈萨克斯坦
利比亚	墨西哥		瑙鲁	吉尔吉斯斯坦
马达加斯加	荷属安的列斯		尼泊尔	拉脱维亚
马拉维	尼加拉瓜		新喀里多尼亚	列支敦士登
马里	巴拿马		新西兰	立陶宛
毛里塔尼亚	巴拉圭		巴基斯坦	卢森堡
毛里求斯	秘鲁		帕劳	马耳他
摩洛哥	波多黎各		巴布亚新几内亚	摩尔多瓦
莫桑比克	圣基茨和尼维斯		菲律宾	摩纳哥共和国
纳米比亚	圣卢西亚		萨摩亚	黑山
尼日尔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新加坡	荷兰
尼日利亚	苏里南		所罗门群岛	北马其顿
卢旺达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斯里兰卡	挪威
留尼汪岛	美国		中国台湾	波兰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美属维尔京群岛		泰国	葡萄牙
塞内加尔	乌拉圭		东帝汶	罗马尼亚
塞舌尔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汤加	俄罗斯联邦
塞拉利昂			图瓦卢	圣马力诺
索马里			瓦努阿图	塞尔维亚
南非			越南	斯洛伐克
南苏丹				斯洛文尼亚
苏丹				西班牙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瑞典
多哥				瑞士
突尼斯				塔吉克斯坦
乌干达				土库曼斯坦
西撒哈拉				土耳其
赞比亚				乌克兰
津巴布韦				英国
				乌兹别克斯坦

1. 数据可用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司（64 个国家）、2021 年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 盖洛普针对志愿服务与新冠肺炎的调查（8 个国家）以及 2025 年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志愿服务调查（8 个国家）提供的所有国家层面数据，计算了区域和全球总体志愿者工作的志愿者比率，以及基于组织和直接志愿者工作的志愿者比率。表 A2 和表 A3 报告了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司关于志愿者比率的数据以及针对志愿服务的两次特别调查的国家覆盖范围。

在所有可用数据源中，关于总人口的总体志愿者比率、基于组织的志愿者比率和直接志愿者比率的信息分别来自 135 个、156 个和 131 个国家年度调查数据，数据涵盖 2008 年至 2025 年。

表 A2. 国家统计数据中可用的志愿者比率数据

国家	总体志愿者比率	直接志愿者比率	基于组织的志愿者比率
阿鲁巴			2010
亚美尼亚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澳大利亚		2019, 2020	2010, 2014, 2016, 2019, 2020
奥地利	2022	2015, 2022	2015, 2022
比利时	2014, 2019	2014, 2015, 2019, 2022	2014, 2015, 2019, 2022
孟加拉国	2010, 2016, 2017, 2022	2010	2010
保加利亚		2015, 2022	2015, 2022
巴西	2016, 2017, 2018, 2019, 2022		
加拿大	2018	2010, 2013, 2018	2010, 2013, 2018
哥伦比亚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佛得角	2022, 2023	2012	2012
哥斯达黎加	2017, 2018, 2019		
塞浦路斯		2015, 2022	2015, 2022
捷克	2023	2015	2015
德国		2015	2015
丹麦	2018, 2019, 2020, 2022	2015	2015
爱沙尼亚		2015, 2022	2015, 2022
芬兰		2015, 2021	2015, 2017, 2021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2016	2016	2016
法国		2015, 2022	2013, 2015, 2022
希腊		2015, 2022	2015, 2022

国家	总体志愿者比率	直接志愿者比率	基于组织的志愿者比率
危地马拉	2019, 2022		
克罗地亚		2015, 2022	2015, 2022
匈牙利	2011, 2014, 2017, 2019, 2020, 2022, 2023	2011, 2014, 2015, 2017, 2019, 2020, 2022, 2023	2011, 2014, 2015, 2017, 2019, 2020, 2022, 2023
印度尼西亚	2017, 2018		
爱尔兰	2013	2015, 2022	2015, 2022
冰岛		2015	2015
以色列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意大利	2013	2013, 2015, 2022	2013, 2015, 2022
日本	2021		
哈萨克斯坦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肯尼亚	2016		
韩国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2023
立陶宛		2015, 2022	2015, 2022
卢森堡		2015, 2022	2015, 2022
拉脱维亚		2015, 2022	2015, 2022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15		
墨西哥	2018		
北马其顿		2015	2015
马耳他		2015, 2022	2015, 2022
蒙古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荷兰	2016	2015, 2022	2015, 2022
挪威		2015, 2022	2011, 2014, 2015, 2017, 2020, 2022
尼泊尔	2018		
新西兰	2018, 2021	2008, 2012, 2016, 2018, 2021	2008, 2012, 2016, 2018, 2021
秘鲁	2017		
波兰	2016, 2022	2010, 2015, 2016, 2022	2010, 2015, 2016, 2022
葡萄牙	2012, 2018	2012, 2015, 2018, 2022	2012, 2015, 2018, 2022
罗马尼亚		2015, 2022	2015, 2022
俄罗斯联邦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沙特阿拉伯	2018	2018	2018
新加坡	2012, 2014, 2016, 2018, 2021, 2023		
塞拉利昂	2014		

国家	总体志愿者比率	直接志愿者比率	基于组织的志愿者比率
塞尔维亚		2015, 2022	2015, 2022
斯洛伐克		2015, 2022	2015, 2022
斯洛文尼亚	2019	2015, 2019, 2022	2015, 2019, 2022
南非	2010, 2014, 2018	2010, 2014, 2018	2010, 2014, 2018
西班牙		2015, 2022	2015, 2022
瑞典		2015, 2022	2015, 2022
瑞士	2010, 2013, 2016, 2020	2010, 2013, 2015, 2016, 2020	2010, 2013, 2015, 2016, 2020
塔吉克斯坦	2016	2016	2016
乌克兰	2021	2021	202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014,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美国			2013, 2014, 2015, 2017, 2019, 2021, 2023

表 A3. 来自特别调查的志愿者比率数据

2021年调查			2025年调查		
国家	区域	收入群体	国家	区域	收入群体
玻利维亚	美洲	中低收入	玻利维亚	美洲	中低收入
印度	亚太地区	中低收入	中国	亚太地区	中高收入
肯尼亚	非洲	中低收入	埃塞俄比亚	非洲	低收入
黎巴嫩	阿拉伯国家	中低收入	印度	亚太地区	中低收入
塞内加尔	非洲	中低收入	伊拉克	阿拉伯国家	中高收入
泰国	亚太地区	中高收入	约旦	阿拉伯国家	中低收入
土耳其	欧洲和中亚	中低收入	尼日利亚	非洲	中低收入
乌兹别克斯坦	欧洲和中亚	中低收入	乌干达	非洲	低收入

2. 数据统一与输入审查

为编制具有可比性的全球和区域志愿者工作估测数据，首先按照第 19 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的定义，将基础输入数据统一为标准的四周参考期。在现有的国家 - 年份调查数据中，约有 20% 已与推荐的参考期相符。但是，约 56% 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数据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 盖洛普特别调查）使用的是 52 周（一年）的参考期，其余数据使用的则是一周（七天）或 12 周（三个月）的参考期。

为确保可比性，所有按其他参考期报告的比率均使用按以下步骤得出的调整系数转换为四周等效值：

1. **按参考期计算的平均比率：**针对每种类型的志愿者工作（总体志愿者工作、直接志愿者工作和基于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以及每个参考期 j（12 周、4 周、1 周或 52 周），使用该参考期计算各个国家 - 年份调查的平均志愿者比率。
2. **参考期特定系数：**对于每种志愿者工作类型，通过将四周的平均志愿者比率除以相应 j 周的平均比率，得出每个参考期 j 的系数。
3. **综合乘数：**对于每个参考期 j，通过计算三种类型特定系数的平均值，得出一个单一乘数。
4. **调整原始比率：**最后，将非四周参考期测得的志愿者比率乘以相关乘数，得出四周等效估测值。

上述数据统一过程隐含假设，在不同参考期计算的志愿者比率均基于具有相似代表性的国家 - 年份样本。鉴于数据覆盖范围有限以及任何给定国家可用的调查和衡量数量存在差异，这一假设不太可能完全成立。使用不同参考期的国家 - 年份调查组得出的平均志愿者比率往往随着所用参考期间的长度而增加。这一模式表明，国家覆盖范围方面不存在重大系统性偏差，因此不会扭曲四周等效估测值的整体可靠性。

然后，对经过统一的国家层面志愿者比率数据进行评估，仅保留被认为在各国之间具有足够可比性和足够质量的观测值。选择标准旨在平衡两个目标：一方面，尽量减少本已稀疏的证据基础中的数据点损失；另一方面，确保保留的输入数据尽可能一致，并与在生成估测值时使用的第 19 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关于志愿者工作的定义保持高度一致。

以下情况得出的数据点将被排除：关于不同类型志愿者工作活动的信息存在内部不一致 —— 例如，报告的直接志愿者工作比率超过了总体志愿者工作比率。当同一国家有多个观测值但随时间表现出明显的不连续性时，该数据也予以排除，这通常反映了调查方法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优先考虑最新数据，因为这些数据被认为能更准确地反映当前的志愿服务模式，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使用了更优化的衡量方法进行收集。这一审查过程汇集了所有数据来源和按性别分类的信息，共得到 352 项国家层面的总体志愿者比率衡量结果，以及 350 项和 435 项国家层面的直接志愿者工作和基于组织的志愿者工作衡量结果。

3. 志愿者比率估测方法

全球和区域志愿者比率估测所采用的建模方法严格遵循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测数据集为估测劳动力市场指标而采用的方法。首先，对 189 个国家 2008 年至 2025 年所有年份的志愿者比率进行估测。为此，建模方法利用了志愿者比率与其他国家特定特征（以及尽可能的性别特定特征）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建模方法首先估算 2008 年至 2025 年所有国家和年份的总体志愿者比率，并按性别进行分列。然后，对所有国家 - 年份组合的直接志愿者工作和基于组织的志愿者工作的志愿者比率进行估测。最后，将国家估测值汇总到区域或全球层面，以得出总体志愿者工作、基于组织的志愿者工作和直接志愿者工作的区域和全球志愿者比率估测值。

3.1 总体志愿者比率的建模方法

并不是所有提供志愿服务相关数据的国家都会报告总体志愿者比率的统计数据。更具体地说，对于一些国家，我们只能获得关于直接志愿者工作和基于组织的志愿者工作的信息。为了最大限度地丰富数据库的信息内容，**建模方法首先确定能够获得关于直接志愿者工作和 / 或基于组织的志愿者工作等部分信息的国家 - 年份，**

并估测其总体志愿者比率。

这个过程利用了不同志愿服务类型之间的关系，在直接志愿服务数据和基于组织的志愿服务数据同时可用但缺少总体志愿者工作信息的情况下，估测国家 - 年份的总体志愿者比率。为此，我们使用回归模型来预测总体志愿者比率，建立这两个自变量的函数，并允许其关系因地区和性别而变化。然后，将总体志愿者比率的预测值与实际数据相结合。如果已有国家层面的总体志愿者比率的实际信息，就直接将其作为模型的输入数据，缺失值则用基于组织的志愿者比率和直接志愿者比率得出的预测值来填补。这种方法将可用于构建总体志愿者比率模型的数据点数量最大化。

接下来，我们估测了 2008 年至 2025 年期间 189 个国家的总体志愿者比率。建模方法借鉴了总体志愿者工作普及率与一系列国家特定特征之间观察到的关系。建模方法选择包含哪些特征或变量，取决于哪些国家特定维度能在国家层面最准确预测志愿工作参与度。考虑用于测试的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贫困率、城市化率）、人口特征（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劳动力市场指标（劳动力参与率、失业率）、社会和公民资本指标、宗教虔诚度，以及献血者和红十字会志愿者人数数据。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纳入了性别特定数据，以使估测结果能够反映性别差异。对于在总体志愿者比率上没有任何相关信息的国家，这个模型还以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信息为基础估测了总体志愿者比率区域平均值并作为基准。

有几种不同的统计模型或“规范”可用于预测志愿者比例。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确定哪种规范能得出最准确、最公正的估测结果。为此，我们采用了一种称为交叉验证的程序，对多个候选模型进行测试，并确定能够最小化预测误差的模型。该过程包括在数据的随机子集上反复估测模型，预测缺失值并计算相关误差。然后，使用伪样本外均方根误差对每个模型进行评估，从而选择能提供最可靠估测结果的统计关系。我们还按性别分别估测志愿者比率，因此为男性和女性分别开发了不同的模型，并且随后对所得结果进行调整，以确保与总体估测结果的一致性。

由于志愿者比率的结果为 0-1 区间内的数值，因此在估测之前需对目标变量进行 logit 变换。变换之后的变量用于交叉验证过程。在选定最佳模型并得到估测值之后，我们将再次使用逆对数转换将这些估测值转为 0-1 区间内的数值。

3.2 直接志愿者比率和基于组织的志愿者比率建模方法

在生成所有国家 - 年份组合的总体志愿者比率估测值之后，建模策略就会分别估测直接志愿者比率和基于组织的志愿者比率。这些估测值的生成方式与总体志愿工作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回归模型中，总体志愿者比率的估测值将被作为基准，以确定直接志愿工作和基于组织的志愿工作的合理比率，并确保模型估测得出的直接志愿者比率和基于组织的志愿者比率均不高于总体志愿者比率的估测值。同时，我们还会进行平衡调整，以确保男性和女性的志愿者比率与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志愿者比率估测值在内部保持一致。

3.3 从国家层面估测到合计估测

在分别得出每年按性别分列的国家层面总体、直接和基于组织的志愿者比率估测值之后，下一步是得出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志愿工作估测值。为此，首先将国家层面的志愿者比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数据相结合，算出每个国家和年份从事志愿工作的人数。志愿工作人数估测以《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4 年修订版》为基准，它提供了按五年年龄组细分的人口总数估计和预测数据。将各国劳动年龄人口作为推算从事志愿工作人数估测值的基数。根据国际工作统计标准（该标准有助于各国比率之间的可比性），劳动年龄人口包括所有年满 15 岁的个人。

表 A4. 总体志愿服务比率的替代估测

区域	2018-2021年平均值	2018-2025年平均值	2022-2025年平均值
非洲	52.4	55.5	58.5
美洲	23.4	26.8	30.3
阿拉伯国家	25.3	24.6	24.0
亚太地区	29.1	30.5	31.8
欧洲和中亚	24.4	24.3	24.2
全球	30.9	32.7	34.5

国家层面的志愿者人数随后被汇总到区域和全球层面，并以相应区域或全球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表示，从而得出每年可比较的区域志愿者比率。为解决直接数据点有限以及对推算值的依赖问题，本章中最终呈现的区域和全球估测值是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估测值的平均值。这种平均方法平滑了年度间的波动，缓解了对于特定年份数据稀疏的担忧，并为全球和区域志愿者比率提供了更稳健的估测结果。

下表 A4 列出了基于不同时期计算的全球和区域平均志愿者比率得出的总体志愿者比率估测值。第 1 列显示基于 2018 年至 2021 年的估测值；第 2 列显示基于 2018 年至 2025 年的估测值；第 3 列显示本章报告的基于 2022 年至 2025 年的首选估测值。

4. 额外数据来源

我们整合了来自多个数据源的信息，以生成一个协变量数据集，作为基于回归的方法的一部分，用于估测志愿者比率（有关估测方法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见下文）。表 A5 列出了主要关注变量和相关数据源，这些变量大致可分为反映公民资本和宗教虔诚度的协变量、经济发展指标、劳动力市场指标以及其他志愿服务衡量指标。

对于劳动力市场指标以外的协变量，若某一变量的信息在某些国家 - 年份缺失，则采用以下插补技巧：

- 对于某一协变量有部分信息的国家，使用现有数据插值来填补缺失年份的信息。
- 对于某一协变量无任何信息的国家，则使用区域平均值来填补缺失信息。

表 A5. 数据来源和协变量的定义

变量	定义	来源
公民资本	综合指数，遵循Guiso、Sapienza和Zingales (2011) 的方法 (总体和按性别分列)	综合价值观调查 (1981-2022)
宗教虔诚度 (%)	认为宗教在其生活中重要或非常重要的个人比例 (总体和按性别分列)	综合价值观调查 (1981-2022)
人力资本指数	综合指数	世界银行
人类发展指数	综合指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国内生产总值 (GDP)	2021年人均GDP (按购买力平价，国际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和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司数据库
劳动力参与率 (%)	劳动年龄人口中劳动力所占比例 (总体和按性别分列)	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测数据集，2024年11月
失业率 (%)	失业劳动力所占比例 (总体和按性别分列)	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测数据集，2024年11月
红十字会志愿者 (%)	登记为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总体和按性别分列)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联会网络数据库
献血者 (%)	登记献血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 (总体和按性别分列)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联会网络数据库

对于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协变量（即劳动力参与率和失业率），我们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模型估测值作为解释变量，而不是用劳动力调查实际数据插值，或为没有数据的国家插补区域平均值。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测值系列提供了一套完整且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劳动力统计数据，包括国家报告的观测值和为数据缺失的国家插补的数据。这些插补值通过国际劳工组织维护的一系列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出，它们依赖于国家特征与目标劳动力市场变量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优于用现有数据的简单插值或通过区域平均值插补，因为它允许使用国家特定的信息来插补数据缺失国家的劳动力和失业率。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信息非常有限或完全缺失的国家，其估测值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并且随着新数据的出现，这些估测值可能会被修订。

表 A6. 关于有利环境的国别案例研究

国家	法律 / 政策	融资机制	协作组织 / 策略	关键重点领域
巴西	《社会志愿服务法》（2004 年）	联邦资金、州资源、企业社会责任捐款	国家委员会将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联系起来；与学校 / 大学建立伙伴关系	公民责任、社会发展
加拿大	《国家志愿人员战略》（2001 年，已更新）；省级框架	联邦和省级资金；向志愿者中心提供补助金	加拿大志愿者组织负责协调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网络；国家志愿者周	公民参与、社区服务、包容性
中国	《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服务法（草案）》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资助	共青团和北京市志愿者协会；国家主导的登记和动员	灾难应对、大型活动（如奥运会）、减贫
印度	《国家志愿部门政策》（2006 年）；《国家服务计划》（NSS）；Nehru Yuva Kendra Sangathan (NYKS)	政府对 NSS/NYKS 的拨款；各领域的捐助资金	大学、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与政府合作	青年动员、健康、卫生、教育
肯尼亚	《国家志愿服务政策草案》（2008 年及以后）	捐助机构（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欧盟）和民间社会组织资源	肯尼亚国家志愿服务方案；与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政府的合作	青年就业、公民服务、发展目标
黎巴嫩	国家志愿服务常设委员会（无独立法律）	国际捐赠者和非政府组织；国家资金支持极少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部；青年营；倡导课程改革	公民意识更新、青年发展、社会凝聚力
墨西哥	《社会志愿服务法》（2005 年）	混合公共和私人资金；慈善支持	国家志愿服务委员会和国家志愿服务网络；非政府组织 - 大学 - 政府合作伙伴关系	社区发展、灾害应对、社会公平
挪威	《志愿者权利法》（2000 年代）；国家与民间社会契约	非政府组织拥有强大的公共资助体系	制度化对话；志愿者委员会；国家与民间社会协议	公民参与，基于权利的志愿者支持
南非	《灾害管理法》（2002 年）；《卫生指南》（2001 年）；《移民法》（2004 年）	捐助方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国家预算有限	非政府组织、信仰组织、国际捐赠者；将“乌班图”哲学融入志愿者政策	灾害应对、艾滋病毒 / 艾滋病护理、社区卫生
英国	《国家最低工资法》（1998 年，志愿者豁免）；《志愿服务基础设施战略》（2004 年）	政府为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地方中心提供支持	英格兰志愿服务组织、苏格兰志愿服务组织、英国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会和地方中心；雇主支持的志愿服务；全国性活动	公民参与、社区服务、地方发展

附录 C：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的框架

C

技术说明

GIVE 指数是一项衡量志愿服务的多维指标，它突出了志愿服务的各个方面，强调了志愿服务为个人和社区带来的福祉、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效益。该指标根据志愿服务小时数、组织的替代成本（通过估算用带薪员工替代志愿者的费用来量化志愿服务的效益）等指标，以及关于促进志愿服务因素的全国数据，来评估志愿服务的经济贡献。GIVE 指数利用家庭调查中的微观数据来衡量个人和社区层面的志愿服务价值，同时衡量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与人类发展指数要求所有指标均来自同一项调查不同，GIVE 指数允许微观层面的数据来自不同的家庭调查。

GIVE 指数框架的开发涉及广泛的研究以及与利益攸关方的深入交流，包括学者、联合国、政府间组织以及志愿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等各领域的代表。这种协作方式确保了 GIVE 指数框架能够融合多元视角，使其成为评估个人和社区层面志愿服务的有力工具。关于整体方法的更多细节以及用于计算 GIVE 指数及其组成部分的 Stata 程序（Stata do-files）将稍后发布。

GIVE 指数在实施时需依赖多个国家的全国家庭调查。它将采用与本报告所示相同的功能形式和指标，涵盖四个维度：对个人的价值、对社区的价值、对经济的价值以及有利环境。这些维度将被赋予同等权重，采用与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5）和多维贫困指数（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3）等知名全球指数类似的方法。评分系统设计为最高 100%，四个维度平均分配，每个维度最高为 25%。每个维度内的指标数量将根据情境相关性和数据可用性而有所不同，从而为衡量志愿服务提供量身定制的方法。建议每个维度包含 4 至 10 个指标，其中经济维度至少包含两个指标。每个指标将被分配相应权重，等于 1 除以所在维度内的指标数量。

总之，GIVE 指数是一项全面衡量志愿服务复杂性的工作。它采用的方法整合了多样化的数据来源和利益攸关方的反馈，旨在为志愿服务如何促进个人和社区福祉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过程

在设计和开发 GIVE 指数框架的过程中，我们针对指标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志愿服务分数的综合影响做出了多项复杂决定。例如，分析单位、包含的维度（或指标）、每个指标中确定主动志愿服务行为的适当临界点、用于将志愿者的多个指标聚合为单一分数的结构（包括权重），以及如何根据加权总分确定一个人是否为主动志愿者。

例如，我们可以使用维度（或指标）来评估对象的志愿服务情况。个体 i 在指标 j 上的志愿服务水平用 y_{ij} 表示 (i=1,2,...,n. j=1,2,...,d)，

其中 n 和 d 分别是被考虑的志愿者和指标的数值。 根据每个指标相对于其他指标的价值赋予其权重。

每个指标的相对权重在所有对象中相同，用 w_j 表示，且所有 w_j 之和等于 1。生成 GIVE 分指数的最后一个步骤是选择聚合程序，将多维原始数据转换为一维度量。在正式术语中，这意味着需要指定一个聚合函数，为每个具体的观测指标值集合分配一个指数值。

在此过程中，我们做出了三项关键决定：(i) 归一化方法；(ii) 选择指数的数值形式；以及 (iii) 指定聚合函数的函数形式（Babbie 等，2015）。第三个决策颇具挑战性，因为志愿者指标与维度之间的真实函数关系是未知的。因此，在设计聚合函数时存在相当大的自由度。Munck 和 Verkuilen（2002）指出，这种自由度的一个不利后果在于，我们往往会做出简单且略显武断的函数假设。然而，深入理解这些假设的实证含义至关重要。

归一化方法（如 min-max 归一化和 Z 分数标准化）将显著影响聚合方法的选择以及 GIVE 分数的后续解读。多位研究人员对分数的解读表示了担忧，强调选择不同的归一化方法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最终，归一化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建模者，建模者必须权衡其选择的影响。

利用 Z 分数可以计算每个贡献指标的前两个统计矩，从而形成一个独立于测量单位的统一加权系统。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没有既定框架来确定不同指标相对重要性的情况。另一方面，min-max 归一化技术可以产生一个动态基准，随着指标均值和方差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通常反映的是数据在不同年份之间或不同指标之间的变化，而不是捕捉志愿服务情况的真实潜在变化。在各国实施 GIVE 指数后，可以采用基于基准年的均值和标准差对 Z 分数进行归一化的方法来提高分数的清晰度和一致性。通过对比这个一致的基线分布来衡量进展，可以创建一个更容易解读，且能随时间保持可比性的基本分数指标。

关于聚合方法，常见的选择包括简单的加权求和法和加权乘积法。对于 GIVE 指数，主要的聚合方法是加法求和法，即通过将加权指标相加来计算个人的志愿服务分数（例如，对个人的影响）（V_s），从而得出一个分数。分数：

$$V_{s(i)} = \sum_{j=1}^{d} w_j y_{ij}$$

与其他知名全球指数（如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经合组织，2018；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组织，2013）一致，建议对每个维度内的指标变量赋予相等权重。与基于专家意见的权重或由 Hastie 等（2009）所述的主成分分析（PCA）得出的权重等替代方法相比，等权重法更为可取。使用相等权重有利于方法的直接性和透明度，确保指数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得到同等重视。这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可能由专家主观意见引起的偏差，因为专家主观意见会因个人观点和经历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相等权重简化了沟通和解释，使利益攸关方更容易理解指数，而无需探究复杂的统计解释。它使指标的表示更加民主，在确定总体得分时，每个方面都有平等的发言权。

相比之下，基于专家意见的加权可能会反映相关专家的偏见或偏好，从而可能导致指数结果偏向特定的参数。同样，主成分分析

得出的不同权重会使过程复杂化，引入的复杂性可能会模糊指数的清晰度。虽然主成分分析旨在通过识别变量之间的潜在关系来减少维度，但它有时会导致因方差而非其内在价值过分强调某些因素。最终，选择等权重有助于提高评估过程的一致性和公平性，使指数与透明度和可及性等更广泛的目标保持一致，这与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所取得的成果相似。这一基本原则确保了该指数在进行跨背景和人群比较时仍能作为一项可靠工具。

根据个体能力，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地区或国家层面，所有的个体分数通过均值或中位数进行汇总。

GIVE 指数的四个维度，即个人价值（I_{Indi}）、社区价值 I_{Comm}）、经济价值（I_{Econ}）和有利环境（I_{Enab}），其得分随后被合并成国家综合 GIVE 指数。其聚合过程是将四个维度的得分进行几何平均，即 $(I_{Indi} \times I_{Comm} \times I_{Econ} \times I_{Enab})^{1/4}$。这种整体方法强调了这些因素在推动对全国志愿服务整体理解方面的复杂相互联系。与使用算术平均数不同，该方法还允许各维度存在部分不可补偿性。通过家庭调查获得的微观数据可用于计算与个人、社区和经济价值相关的分指数。此外，与构建其他指数（如人类发展指数）所使用的方法类似，本方法所采用的指标可能来自不同的调查。

为了说明 GIVE 指数背后的计算方法，我们使用了真实数据与人工数据相结合的两个混合合成数据集，后者根据真实数据的人口统计特征生成。这种合成操作基于家庭调查数据，特别捕捉了个人和社区志愿者的贡献。我们在分析中引入了两个变量：通过适当的预测模型确定的参与志愿工作的家庭总数，以及使用全球小时费率计算得出的替代成本。在微观层面采用了等权重，以确保根据可用的特定数据源或调查结果，能够灵活地用一个指标替换另一个指标。这种方法不仅增强了分析的适应性，而且在特定数据有限或不可用时也能做出明智的决策。虽然我们倾向于使用加法方法，但也注意到存在简化假设的可能性，突显了仔细考虑这些选择所带来的实证影响的重要性。

在本方法中，个人和社区指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评分范围从 1（极不重要）到 5（极其重要）。针对每个数据集记录七项个人维度指标和六项社区维度指标。另外还生成两个额外的经济变量：志愿服务的总小时数和相应的每月替代成本。为了进一步补充分析，我们纳入了四项有利因素（方案、法律、计划和政策），每项因素都编码为二元变量，1 分表示存在该因素，0 分表示不存在。

李克特量表和二元响应格式均被归一化为 0 到 100 的标准度量，以百分比表示。在此背景下，100% 的得分表示志愿服务的最优水平。与之相对，0% 的得分表示最差水平，中间得分则反映了志愿服务中可能表现的最大不同程度。

a· 为了对李克特量表指标的值进行归一化，采用了 min-max 归一化方法，公式如下：

$$Ind_{100} = 100 \times \left(\frac{response\text{-}1}{5\text{-}1}\right)$$

其中，“ 回答 ”（response）表示参与者针对该特定指标所选择的答案。在处理多个国家的数据时，为了保持国家层面的分数一致性（即 1 至 5 分），可以对归一化后的国家数据进行重新缩放，使其范围变为 0 至 100。

$$4 \times \left(\frac{\text{country score-sample minimum}}{\text{sample maximum-sample minimum}}\right) + 1$$

b· 对于社区影响维度得分，它根据七项指标中肯定回答的总数计算得出，每个肯定回答计 1 分，它采用二元尺度（0/1）进行衡量，归一化得分计算方法如下：

$$Comm_{100} = 100 \times \left(\frac{\text{no of positives (1)}}{7} \right)$$

其中，“7” 代表用于衡量社区和社会志愿服务价值的指标数量。

c· 在衡量志愿服务小时数时使用以下公式：

$$Hours_{100} = 100 \times \left(\frac{\text{Hours-1}}{\text{160-1}} \right)$$

在此公式中，1 和 160 分别表示个人在一个月内实际可能工作的最小和最大小时数，假设每周标准工作时间为 40 小时。同样，替代成本也使用以下公式进行了归一化：

$$Cost_{100} = 100 \times \left(\frac{\text{response-1}}{\text{5-1}} \right)$$

在此公式中，250 和 4500 分别表示全球每月最低和最高工资。

d· 有利环境维度的评分由肯定回答的简单求和（每个回答计 1 分）构成，其归一化得分计算方式如下：

$$Enabler_{100} = 100 \times \left(\frac{\text{no of positives (1)}}{4} \right)$$

其中，“4” 代表有利环境因素的个数。

计算示例

表 A7 和表 A8 展示了基于两组混合合成数据的结果，每组数据均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子集中的信息。例如，表 A7 分析的 A 国数据显示，志愿服务得分在三个维度上在不同人口群体中的分布较为均匀，每个维度的估计得分约为 50 分（总分为 100 分）。根据所包含的指标，社区维度的得分处于远端较低的位置，表明条件明显更为不利 —— 尤其是在经济指标和有利环境方面。志愿服务的总体价值和效益为 28%，低于 50% 的得分，这主要是由于参与社区活动和与所选社区志愿服务参与指标相关的活动非常有限。

相比之下，如表 A8 所示，B 国志愿服务领域的计算结果突显了志愿服务的极高价值，尤其是在老年妇女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志愿者中。总体而言，个人效益为 77%，而社区的七项指标为 11.00%，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估计为 45%。对于 B 国而言，志愿服务的总体价值和效益估计为 41%，这同样是由于社区和社会中与关键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参与度结果不太理想。

为了测试用于演示的聚合方法的敏感性和稳健性，我们考虑了其他替代方法，如几何平均数和基于主成分分析中第一主成分的权重。图 F1 展示了 B 国在各个维度得分上的结果。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聚合方法的影响，表明了此处所用简单方法的稳健性。我们还通过改变所用指标的数量来计算维度得分，总体上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已展示了如何通过此框架，利用宏观数据以及宏观和国家层面的赋能数据来计算 GIVE 指数。在各国实际实施 GIVE 指数时，需要确定可比的家庭调查数据以及 GIVE 指数的维度和指标，以实现各国间 GIVE 指数的标准化。



表 A7：按重要人口统计特征划分的 GIVE 指数四个维度以及整体 GIVE 指数的汇总统计数据：A 国。

维度和指标	指标权重	维度得分（简单等权平均） 均值，中位数，0-100 分制	维度权重	GIVE 指数 $(I_{Indi} \times I_{Comm} \times I_{Econ} \times I_{Enab})^{1/4}$
对个人的价值 1. 帮助弱势群体 2. 与受苦的人产生共鸣 3. 个人成就感和生活满意度 4. 社会原因 5. 获得新技能和有益的经验 6. 增强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 7. 与经济困难者团结一致 8. 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 9. 带来社会或政治变革 10. 对有需要的人表示同情	1/10	**性别：** 男性：49.89, 50 女性：50.16, 50 **年龄组（岁）** 15-34：50.06, 50.0 35-49：49.81, 50.0 50+：50.26, 50, (0) **教育** 低：50.3, 50.00 中：50.04, 50.00 高：50.10, 50.00 **总体个人指数：**50.03, 50.00	1/4	$(50 \times 1.7 \times 81.0 \times 100)^{1/4} = 28$
对社区的价值 1. 社会福利服务志愿活动 2. 宗教活动志愿活动 3. 地方政治行动团体志愿活动 4. 医疗服务志愿活动 5. 教育与文化活动志愿活动 6. 青年与妇女服务志愿活动 7. 环境和动物权益倡议志愿活动	1/7	**性别：** 男性：1.45, 0.0 女性：1.87, 0.0 **年龄组（岁）** 15-34：0.86, 0, (0) 34-49：1.99, 0, (0) 50+：2.03, 0, (0) **教育** 低：1.71, 0 中：1.64, 0 高：1.64, 0 **社区指数：**1.67, 0	1/4	
对经济的价值（合成数据） 1. 志愿者小时数 2. 成本节约	1/2	**性别：** 男性：80.93, 82.22 女性：80.69, 81.39 **年龄组** 15–34：75.71, 75.22 35–49：82.66, 82.22 50+：84.72, 84.01 **教育** 低：79.68, 79.27 中：81.40, 82.45 高：80.33, 80.70 **经济指数：**80.80, 81.93	1/4	
有利环境 1. 法律 2. 政策 3. 方案 4. 计划	1/4	法律：是：1 政策：是：1 方案：是：1 计划：是：1 **有利指数：**100*4/4=100	1/4	
总计	**4**		**1**	**1**

表 A8：按重要人口统计特征划分的 GIVE 指数四个维度以及整体 GIVE 指数的汇总统计数据：B 国。

维度和指标	指标权重	维度得分（简单等权平均） 均值、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0-100 分制	维度权重	GIVE 指数 $(I_{Indi} \times I_{Comm} \times I_{Econ} \times I_{Enab})^{1/4}$
对个人的价值 1. 帮助弱势群体 2. 与受苦的人产生共鸣 3. 个人成就感和生活满意度 4. 社会原因 5. 获得新技能和有益的经验 6. 增强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 7. 与经济困难者团结一致 8. 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 9. 带来社会或政治变革 10.对有需要的人表示同情	1/10	**性别：** 男性：75.35, 77.5, (27.5) 女性：78.93, 82.5, (20) **年龄组（岁）** 15-34：76.43, 80.0, (25) 35-49：77.15, 80.0, (25) 50+：77.94, 82.5, (25) **教育** 低：77.63, 80.0, (22.5) 中：74.01, 77.5, (25) 高：68.55, 70.0, (32.5) **总体个人指数：**77.07, 80.0, (25)	1/4	$(77 \times 11.7 \times 42.0 \times 75)^{1/4} = 41.0$
对社区的价值 1. 社会福利服务志愿活动 2. 宗教活动志愿活动 3. 地方政治行动团体志愿活动 4. 医疗服务志愿活动 5. 教育与文化活动志愿活动 6. 青年与妇女服务志愿活动 7. 环境和动物权益倡议志愿活动	1/7	**性别：** 男性：10.33, 0.0, (14.29) 女性：13.09, 14.29, (14.29) **年龄组（岁）** 15-34：10.42, 14.29, (14.29) 34-49：12.04, 14.29, (14.29) 50+：12.93, 14.29, (14.29) **教育** 低：11.08, 14.29, (14.29) 中：15.52, 14.28, (14.29) 高：14.29, 14.29, (14.29) **社区指数：**11.66, 14.29, (14.29)	1/4	
对经济的价值（合成数据） 1. 志愿者小时数 2. 成本节约	1/2	**性别：** 男性：46.12, 41.26, (51.72) 女性：48.00, 41.31, (51.73) **年龄组** 15–34：7.59, 0.36, (18.05) 35–49：52.40, 41.31, (28.69) 50+：99.93, 99.92, (0.05) **教育** 低：46.08, 41.27, (51.76) 中：44.96, 41.23, (51.64) 高：39.48, 41.27, (22.86) **经济指数：**47.02, 41.27, (51.71)	1/4	
有利环境 1. 法律 2. 政策 3. 方案 4. 计划	1/4	法律：是：1 政策：是：1 方案：是：1 计划：是：0 **有利指数：**100*3/4=75%	1/4	
总计	**4**		**1**	**1**

图 F1：性别聚合方法所用的 GIVE 维度得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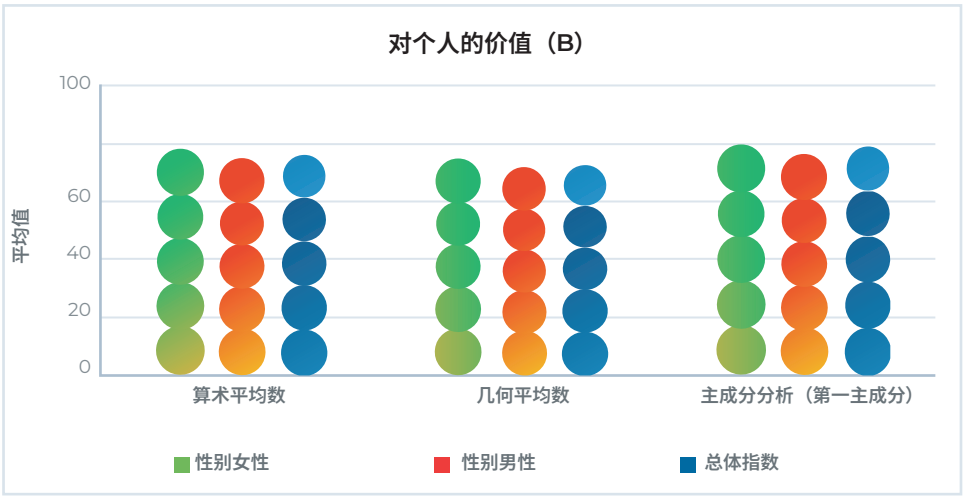


图 F2：年龄相关聚合方法所用的 GIVE 维度得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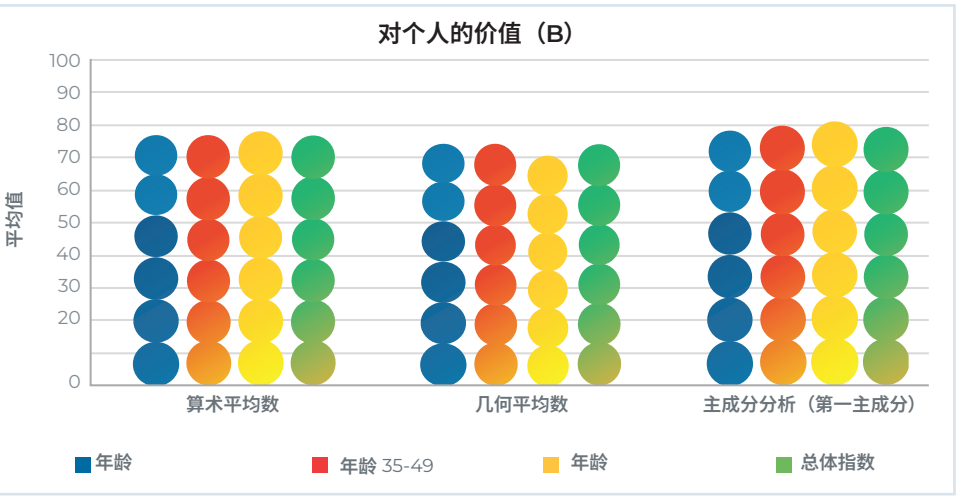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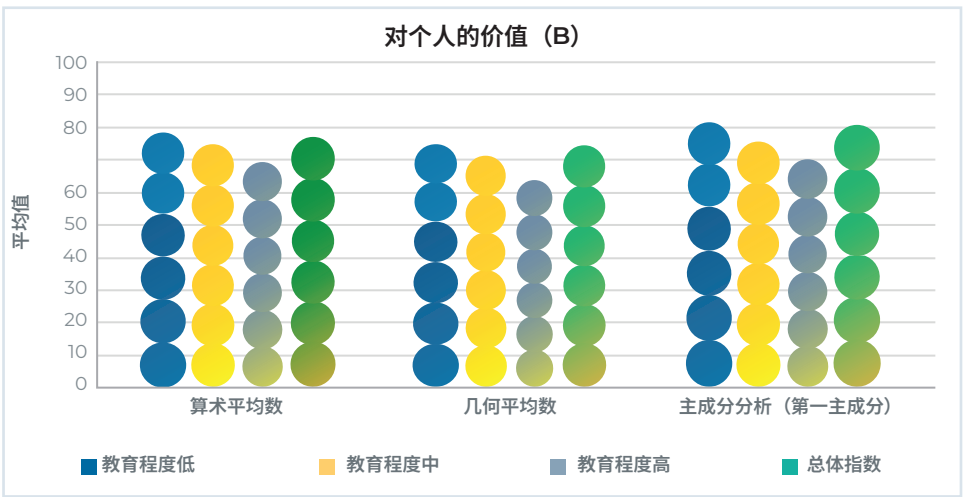


图 F3：教育程度聚合方法所用的 GIVE 维度得分



参考文献

第 1 章

Alam, M.F. (2025)。新冠肺炎与社区志愿服务：在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罗兴亚志愿者如何为社区参与抗击疫情而行动。*《社会指标研究系列》，第 90 卷*，211–234。https://doi.org/10.1007/978-3-031-63440-6_10。

Baillie Smith 等 (2022)。乌干达青年志愿服务的地理分布不均衡：多尺度论述与实践。*《地理论坛》，134*，30–39。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22.05.006。

Barford, A., K. Brockie 和 N. O'Higgins (2024)。*《低收入国家的志愿服务、无偿照护工作与性别》*。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https://knowledge.unv.org/evidence-library/volunteering-unpaid-care-work-and-gender-in-lowerincome-countries。

Fadel, B. 等 (2024)。乌干达难民青年群体中志愿服务的规模、形式与分布。*《人口、空间和地点》*。https://doi.org/10.1002/psp.2817。

Fadel, B. (2020)。志愿服务：将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与社区层面联系起来。由 W. Leal Filho, A. M. Azul, L. Brandli, A. L. Salvia 和 T. Wall 合编，*《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百科全书》*。Springer, Cham。https://doi.org/10.1007/978-3-319-71067-9_64-1。

Fonović, K. (2025)。《全球志愿服务数据采集：推动第三部门研究的机会之窗》，由 Bassi, A., Aquino Alves, M., & Cordery, C. 合编。(2025)。*《第三部门研究的未来》*。https://doi.org/10.1007/978-3-031-67896-7_13。

Guidi, R., K. Fonovic 和 T. Cappadozzi 合编 (2021)。*《探讨志愿服务的多样性：新全球统计标准的测试》*。《施普林格 · 自然》。https://doi.org/10.1007/978-3-030-70546-6。

Haddock, M. 和 P. Devereux (2016)。衡量志愿服务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挑战与机遇。*《Voluntaris：志愿服务期刊》*，4(1), pp. 68–100。https://doi.org/10.5771/2196-3886-2016-1-68。

Hazeldine, S. 和 M. Baillie Smith (2015)。*《全球志愿服务报告综述》*。https://www.ifrc.org/media/13716。

Kamanyi, E. (2024)。通过灾害管理中的志愿服务促进非洲发展：来自坦桑尼亚布科巴区的反思。*《坦桑尼亚人口研究与发展期刊》，31*(2), pp. 55–71。https://www.ajol.info/index.php/tjpsd/article/view/289751。

King, D., 等 (2024)。*建立和维持变革的联系：通过志愿服务促进团结*。诺森比亚大学。会议论文。https://doi.org/10.25398/rd.northumbria.25975255.v1。

Mills, S. 等 (2025)。重新构想志愿服务、危机与不稳定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乌干达难民青年的经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pp. 1–24。https://doi.org/10.1080/14649365.2025.2479689。

Nahkur, O. 等 (2022)。欧洲非正式志愿者参与灾害管理。*《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杂志》，第 83 期，*第 103413 号文章。https://doi.org/10.1016/j.ijdrr.2022.103413。

Srinivasan, A; W.L. Choo 和 L. Lopati (2024)。*《解构国际志愿服务促进发展的 "vā"：将给予运用到关系构建之中》*。诺森比亚大学。会议论文。https://doi.org/10.25398/rd.northumbria.26506621.v1。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0)。*《加快行动与转型路径：实现可持续发展行动与交付的十年》*（秘书长报告，E/2020/59）。联合国。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866445。

联合国大会 (2002)。*《关于支持志愿服务的建议》* (A/RES/56/38)。https://undocs.org/en/A/RES/56/38。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方案 (2011)。*《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全球福祉的普世价值观》*。波恩。https://www.unv.org/publications/2011-state-worlds-volunteerism-report-universal-values-global-well-being。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方案 (2015)。*《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转变治理方式》*。波恩。https://www.unv.org/publications/2015-state-worlds-volunteerism-report-swvr-transforming-governance。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方案 (2018)。*《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联结社区的纽带》*。波恩。https://www.unv.org/publications/swvr2018。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方案 (2021)。*《2022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建设平等和包容的社会》*。波恩。https://swvr2022.unv.org/。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方案 (2023)。*联合国大会宣布 2026 年为 " 国际志愿人员促进可持续发展年 "(A/RES/78/127)*。https://www.unv.org/pressrelease/un-general-assembly-proclaims-2026-international-year-volunteers-sustainable。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志愿者在“不让任何人掉队”中的作用：支持联合国实体和国家政府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https://knowledge.unv.org/system/files/2024-04/57956%20UNV%20LNOB_web_V2.pdf。

第 2 章

非洲联盟委员会 (2025)。*《非洲志愿服务状况报告》*。https://knowledge.unv.org/evidence-library/state-of-volunteerism-in-africa-report。

Ajam Media Collective（2025 年 7 月 22 日）。*《边境上的团结：阿富汗互助网络在大规模驱逐中动员起来》*。Ajam Media Collective。https://ajammc.com/2025/07/22/afghan-solidarity-mass-deportation/。

AmeriCorps (2024)。*《美国的志愿服务与公民生活》*[研究摘要]。https://www.americorps.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volunteering-civic-life-america-research-summary.pdf。

Amreeva, E. 和 T. Sholudko (2024)。《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志愿者活动综述》。公共法律实体。https://knowledge.unv.org/evidence-library/review-of-volunteer-activities-in-the-republic-of-kazakhstan。

Bai, Y. (2013)。基于公共价值的中国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框架。*iBusiness*, 5, pp. 26-29。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f3c5/6a14a36878ccacb7aabfe5611ae0d47df525.pdf。

Baser, H. 和 P. Morgan (2008)。*《能力、变革与绩效：研究报告》*（第 59B 号讨论文件）。欧洲发展政策管理中心 (ECDPM)。http://ecdpm.org/publications/capacity-change-performance-study-report/。

Beardmore, A., M. Jones 和 J. Seal (2023)。成果收获作为小规模社区发展干预措施回顾性评估的方法论。*《评估与方案规划》*，97, 102235。https://doi.org/10.1016/j.evalprogplan.2023.102235。

Chadwick, A., B. Fadel 和 C. Millora (2022)。志愿行为的民族志：关于志愿行为与发展之间联系的细微洞察。*《Voluntas》*, *33*(6), pp. 1172–1178。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1-00389-9。

王储基金会（未注明日期）。*Nahno：青年参与和志愿服务国家平台*。2025 年 9 月 8 日检索自 https://cpf.jo/en/programs/nahno-2/。

Dart, J. 和 R. Davies (2003)。一种基于故事的对话式评估工具：最重要的变革技术。*《美国评估杂志》，24*(2), pp. 137–155。https://doi.org/10.1177/109821400302400202。

Davies, R. 和 J. Dart (2005)。*《最重要的变革技术：使用指南》*。CARE International。https://mande.co.uk/wp-content/uploads/2018/01/MSCGuide.pdf。

Diola, M.F. 和 C. Liamzon (2016)。评估志愿者方案的公共价值：寻找基于社区的协作志愿服务模式。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 12 届国际第三部门研究学会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瑞典，2016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1 日。https://cdn.ymaws.com/www.istr.org/resource/resmgr/WP_Stockholm/10172016/Diola_etal.pdf。

Diola, M.F.L. (2016)。评估志愿者方案的公共价值：寻找基于社区的协作志愿服务模式。菲律宾奎松市：菲律宾大学国家公共管理与治理学院。https://cdn.ymaws.com/www.istr.org/resource/resmgr/WP_Stockholm/10172016/Diola_etal.pdf。

Dostál, J. (2021)。在建议书征询中对志愿服务赋予价值。*SAGE Open, 11*(2)。https://doi.org/10.1177/21582440211009503。

Dostál, J. 等 (2020)。*Ekonomická hodnota dobrovolnictví v teorii a praxi: Souhrnná výzkumná zpráva projektu Česko s dobrovolnictvím počítá*[志愿服务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经济价值：捷克志愿服务项目总结研究报告]。Program Éta。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3268308_Ekonomicka_hodnota_dobrovolnictvi_v_teorii_a_praxi_Souhrnna_vyzkumna_zprava_projektu_Cesko_s_dobrovolnictvim_pocita。

Enjolras, B. (2021)。欧洲志愿服务多样性的解释：能力视角。*Voluntas: 国际志愿与非营利组织期刊，32*(6), pp. 1187–1212。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1-00347-5。

Fonović, K. (2024)。全球范围内志愿服务数据的收集：推进第三部门研究的机会之窗。由 A. Bassi, M. A. Alves 和 C. Cordery 合编，*《第三部门研究的未来》* (pp. 57–72)。施普林格。https://doi.org/10.1007/978-3-031-67896-7_13。

Fonović, K. 等 (2025)。拓展志愿服务衡量的边界：跨国视角下志愿行动的新兴形式 *Voluntaris, 2*。即将出版。

Geelhoed, S. 等 (2021)。改变故事：公共服务创新中系统变革的另一种方法。*《波兰政治科学评论》*，9(2), 52–70。https://doi.org/10.2478/ppsr-2021-0012。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 (2024)。*《2023 年国家志愿者政策》*。*《孟加拉国公报》（特刊）*。https://www.dpp.gov.bd/upload_file/gazettes/52737_77664.pdf。

Hasmath, R. 等 (2025)。*中国公民参与调查*：慈善和志愿活动的关键趋势，*《当代东亚研究杂志》*。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752771。

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 (INEGI)。（未注明日期）。*非营利机构 (ISFL)*。2025 年 10 月 6 日检索自 https://inegi.org.mx/temas/isfl/。

国际志愿服务发展论坛 (2022)。*《全球志愿服务标准》*。https://forum-ids.org/global-volunteering-standard/。

国际劳工组织 (2011)。*《志愿者工作衡量手册》*。国际劳工组织。https://www.ilo.org/publications/manual-measurement-volunteer-work。

国际劳工组织 (2021)。*《志愿者工作衡量指南：关于在国家劳动力调查中实施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志愿者工作附加模块的指导》*。国际劳工组织。https://www.ilo.org/publications/volunteer-work-measurement-guide。

Johnson, R. (2024)。*美国服务队公民参与和志愿服务（CEV）仪表板*。华盛顿特区：美国服务队研究与评估办公室。https://data.americorps.gov/stories/s/AmeriCorps-Civic-Engagement-and-Volunteering-CEV-D/62w6-z7xa

McKinley, D.C. 等 (2017)。公民科学可促进保护科学、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生物保护》*，208, 15–28。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16.05.015。

Metelev, A. P. 等 (2022)。*《志愿者活动的组织以及与面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互动：教材》*（I. V. Mersianova 编）。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https://knowledge.unv.org/evidence-library/the-handbook-of-the-organization-of-volunteer-activities-and-cooperation-with-sociallyoriented-ngos

Meynhardt, T. (2009)。公共价值的内在：什么是公共价值创造？*《国际公共管理杂志》，32*(3–4), pp. 192–219。https://doi.org/10.1080/01900690902732632。

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未注明日期）*。*Dobrovolchestvo*[志愿服务]。https://nko.economy.gov.ru/main/dobrovolchestvo/

Mook, L. (2023)。衡量志愿者投入：讲述完整故事。载于*《非营利核算研究手册》*(pp. 145–164)。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https://doi.org/10.4337/9781800888289.0001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7)。*《伊斯坦布尔宣言》*[第二届经合组织 " 衡量和促进社会进步 " 世界论坛发布的宣言]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networks/oecd-well-being-world-forums/2wf/2nd-OECD-World-Forum-27-30-Jun-2007-Istanbul-Declaration.pdf。

Paine, A.E. 等 (2020)。志愿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超越边界的机会。*《志愿部门评论》，11*(2), 251–260 https://doi.org/10.1332/204080520X15884252988018。

Panter-Brick, C. 等 (2024)。约旦的志愿者方案、赋能与生活满意度：绘制地方知识与系统变革图谱，以指导公共政策和科学外交。*《社会学前沿》，9*, 1371760。https://doi.org/10.3389/fsoc.2024.1371760。

罗珀公共舆论研究中心 (2021)。*关于团结与志愿行动的全国调查 (ENSAV)*[数据集]。康奈尔大学。Roper iPoll。https://ropercenter.cornell.edu/ipoll search?collection=LSM&experimental=NON&q=ensav&tab=STUDY。

Salamon, L.M. (1982)。*《联邦预算与非营利部门》*。城市研究所出版社。

Salamon, L.M. 和 H.K.Anheier (1994)。非营利部门的跨国衡量：一种比较方法。*《Voluntas: 国际志愿与非营利组织期刊》，4*(4), 530–554。https://doi.org/10.1007/BF01398736。

Salamon, L.M., M.A. Haddock 和 S.W.Sokolowski (2019)。*《扶轮志愿服务的范围和规模》*[特别报告]。约翰 · 霍普金斯公民社会研究中心。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Megan-Haddock/publication/337801108_The_Scope_and_Scale_of_Rotary_Volunteering/links/5deab65a299bf10bc3464958/The-Scope-and-Scale-of-Rotary-Volunteering.pdf。

Salamon, L.M., M.A. Haddock 和 S. Toepler (2023)。第三部门的概念、衡量与理论：嵌入统计学及方法论发展，等待更广泛的学术接纳。*《Voluntas: 国际志愿与非营利组织期刊》，34*, pp. 115–125。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2-00468-5。

Salamon, L. M. 和 S.W.Sokolowski (2018)。欧洲第三部门的规模和构成。由 B. Enjolras, L. Salamon, K. Sivesind 和 A. Zimmer 合编，*《作为欧洲可再生资源的第三部门》*(pp. 49–94)。Palgrave Macmillan。https://doi.org/10.1007/978-3-319-71473-8_3。

Salamon, L.M., S.W. Sokolowski 和 M.A. Haddock (2011)。全球志愿者工作的经济价值衡量：概念、估测和未来路线图。*《公共与合作经济学年鉴》，82*(3), pp. 217–252。https://doi.org/10.1111/j.1467-8292.2011.00437.x。

Salamon, L.M.(2021)。志愿服务的共性：共识性全球定义如何适应区域差异以及使用共识性全球定义的重要性。由 R. Guidi, K. Fonović 和 T. Cappadozzi 合编，*《志愿服务的多样性核算》* (pp. 29–52)。施普林格。https://doi.org/10.1007/978-3-030-70546-6_2。

Schneider, M. J., T. Newson 和 C. Schildknecht (2025)。“ 对环境有益的，在其他方面也一定有益 ”：环境志愿服务作为通往环境正义框架的门户。*《社会学谱系》*，pp. 1-14。https://doi.org/10.1080/02732173.2025.2519342。

苏格兰政府（未注明日期）。*苏格兰家庭调查*。2025 年 9 月 8 日检索自 https://www.gov.scot/collections/scottish-household-survey/。

Stiglitz, J., A.K. Sen 和 J.P. Fitoussi (2009)。*《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报告》*。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8131721/8131772/Stiglitz-Sen-Fitoussi-Commission-report.pdf。

Szanto, B. (2025)。*《批判性研究设计：创建综合研究设计的选择与考量》*。（第一版）。劳特利奇出版社。https://doi.org/10.4324/9781003495062。

Turtz, M. (2024)。所有研究模式均为解释性：公共行政的下一步是什么？*《社会认识论评论与回应集》，13*(9), 1–8。https://social-epistemology.com/2024/09/02/all-modes-of-research-are-interpretive-what-is-next-for-public-administration-michael-turtz/。

埃塞克斯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所 (2025)。*《理解社会》：*[数据系列]。*第 14 版*。英国数据服务。序列号：2000053。http://doi.org/10.5255/UKDA-Series-2000053。

联合国（2001 年 12 月 5 日）。国际志愿者年落下帷幕，联合国大会鼓励所有人更多参与志愿活动 [新闻稿 GA/9990]。联合国。https://press.un.org/en/2001/ga9990.doc.htm。

联合国大会 (2002)。*《关于支持志愿活动的建议》(A/RES/56/38)*。联合国。https://www.refworld.org/legal/resolution/unga/2002/en/12875。

苏格兰志愿者组织 (2025)。*《苏格兰志愿活动的社会价值：技术报告》*。https://www.volunteerscotland.net/wp-content/uploads/2025/03/The-social-value-of-volunteering-in-Scotland-%E2%80%93-Technical-Report.pdf。

Voluntare (2018)。*《通过企业志愿服务提高员工参与度》*。https://www.voluntare.org/voluteca/employee-engagement-through-corporate-volunteering/。

Voluntare (2023)。*《衡量实践：在企业志愿服务中应用总价值模型》*。https://www.voluntare.org/wp-content/uploads/2023/12/Measurement-in-practice.-The-Total-Value-Model-aplied-to-Corporate-Volunteering.pdf。

Vogel, I. (2012)。*《“ 变革理论 ” 在国际发展中的应用综述》*。伦敦：英国国际发展部。https://www.theoryofchange.org/pdf/DFID_ToC_Review_VogelV7.pdf。

Weiss, C.H. (1995)。真正的好理论，恰恰是最有实践性的：探索儿童和家庭综合社区倡议的循证评估。由 J. P. Connell, A. C. Kubisch, L. B. Schorr 和 C. H. Weiss 合编，*《社区倡议评估新方法：概念、方法和背景》* (Vol. 1, pp. 65–92)。阿斯彭研究所。

Wilson-Grau, R. 和 H. Britt (2012)。*《成果收获》*。埃及开罗：福特基金会。

世界童军运动组织。(2018)。衡量童军运动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肯尼亚、新加坡和英国的试点影响研究结果 [影响结果总结报告]。世界童军局股份有限公司。https://backend.worldscoutfound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7/Impact%20Results%20Summary%20Report%202018_EN_WEB.pdf。

世界童军运动组织。(2023)。SDGs 童军最终评估。2025 年 10 月 8 日检索自 https://worldscoutfound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5/2023_Scouts-for-SDGs-Evaluation-report_full.pdf。

Yusriadi, Y., U. Farida 和 M. Misnawati (2024)。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机构的 “ 独立学习，独立校园 ”（Merdeka Belajar Kampus Merdeka）政策：新的公共政策改革。*Al-Tanzim, 8*(1), 344–360。https://doi.org/10.33650/al-tanzim.v8i1.7173。

第 3 章

Barford, A., K. Brockie 和 N. O’Higgins (2024)。*《低收入国家的志愿服务、无偿照护工作与性别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https://knowledge.unv.org/evidence-library/volunteering-unpaid-care-work-and-gender-in-lowerincome-countries。

Carstensen, N., M. Mudhar 和 F.S.Munksgaard (2021)。“ 让社区发挥自身作用 ”：互助和自助团体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的作用。*《灾害》*，45(Suppl 1), S146–S173。https://doi.org/10.1111/disa.12515。

国际劳工组织 (2023)。*《2023 年关于修订第 19 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关于工作、就业和劳动力利用不足统计的决议》*。
https://www.ilo.org/sites/default/files/wcmsp5/groups/public/%40dgreports/%40stat/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230304.pdf。

Mao, G. 等 (2021)。英国新冠肺炎志愿服务经验总结?文献快速综述。*《英国医学委员会公共卫生杂志》*，21, 1470。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1-11390-8。

联合国大会 (2002)。*《关于支持志愿服务的建议》* (A/RES/56/38)。
https://undocs.org/en/A/RES/56/38。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2022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建设平等和包容的社会》*。波恩。
https://swvr2022.unv.org/。

第 4 章

Abdullah, N.N. 和 I.Z.Algubori (2020)。伊拉克青年对志愿服务工作的态度。*Albahith Alalami*。
https://abaa.uobaghdad.edu.iq/index.php/abaa/article/view/672/version/501。

Alfonso-Costillo, A., R. Morales-Sánchez 和 D. López-Pintado (2021)。志愿服务能增加就业机会吗?一种实验方法。*《经济学快报》，203*, 109854.
https://doi.org/10.1016/J.ECONLET.2021.109854。

Baert, S. 和 S. Vujić (2018)。看护工作有回报吗?志愿服务与就业机会。*《人口经济学杂志》* 31, pp. 819–836。
https://doi.org/10.1007/s00148-017-0682-8。

Baillie Smith, M. 等 (2020)。全球南方的志愿服务层级：薪酬与生计。*《Voluntas: 国际志愿与非营利组织期刊》，33*, pp. 93–106。
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0-00254-1。

Baillie Smith, M., S. Mills, M. Okech 和 B. Fadel (2022)。乌干达青年志愿服务的地理分布不均衡：多尺度论述与实践。*《地理论坛》，134*, 30–39。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22.05.006。

Barford, A., R. Coombe 和 R. Proefke (2021)。逆境前行：体面工作短缺背景下的青年远大志向与社会贡献 *《地理论坛》，121,* pp. 162–172。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21.02.011。

Beardmore, A., M. Jones 和 J. Seal (2023)。成果收获作为小规模社区发展干预措施回顾性评估的方法论。*《评估与方案规划》*，97, 102235。
https://doi.org/10.1016/j.evalprogplan.2023.102235。

Borbon, J.M.S. 等 (2022)。响应号召参与服务与照护工作：学生关于社区延伸服务经历的现象学研究。*《学术界：国际多学科研究期刊》，12*(3), pp. 329–336。
https://doi.org/10.5958/2249-7137.2022.00216.6。

Brown, H. 和 R. Prince (2015)。简述：志愿劳动：东非工作、发展与公民身份的过去与未来。*《非洲》，85*(2), 209–225。
https://doi.org/10.1017/asr.2015.36。

Butcher, J. 和 C.J.Einolf (2017)。*《缩小差距：关于南北志愿行为的新视角》*。由 J. Butcher 和 C. J. Einolf 合编，*《志愿行为透视》* (pp. 29–52)。非营利与公民社会研究。施普林格出版社，瑞士卡姆。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39899-0_2。

Carlile, J.A. 等 (2014)。大规模灾难后的地方志愿行为与韧性：海地卫生支持团队志愿者的成果。*《灾害风险科学国际期刊》，5*(3), pp. 206–213。
https://doi.org/10.1007/s13753-014-0028-z。

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 (2020)。仅仅是志愿者?为何国际志愿服务（并非如你所想）奏效?*《2010-2020 年影响力报告》*。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
https://ccivs.org/wp-content/uploads/2024/04/ccivs_impact_report_2010-2020.pdf。

Dobro.ru.（未注明日期）。Analitika volontyorstva [志愿行为分析]。
https://dobro.ru/analytics。

欧盟统计局 (2022)。*《自我感知健康统计》*。欧盟统计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Self-perceived_health_statistics。

Fadel, B. 等 (2024)。乌干达难民青年群体中志愿行为的规模、形式与分布。*《人口、空间和地点》，30*(2), e2817。
https://doi.org/10.1002/psp.2817。

Frijters, P. 等 (2024)。WELLBY：一项新的社会价值和进步衡量标准。*《人文与社会科学通讯》，11*, 736。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24-03229-5。

Giancapsro, M.L. 和 A. Manuti (2021)。通过志愿服务学习就业能力：关于年轻人就业能力资本发展的定性研究。*《心理学前沿》，12,* 629590。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574232。

Gopichandran, V. 等 (2025)。社区卫生工作者伦理与专业精神的社区认知：定性探索。*《发现公共卫生》，22*, 206。
https://doi.org/10.1186/s12982-025-00613-7。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2017)。*《心理社会干预的监测与评估框架》*。哥本哈根：心理社会支持参考中心。https://mhpsshub.org/wp-content/uploads/2018/02/Guidance-Note_ME-framework_FINAL.pdf。

Jenkinson, C.E. 等 (2013)。志愿服务是一种公共卫生干预吗?志愿者健康与生存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BMC 公共卫生杂志》，13*, 773。https://doi.org/10.1186/1471-2458-13-773。

Kamanyi, E. (2024)。在非洲的灾害管理中运用志愿服务促进发展：来自坦桑尼亚布科巴区的反思。*《坦桑尼亚人口研究与发展杂志》，31*(2), pp. 55–71。https://www.ajol.info/index.php/tjpsd/article/view/289751。

Lawton, R.N. 等 (2020)。志愿服务使我们更快乐，还是快乐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志愿服务?基于英国数据的纵向分析。*《幸福研究杂志》，* 22(2), pp. 597–629。https://doi.org/10.1007/s10902-020-00242-8。

Mateiu-Vescan, R., T. Ionescu 和 A. Opre (2021)。重新审视志愿服务：为他人做好事带来的个人改变。*Voluntas32,* pp.1213–1227。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0-00247-0。

McGarvey, A. 等 (2019)。*时间花得值：关于志愿者经历的全国调查。*英国国家志愿服务组织。https://knowledge.unv.org/system/files/2022-01/Volunteer-experience-Full-Report.pdf。

Mayne, J. (2001)。通过贡献分析解决归因问题：合理使用绩效衡量指标。*《加拿大方案评估杂志》，16*(1), pp. 1–24。https://utppublishing.com/doi/pdf/10.3138/cjpe.016.001。

Miller, R. 等 (2020)。寻求联系：一项关于日本国际移民心理健康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混合方法研究。*《BMC 公共卫生杂志》*，第 20 卷，第 1272 号文章。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0-09381-2。

Mills, S. 等 (2025)。重新构想志愿服务、危机与不稳定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乌干达难民青年的经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网络先发版。https://doi.org/10.1080/14649365.2025.2479689。

Mpungose, L. 和 L. Monyae (2018)。*非洲联盟青年年：延续 2017 年的势头*。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政策洞察》第 60 期。https://saiia.org.za/research/year-of-youth-carrying-forward-the-momentum/。

Mwamanga, C.L. 和 H. Makundi (2024)。坦桑尼亚正式志愿服务与青年就业之间的相互作用：选定的志愿者参与组织案例研究。*《坦桑尼亚发展研究杂志》，22*(2), pp. 153–174。https://journals.udsm.ac.tz/index.php/tjds/article/view/6703。

国家志愿服务组织委员会 (2019)。*《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了解志愿服务对志愿者的影响》*。https://dunhillmedical.org.uk/wp-content/uploads/2019/10/18-03-NCVO-Impactful-volunteering-understanding-the-impact-of-volunteering-on-volunteers.pdf。

Okech, M. 等 (2024)。乌干达年轻难民在志愿服务中再遇不平等。*Voluntas, 35,* pp. 676–686。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3-00631-6。

Okun, M.A., E.W. Yeung 和 S. Brown (2013)。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与死亡风险：荟萃分析。*《心理学与老龄化》，* 28(2), 564–577。https://doi.org/10.1037/a0031519。

O'Reilly, D. 等 (2017)。" 志愿服务与死亡风险：一项控制合作伙伴的准实验设计 "，*《国际流行病学杂志》，* 46(4), pp. 1295–1302。https://doi.org/10.1093/ije/dyx037。

Paine, A.E., S. McKay 和 D. Moro (2013)。志愿服务能否提高就业能力?来自英国家庭追踪调查及其他研究的见解。*《志愿部门评论》，4*(3), pp. 355–376。https://doi.org/10.1332/204080513X13807974909244。

Pascucci, E. (2019)。当地劳动力构建国际社区：人道主义空间中的不稳定工作。*《环境与规划 A》，51*(3), 743–760。https://doi.org/10.1177/0308518X18803366。

Petrovski, E., S. Dencker-Larsen 和 A. Holm (2017)。志愿者工作对就业能力的影响：一项基于丹麦调查和行政登记数据的研究。*《欧洲社会学评论》，33*(3), pp. 349–367。https://doi.org/10.1093/ESR/JCX050。

Qvist, H.-P. 和 M.D. Munk (2018)。工作生活中参与志愿服务的个人经济回报。*《欧洲社会学评论》，34*(2), pp.198–210。https://doi.org/10.1093/esr/jcy004。

Sollis, K. 等 (2024)。跨文化与跨情境的幸福感衡量 —— 我们做对了吗?评估幸福感概念化的全球差异。*《社会指标研究》，174*(1), 123–155。https://doi.org/10.1007/s11205-024-03382-z。

Spera, C. 等 (2013)。志愿服务作为就业途径：志愿服务是否增加了失业者找到工作的几率?国家与社区服务公司研究与评估办公室。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GOVPUB-Y3_N21_29-PURL-gpo37937/pdf/GOVPUB-Y3_N21_29-PURL-gpo37937.pdf。

Stuart, J. 等 (2020)。志愿服务对志愿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快速证据评估，*What Works Centre for Wellbeing 和 Spirit of 2012*。https://whatworkswellbeing.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Volunteer-wellbeing-technical-report-Oct2020-a.pdf。

Tukundane, C. 和 P. Kanyandago (2021)。*《乌干达的志愿服务、技能与就业》*。难民青年志愿服务乌干达工作论文系列。[工作论文 3]
https://www.ryvu.org/blog/working-paper-on-volunteering-skills-and-employment-in-uganda-3。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1984)。《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未注明日期)。就业能力。收录于 *TVETipedia 术语表*。
https://unevoc.unesco.org/home/TVETipedia%2BGlossary/lang%3De/show%3Dterm/term%3Demployability。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未注明日期）。*TVETipedia 术语表：技能发展* [术语条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
https://unevoc.unesco.org/home/TVETipedia+Glossary/lang=en/filt=all/id=427。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方案。(2021)。《2022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建设平等和包容的社会》。波恩。https://swvr2022.unv.org/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a)。肯尼亚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b)。印度尼西亚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c)。伊拉克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d)。莫桑比克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3a)。乌干达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3b)。坦桑尼亚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Vizeshfar, F. 等 (2021)。通过综合医疗中心的参与式行动研究增强健康志愿者的能力。*《BMC 公共卫生杂志》，21*(1), 889。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1-10878-7。

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未注明日期）。*“为女孩学习与赚钱赋能（EAGLE）”-莫桑比克*。2025 年 10 月 8 日检索自
https://www.vsointernational.org/our-work/inclusive-education/eagle。

Yeung, J.W.K., Z. Zhang 和 T.Y.Kim (2018)。普通成年人的志愿服务与健康益处：累积效应和形式。*《BMC 公共卫生杂志》，18*, 8。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7-4561-8。

青年未来基金会 (2022)。*《衡量就业能力技能》*。
https://youthfutures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5/01/Evaluation_Measuring-employability-skills-2023_Isaac-Thornton-Hannah-Morgan-Miranda-Phillips.pdf。

Ware, J.E. 和 C.D.Sherbourne (1992)。SF-36 健康调查简表：I. 概念框架和条目选择。*《医疗保健》，30*(6), pp. 473–483。
https://doi.org/10.1097/00005650-199206000-00002。

Weltwärts (2024)。*《2023 年调查：weltwärts 方案再次获得志愿者好评》*。2025 年 10 月 8 日检索自
https://www.weltwaerts.de/en/news-about-weltwaerts/2023-survey-findings-weltwarts-programme.html。

Willems, R.C.W.J. 等 (2021)。危机热线志愿者的心理健康：了解工作的情感影响、挑战和资源 - 定性研究。*《国际健康与幸福感定性研究杂志》*, 16(1), 1986920。
https://doi.org/10.1080/17482631.2021.1986920。

世界卫生组织 (2024)。*《世界卫生组织 - 五项幸福感指标 (WHO-5)》*。
https://cdn.who.int/media/docs/default-source/mental-health/who-5_english-original4da539d6ed4b49389e3afe47cda2326a.pdf?sfvrsn=ed43f352_11。

世界卫生组织 (1948)。*《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世界卫生组织。
https://apps.who.int/gb/bd/PDF/bd47/EN/constitution-en.pdf。

第 5 章

Alam, M.F. (2025)。新冠肺炎与社区志愿服务：在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罗兴亚志愿者如何为社区参与抗击疫情而行动。由 Suter, C., Chesters, J., Fachelli, S. 合编。疫情期间的福祉。*《社会指标研究系列》*，第 90 卷。施普林格出版社，瑞士卡姆。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63440-6_10。

Arvidson, M. 等 (2013)。重视社会?社会投资回报率衡量的本质与争议。*《志愿部门评论》，4*(1), pp. 3–18。
https://doi.org/10.1332/204080513X661554。

Aseyo, R.E. 等 (2018)。社区卫生志愿者作为行为改变推动者的现实与经验：来自肯尼亚基苏木一个非正式城市定居点的证据。*《卫生人力资源》*, 16(53)。https://doi.org/10.1186/s12960-018-0318-4。

Asim, S. 和 A. Riaz (2020)。*《学校中的社区参与：来自巴基斯坦一项实地实验的证据》*（英文）。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 9280 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96781592320492516。

Avitabile, C. 和 R. de Hoyos (2018)。信息对学生表现的异质性影响：来自墨西哥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发展经济学杂志》，135*, pp. 318–348。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8.07.008。

Baatiema, L. 等 (2016)。*《加纳的社区卫生工作者：需要更多政策关注》*。*《英国医学杂志全球健康》*，1(4), e000141。https://doi.org/10.1136/bmjgh-2016-000141。

Backhouse, J. 和 A. Tiernan (2022)。*《去殖民化评估：谁的价值算数?》*基督教援助组织。https://www.christianaid.org.uk/sites/default/files/2024-11/decolonising-evaluation-whose-value-counts.pdf。

Baillie Smith, M. 等 (2020)。全球南方的志愿服务层级：薪酬与生计。*《Voluntas: 国际志愿与非营利组织期刊》*，33(1), pp. 93–106。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0-00254-1。

Barford, A., K. Brockie 和 N. O'Higgins (2024)。*《低收入国家的志愿服务、无偿照护工作与性别》*。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https://knowledge.unv.org/evidence-library/volunteering-unpaid-care-work-and-gender-in-lowerincome-countries。

Barnes, K. 等 (1999)。社区志愿者对 2 岁以下儿童免疫接种率的影响。*《儿科与青少年医学档案》，153*(5), pp. 518–524。https://doi.org/10.1001/archpedi.153.5.518。

Bauer, I. (2017)。弊大于利?医疗志愿服务和国际学生实习的伦理问题。*《热带疾病、旅行医学与疫苗》*，3(1), 5。https://doi.org/10.1186/s40794-017-0048-y。

Burbeck, R. 等 (2014)。专科姑息治疗中的志愿者：英国成年人服务调查。*《姑息医学杂志》*，17(5), pp. 568–574。https://doi.org/10.1089/jpm.2013.0157。

Burns, S. 等 (2025)。参加学校志愿者方案的志愿者经历。*澳大利亚健康促进杂志：澳大利亚健康促进专业人员协会官方期刊，36*(2), e956。https://doi.org/10.1002/hpja.956。

Cadesky, J., M. Baillie Smith 和 N. Thomas (2019)。当地志愿者在冲突和紧急情况下的性别相关经历。*《性别与发展》*，27(2), pp. 371–388。https://doi.org/10.1080/13552074.2019.1615286。

Caldron, P.H. 等 (2018)。他们为何在意?医生志愿者参与海外短期医疗任务的动机叙事。*《国际健康规划与管理杂志》*，33(1), pp. 67–87。https://doi.org/10.1002/HPM.2402。

Clark, J. 和 S. Lewis (2017)。*《超越志愿服务的影响力：对志愿者影响力复杂且长期路径的现实主义评估》*。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https://www.vsointernational.org/sites/default/files/VSO_ImpactBeyondVolunteering_MainReport_web.pdf。

Closser, S. 等 (2019)。志愿者社区卫生工作能否增强妇女权能?来自埃塞俄比亚妇女发展军的证据。*《卫生政策与规划》*，34(4), pp. 298–306。https://doi.org/10.1093/heapol/czz025。

Darwin, Z. 等 (2017)。英格兰五个地区弱势妇女接受培训后的志愿者导乐服务评估：妇女的经历。*《社区卫生与社会护理》*，25(2), pp. 466–477。https://doi.org/10.1111/hsc.12331。

Dostál, J. (2020)。志愿服务的显性价值：志愿者中心网络。*《公共与合作经济学年鉴》，91*(2), pp. 319–345。https://doi.org/10.1111/apce.12271。

Fumagalli, S. 等 (2023)。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紧急项目中的志愿服务：意大利助产士的经历。*《公共卫生》*，218, pp. 75–83。https://doi.org/10.1016/j.puhe.2023.02.020。

Gertler, P.J. 等 (2016)。实践中的影响力评估（第二版）。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23791468325239704

Gilmore, B. 等 (2023)。将社区参与制度化以提高看护质量：超越空谈。*《英国医学杂志》（临床研究版）*，381, pp. 1-4。https://doi.org/10.1136/BMJ-2022-072638

Global Youth Mobilization (2022)。推动变革：青年引领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与恢复。中期报告。https://globalyouthmobiliz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2/03/Global-Youth-Mobilization-Interim-Impact-Report-February-2022.pdf

Goulbourne, M. 和 D. Embuldeniya (2002)。*《为志愿者活动赋予经济价值：高效项目管理的八项工具》*。安大略省多伦多：加拿大慈善中心。https://www.sectorsource.ca/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goulbourne_man_english_web.pdf。

泰国政府 (2021)。2021 年泰国自愿国家审查：关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情况。联合国可持续发展。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79482021_VNR_Report_Thailand.pdf。

Habib, M.A. 等 (2017)。巴基斯坦冲突影响地区的社区参与和综合健康与脊髓灰质炎免疫接种活动：一项集群随机对照试验。*《柳叶刀全球健康》*，5, pp. 593–603。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17)30184-5。

Haddock, M. 和 P. Devereux (2016)。衡量志愿服务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挑战与机遇。*Voluntaris: Zeitschrift für Freiwilligendienste, 4*(1), pp. 68–100。https://doi.org/10.5771/2196-3886-2016-1-68。

Hechenberger, E. (2019)。国际志愿者对发展中国家教育质量的影响。*《伊比利亚美洲发展研究杂志》，8*(2), pp. 142–176。https://doi.org/10.26754/ojs_ried/ijds.421。

Henderson, A.T. 和 K.L.Mapp (2002)。新一波证据：学校、家庭和社区联系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西南教育发展实验室。https://sedl.org/connections/resources/evidence.pdf。

Hustinx, L. 等 (2022)。志愿服务中的不平等：构建新的研究前沿。*《Voluntas: 国际志愿与非营利组织期刊》*，33(1), pp. 1-17。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2-00455-w。

ICF Consulting (2016)。印度教育组合技术援助部分评估：最终报告（英国国际发展部印度分部）。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a81ceaa40f0b6230269944f/Evaluation-of-TA-Component-of-DFID-Indias-Education-Portfolio.pdf。

国际劳工组织 (2021)。Volunteer work measurement guide: 志愿者工作衡量指南：关于在国家劳动力调查中实施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志愿者工作附加模块的指导。国际劳工组织。https://www.ilo.org/publications/volunteer-work-measurement-guide。

IREX (2017)。最重要的变革研究：与青年建立伙伴关系 (PWY) 方案。IREX。https://www.irex.org/sites/default/files/pdf/most-significant-change-study-partnerships-with-youth.pdf。

Jenkins, K. (2009)。“ 我们有很多善意，但我们还是需要吃饱肚子 ……”：重视妇女在利马社区发展中的长期志愿服务。*《Voluntas: 国际志愿与非营利组织期刊》*，20, pp. 15–34。https://doi.org/10.1007/s11266-008-9075-7。

Jordaan, M. (2020)。将照片语音作为服务学习模块的关键思考方法。*《南非高等教育杂志》，34*(3), pp. 128–145。https://www.journals.ac.za/sajhe/article/view/3495。

Kasteng, F. 等 (2016)。重视无薪社区卫生工作者的劳动价值，并探索非洲农村地区志愿服务的激励措施。*《卫生政策与规划》*，31, pp. 205–216。https://doi.org/10.1093/heapol/czv042。

Krlev, G., R. Münscher 和 I. Mülbert (2013)。社会投资回报率：最新进展与展望。方法论基础与实践的系统综述。海德堡大学 (CEPS)。https://archiv.ub.uni-heidelberg.de/volltextserver/18758/1/CSI_SROI_Meta_Analysis_2013.pdf。

Leon, N. 等 (2015)。“ 隐性 ” 社区志愿者在社区卫生服务平台中的作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实例。*《全球卫生行动》*，8(1)。https://doi.org/10.3402/GHA.V8.27214。

Lingane, A. 和 S. Olsen (2004)。社会投资回报指南。*《加州管理评论》，46*(3), pp. 116–135。https://cmr.berkeley.edu/2004/05/46-3-guidelines-for-social-return-on-investment/。

Luijkx, K.G. 和 J.M.G.A.Schols (2018)。临终关怀志愿者有所作为。*《临终关怀杂志》*，1(25), pp. 30–39。https://doi.org/10.1177/082585970902500104。

Maes, K. 等 (2018)。埃塞俄比亚妇女发展军中的志愿者比邻里更贫困、更痛苦：来自埃塞俄比亚农村的截面调查数据。*《英国医学委员会公共卫生期刊》*，18(258), pp. 1–11。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8-5159-5。

Martinez, S., S. Naudeau 和 V.A.Pereira (2017)。*《极端贫困下的学前教育和儿童发展：来自莫桑比克农村随机试验的证据》*（政策研究工作论文第 8290 号）。世界银行。https://doi.org/10.1596/1813-9450-8290。

McCauley, M., J. Raven 和 N. van den Broek (2021)。国际医疗志愿服务的经历和影响：一项多国混合方法研究。*《英国医学委员会开放期刊》*，11(3)。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20-041599。

McFadden, A. 和 K. Smeaton (2017)。通过志愿服务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大学教学与实践杂志》*，14(3)。https://doi.org/10.53761/1.14.3.6。

Millora, C. (2025)。菲律宾的本地志愿服务、成人学习与社会变革：日常学习，日常素养。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https://doi.org/10.5040/9781350345645。

Mills, S. 等 (2025)。重新构想志愿服务、危机与不稳定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乌干达难民青年的经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pp. 1–24。https://doi.org/10.1080/14649365.2025.2479689。

Musoke, D. 等 (2018)。利用照片语音反映乌干达农村瓦基索区社区卫生工作者的策略性和从众性性别化经历。*《卫生人力资源》*，16(1)。https://doi.org/10.1186/s12960-018-0306-8。

Mwale, M. 等 (2025)。增强抗霍乱能力：赞比亚霍乱控制综合社区战略实施的经验。*《英国医学杂志全球健康》*，10(1)。https://doi.org/10.1136/bmjgh-2024-017055。

Nassar, A.A.H. 和 A. Al-Haddad (2024)。社区卫生和营养志愿者在改善也门哈贾赫偏远地区婴幼儿健康和营养状况中的作用。*《BMC 儿科》*，24(1)。https://doi.org/10.1186/s12887-024-04958-x。

Nicholls, J. 等 (2012)。社会投资回报指南。社会投资回报率网络。https://docs.adaptdev.info/lib/IB6EPT5U。

O'Connell, C. 和 L. Lucić (2021)。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非正式教育干预：柏林难民庇护所的家庭作业辅导。《*Hu Arenas*》4, pp. 616–631。https://doi.org/10.1007/s42087-020-00161-3。

Parra, J. D. 和 D.B.Edwards Jr. (2023)。系统、复杂性与现实主义评估：哥伦比亚大规模教育政策评估的反思。载于《*国际教育与发展的系统思维：解锁全民学习?*》(pp. 183–203)。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https://doi.org/10.4337/9781802205930.00021。

Pawson, R. 和 N. Tilley (2004)。现实主义评估。英国内阁办公室。https://cdn.taso.org.uk/wp-content/uploads/TASO_Realist-evaluation-briefing.pdf。

Ranson, S. 等 (2005)。公民志愿者参与学校治理。《*教育评论*》，*57*(3), pp. 357–371。https://doi.org/10.1080/00131910500149457。

Reddy, M. (2023)。拉平曲线：志愿协会参与和 2013-2016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灾害*》，47(2), pp. 366–388。https://doi.org/10.1111/DISA.12548

Salamon, L.M., S.W.Sokolowski 和 M.A. Haddock (2011)。《*全球志愿服务经济价值的衡量：概念、估测及未来路线图*》。《公共与合作经济学年鉴》，82(3), pp. 217–252。https://doi.org/10.1111/j.1467-8292.2011.00437.x。

Schiltz, F. 等 (2023)。高收入国家的社会志愿服务与新冠肺炎死亡率：截面研究。《*英国医学委员会开放期刊*》，13(4)。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22-063515。

Silwal, R. (2021)。2021 年姐妹教育项目 II 的终线评估 [数据集]。埃塞克斯科尔切斯特：英国数据服务。https://doi.org/10.5255/UKDA-SN-854969。

Stern, E. (2015)。影响力评估：专员和管理人员指南。BOND。https://www.bond.org.uk/wp-content/uploads/2022/09/impact_evaluation_guide_0515-2.pdf。

Stiglitz, J.E., A. Sen, J.P. Fitoussi (2009)。《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报告》。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8131721/8131772/Stiglitz-Sen-Fitoussi-Commission-report.pdf。

Turner, H.C. 等 (2019)。评估社区卫生志愿者对大规模药物管理计划的无偿贡献。《*临床传染病*》，68(9), pp.1588–1595。https://doi.org/10.1093/cid/ciy74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4)。《2023/24 年人类发展报告：打破僵局：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重塑合作》。联合国。https://hdr.undp.org/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23-2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注明日期）。教育改变生活。2025 年 10 月 5 日检索自 https://www.unesco.org/en/education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16)。志愿服务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对 2030 年议程的回应 [讨论文件]。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知识门户网站。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undp/library/corporate/Executive%20Board/2016/Annual-session/dp2016-15_Annex%204.pdf。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2022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建设平等和包容的社会》。波恩。https://swvr2022.unv.org/。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a)。志愿者在 " 不让任何人掉队 " 议程中的作用：支持联合国实体和国家政府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https://knowledge.unv.org/system/files/2024-04/57956%20UNV%20LNOB_web_V2.pdf。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b)。中国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c)。肯尼亚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d)。印度尼西亚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e)。哥伦比亚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未注明日期）。《*关于在卫生紧急事件中动员志愿者和志愿者团体的指导说明*》。2025 年 10 月 6 日检索自 https://www.unv.org/sites/default/files/UNV%20Guidance%20Note%20on%20Engaging%20Volunteers%20and%20Volunteer%20Groups%20in%20Health%20Emergencies.pdf。

联合国妇女署 (2020)。促进性别平等的评价良好做法。联合国妇女署。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20/06/good-practices-in-gender-responsive-evaluations。

悉尼科技大学 (2025)。组织能力强化与国际志愿服务。https://www.uts.edu.au/case-studies/organisational-capacity-strengthening-and-international-volunteering。

VOCAD (2024)。印度孙德尔本斯地区气候适应与灾害志愿服务。诺森比亚大学。https://www.northumbria.ac.uk/vocad-indian-sundarbans。

Weiss, C.H.(1997)。基于理论的评估：过去、现在与未来。*《评估新方向》*，76, pp. 41–55。https://doi.org/10.1002/ev.1086。

世界银行 (2024)。*《世界银行支持的影响力评估十年实践》*。2025 年 10 月 4 日检索自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099724110022441282/pdf/IDU112e3c4c41b1c614d8a1b6131da4b9f3b7877.pdf。

世界卫生组织 (1948)。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世界卫生组织。https://apps.who.int/gb/bd/PDF/bd47/EN/constitution-en.pdf。

世界童军运动组织 (2018)。衡量童军运动对青年发展的影响：肯尼亚、新加坡和英国的试点影响研究结果 [影响结果总结报告]。世界童军局。https://backend.worldscoutfound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7/Impact%20Results%20Summary%20Report%202018_EN_WEB.pdf。

世界童军运动组织 (2023)。SDGs 童军最终评估。2025 年 10 月 8 日检索自 https://worldscoutfound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5/2023_Scouts-for-SDGs-Evaluation-report_full.pdf。

第 6 章

Alaref, J.J.S. 等 (2019)。社区间志愿活动和软技能培训对自我报告的社会凝聚力价值观的短期影响：来自黎巴嫩的准实验证据（英文）。政策研究工作论文第 WPS 8691 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676801546874918189。

Albert, M.J. (2024)。*《驾驭多重危机：绘制资本主义与地球的未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15041.001.0001。

Andreastuti, S. 等 (2019)。锡纳朋火山和克卢德火山火山危机社区应对的特点。*《火山学与地热研究杂志》*，382, pp. 298–310。https://doi.org/10.1016/j.jvolgeores.2017.01.022。

Artero, M. (2024)。亲移民志愿服务的政治学：探索亲移民志愿服务在地方移民治理中的作用。*《城市》*，154, 105325。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24.105325。

澳大利亚志愿者计划（未注明日期）。*《研究与评估》*。https://www.australianvolunteers.com/resources/research-and-evaluation/。

Baillie Smith, M. 等 (2022)。乌干达青年志愿服务的地理分布不均衡：多尺度论述与实践。*《地理论坛》*，*134*, pp. 30–39。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22.05.006。

Beckwith, L. 等 (2023)。越南青年参与环境行动：在边缘空间中学习公民意识。*《地理学报》*，189(2), pp. 329–341。https://doi.org/10.1111/geoj.12479。

Cadesky, J., M. Baillie Smith 和 N. Thomas (2019)。当地志愿者在冲突和紧急情况下的性别相关经历。*《性别与发展》*，*27*(2), pp. 371–388。https://doi.org/10.1080/13552074.2019.1615286。

Chadwick, A., B. Fadel 和 C. Millora (2022)。志愿行为的民族志：关于志愿行为与发展之间联系的细微洞察。*《Voluntas: 国际志愿与非营利组织期刊》*，*33*(6), pp. 1172–1178。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1-00389-9。

Chambers, R. (2007)。*谁算数?参与与数字的静默革命*。布莱顿：发展研究所。https://opendocs.ids.ac.uk/opendocs/handle/20.500.12413/398。

Davies, B. 等 (2024)。志愿服务与社会凝聚力的因果关系：对二次纵向数据的大规模分析。*《社会指标研究》*，*171*(3), pp. 809–825。https://doi.org/10.1007/s11205-023-03268-6。

Drif, L. (2018)。难民与 “ 志愿者 ”：国际援助项目中的隐形工作者。*《国际批判》*，No 81(4), pp. 21-42。[由 Rundell, E. 翻译] https://shs.cairn.info/journal-critique-internationale-2018-4-page-21?lang=en。

Eriksson, K. 和 E. Danielsson (2022)。在危机应对行动中识别和整合志愿者的框架。*《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杂志》*，*74*, 102912。https://doi.org/10.1016/J.IJDRR.2022.102912。

Ewane, E.B. (2024)。了解喀麦隆西部高地森林砍伐地区社区参与植树和管理的情况。*《环境管理》*，*73*(1), pp. 274-291。https://doi.org/10.1007/s00267-023-01902-0。

Fadel, B. 等 (2024)。乌干达难民青年群体中志愿行为的规模、形式与分布。*《人口、空间和地点》*。https://doi.org/10.1002/psp.2817。

Fadel, B. (2022)。*《长期危机中的当地志愿服务：布隆迪案例研究》* [博士论文]。诺森比亚大学。诺森比亚研究链接 https://researchportal.northumbria.ac.uk/en/studentTheses/local-volunteering-in-protracted-crises-a-case-study-from-burundi-3。

Fee, A. (2024)。*官方发展援助的隐性贡献：澳大利亚志愿者方案*。发展政策中心。https://devpolicy.org/hidden-contributions-of-oda-australian-volunteers-20240903/。

Ferris, A. 等 (2024)。谁在难民和移民非营利组织中参与志愿服务?两项研究的结果。*《非营利政策论坛》*，16(2), pp. 305–332。https://doi.org/10.1515/npf-2023-0066。

Fiddian-Qasmiyeh, E. (2015)，“ 难民帮助难民：位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也欢迎叙利亚人 ”，*《对话》*，11 月 4 日 www.theconversation.com/refugees-helping-refugees-how-a-palestinian-camp-in-lebanon-is-welcoming-syrians-48056。

Firchow, P. 和 P. Dixon (2025)。本土化时代的衡量工作政治学：比较 “ 自上而下 ” 与 “ 自下而上 ” 的数据统一指标。*《国际政治社会学》*，19(2), 10。https://doi.org/10.1093/IPS/OLAF010。

Forrest, S., J. Dostál 和 L. McEwen (2022)。极端天气事件中志愿服务的未来：关于气候韧性关键挑战和机遇的重要反思。*《极端事件杂志》*，9(2–3)。https://doi.org/10.1142/S2345737623410038。

Ganoe, M., J. Roslida 和 T. Sihotang (2023)。志愿服务对灾害管理中社区韧性的影响。*《教育与人文学期刊》*，12(3), pp. 199–213。https://doi.org/10.35335/jiph.v12i3.11。

全球难民论坛（未注明日期）。*《难民成为联合国志愿者并帮助教育其他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全球难民契约》。https://globalcompactrefugees.org/good-practices/refugees-become-un-volunteers-and-help-educate-fellow-refugees。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2023)。*《实施指南：促进志愿者安全、安保和福祉的标准》*。https://www.ifrc.org/document/implementation-guide-standards-facilitate-safety-security-and-well-being-volunteers。

Jaiswal, A. 等 (2022)。沿海关键基础设施的可持续管理：南亚多功能飓风避难所案例研究。*《建筑环境中的灾害韧性国际期刊》*，*13*(3), pp. 304-326。https://doi.org/10.1108/IJDRBE-08-2021-0115。

Johnson, L. 等 (2022)。*《干预：气候变化适应的无形劳动》*。https://doi.org/10.2139/ssrn.4416499。

Jorgensen, B., M. Krasny 和 J. Baztan (2021)。志愿者海滩清理：公民环境管理以对抗全球塑料污染。*《可持续性科学》*，*16*(1), pp. 153-167。https://doi.org/10.1007/s11625-020-00841-7。

Kamanyi, E. (2024)。非洲灾害管理中的志愿服务促进发展：来自坦桑尼亚布科巴区的反思。*《坦桑尼亚人口研究与发展杂志》*，31(2), pp. 55–71。https://www.ajol.info/index.php/tjpsd/article/view/289751。

King, D. 等 (2024)。*建立和维持联系以促进变革：团结志愿服务*。诺森比亚大学。会议论文。https://doi.org/10.25398/rd.northumbria.25975255.v1。

Lawrence, M. 等 (2024)。全球多重危机：危机纠缠的因果机制。*《全球可持续性》*，7, e6。https://doi.org/10.1017/SUS.2024.1。

Learmonth, B. (2020)。太平洋岛国气候行动志愿服务。https://forum-id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Volunteering-for-Climate-Action-in-Pacific-Island-Countries.pdf。

Mills, S. 等 (2025)。重新构想志愿服务、危机与不稳定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乌干达难民青年的经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pp. 1–24。https://doi.org/10.1080/14649365.2025.2479689。

Morin, E. 和 A.B.Kern (1999)。*《家园地球：新千年的宣言》*。汉普顿出版社。https://books.google.ca/books/about/Homeland_Earth.html?id=66B-AAAAMAAJ&redir_esc=y。

Mutisi, M. (2012)。*《卢旺达的地方冲突解决：阿布恩济调解员案例》*（非洲对话专论系列第 2 号，第 41-74 页）。南非德班：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 (ACCORD)。https://www.accord.org.za/wp-content/uploads/2024/06/Monograph-July-2012-Local-conflict-resolution-in-Rwanda-The-case-of-abunzi-mediators.pdf。

Okech, M. 等 (2024)。乌干达年轻难民在志愿服务中再遇不平等。*《Voluntas: 国际志愿与非营利组织期刊》*，*35*(4), pp. 676–686。https://doi.org/10.1007/S11266-023-00631-6。

Schmid, S. 等 (202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数字志愿者：通过社交媒体开展照护工作以增强社会技术韧性》*。*《维森鲍姆数字社会期刊》*，*3*(3)。https://doi.org/10.34669/WI.WJDS/3.3.6。

Sha, Y. 等 (2024)。紧急情况下的数字志愿服务：类型特征、优势与挑战。*《数据科学与管理》*，*8*(1), pp. 1–10。https://doi.org/10.1016/j.dsm.2024.08.003。

Sifaki-Pistolla, D. 等 (2017)。谁来拯救救援者?欧洲难民危机期间在希腊工作的救援人员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病流行病学》*，52(1), pp. 45–54。https://doi.org/10.1007/S00127-016-1302-8。

Simsa, R. 等 (2019)。社会危机中的自发志愿服务：自组织与协调。*《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48*(2_suppl), 103S-122S。https://doi.org/10.1177/0899764018785472。

Studzinski, N.G., R. Kent 和 D. Korowicz (2025)。全球系统性风险治理：未来峰会改革。*《全球治理：多边主义与国际组织回顾》*，31(2), pp. 113–136。https://doi.org/10.1163/19426720-0310200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科学理事会 (2024)。*《探索新视野：关于行星健康与人类福祉的全球前瞻报告》* https://wedocs.unep.org/20.500.11822/45890。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a)。乌克兰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b)。刚果民主共和国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3c) 卢旺达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4a) 印度尼西亚志愿服务与福祉国家状况分析报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内部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b)。*《志愿服务对气候行动和社区韧性的贡献》*。https://knowledge.unv.org/evidence-library/the-contribution-of-volunteering-to-climate-action-and-community-resilience。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5a)。*《从腰果到气候行动》*。https://unvolunteers.exposure.co/from-cashews-to-climate-action。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5b)。*《志愿服务在人类流动背景下的贡献》*。https://knowledge.unv.org/evidence-library/the-contribution-of-volunteering-in-human-mobility-contexts。

悉尼科技大学（未注明日期）。*《澳大利亚志愿者组织纵向研究》*。https://www.uts.edu.au/about/faculties/business/management/what-we-do/longitudinal-study-australian-volunteers-lsav。

VOCAD (2024)。*《印度孙德尔本斯地区气候适应与灾害志愿服务》*。诺森比亚大学。https://www.northumbria.ac.uk/vocad-indian-sundarbans。

Vogt, J. 等 (2024)。为何成为护树人?将参与情况与志愿者特征和动机联系起来。*《城市与环境》，17*(2), 2。https://doi.org/10.15365/cate.2024.170202。

Weller, S.L., A.D. Brown 和 C.A.Clarke (2023)。通过构建叙事身份寻求意义：帮助者、英雄与伤害。*《人际关系》*，76(4), pp. 551–576。https://doi.org/10.1177/00187267211043072。

Yodsuban, P. 和 K. Nuntaboot (2021)。面向泰国南部老年人基于社区的食品灾害管理：定性研究。*《国际护理科学杂志》*，*8*(4), pp. 409-417。https://doi.org/10.1016/j.ijnss.2021.08.008。

第 7 章

Abrams, D. 等 (2023)。社区、归属与福祉：志愿服务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英国学术出版社。

Allum, C. 和 P. Devereux (2020)。*《衡量与影响：志愿服务对社会有益，对个人也有益》*。华盛顿特区：阿联酋基金会和国际志愿者协会。https://www.iave.org/iavewp/wp-content/uploads/2021/02/Measurement-and-Impact-Finding-Evidence-Volunteering-is-Good-for-Society-and-Good-for-You.pdf。

Babbie E. (2015)。指标、量表和类型学。由 Babbie E 编著。《社会研究实践》。第 14 版。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圣智学习出版社；2015. p. 155–81。

Cannings, J. 等 (2025)。《估测志愿服务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伦敦经济学院。英国伦敦。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stimating-the-economic-and-social-value-of-volunteering。

Clary E.G., M. Snyder, M. 和 R.D.Ridge (1998)。志愿者的动机：招募和留住志愿者的功能策略。《非营利管理与领导力》，9(4), pp.351–367。https://doi.org/10.1002/nml.4130020403。

Fisher, K., R. Patulny 和 M. Bittman (2004)。使用时间日志和年度参与估测来衡量澳大利亚的志愿服务。《澳大利亚志愿服务杂志》，9(2), pp. 25–36。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0577786_Measuring_volunteering_in_Australia_using_time_diary_and_annual_participation_estimates/citations。

Galindo-Kuhn, R. 和 R.M.Guzley (2001)。志愿者满意度指数：构建定义、衡量、发展和验证。《社会服务研究杂志》，28(1), pp. 45–68。https://doi.org/10.1300/J079v28n01_03。

Haddock, M. 和 P. Devereux (2016)。衡量志愿服务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挑战与机遇。Voluntaris 4, pp. 68–100。https://doi.org/10.5771/2196-3886-2016-1-68。

Hastie T, R. Tibshirani R 和 J. Friedman J. (2009)。《统计学习基础：数据挖掘、推断与预测》，第二版：纽约施普林格出版社；2009。

国际劳工组织 (2021)。志愿者工作衡量指南：关于在国家劳动力调查中实施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志愿者工作附加模块的指导。国际劳工组织。https://www.ilo.org/publications/volunteer-work-measurement-guide。

Handy, Femida 和 Lesley Hustinx (2009)。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及方式。《非营利管理与领导》，19: 549–58。https://doi.org/10.1002/nml.236。

Han, H., J. Kim 和 H. Lee (2021)。《大学生志愿服务与幸福感的关系：截面研究。《心理学前沿》国际版 https://doi.org/10.1177/17461979251356879。

Lee, S., R. Patel 和 N. Ahmed (2023)。心理健康能力建设对幸福感的影响：来自正式志愿服务的证据。《精神病学前沿》，14, 1205344。

Munck, G.L. 和 J. Verkuilen, J., 2002。民主的概念化与衡量：评估替代指标。《比较政治研究》，35 (1), 5–34。

Naylor, C. 等 (2013)。健康与照护领域的志愿服务：确保可持续的未来。2025 年 8 月 30 日检索自 https://www.kingsfund.org.uk/insight-and-analysis/reports/volunteering-health-care。

Mook, L. 等 (2014)。有偿员工与志愿者可互换性的个体和组织因素：志愿者的视角。《加拿大非营利与社会经济研究杂志》，5(2), pp. 65–85。https://doi.org/10.22230/cjnser.2014v5n2a18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组织 (2023)。《2023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全球贫困解构 —— 来自高影响力行动的数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组织。https://ophi.org.uk/Publications/GMPI14-2023。

经合组织 / 欧盟 /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 (2008)。《构建综合指标手册：方法论与用户指南》，经合组织出版社，巴黎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043466-en。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0a)。《衡量志愿服务的经济和社会贡献：行动计划创新挑战论文选集》（编者按：行动计划）。波恩：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https://knowledge.unv.org/system/files/2021-01/Anthology_final.pdf。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0b)。为 2030 年议程衡量志愿服务：原则、工具和实践工具箱。行动计划秘书处委托编写的研究报告，旨在将志愿服务纳入 2030 年议程。波恩：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https://knowledge.unv.org/evidence-library/measuring-volunteering-for-the-2030-agenda-toolbox-of-principles-tools-and-practices

Russell, B. (2016)。衡量志愿服务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全球南方志愿服务的衡量。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第三部门研究学会第十二届国际会议。https://socialsurveys.co.za/wp-content/uploads/2018/08/Russell-2016-ISTR-Measurement-Volunteering-Global-South.pdf。

Salamon L.M., S.W. Sokolowski 和 M.A. Haddock (2011)。全球志愿工作的经济价值衡量：概念、估测及未来路线图。《公共与合作经济学年鉴》，82(3), pp. 217–252。https://doi.org/10.1111/j.1467-8292.2011.00437.x。

Salamon, L.M., S.W.Sokolowski 和 M.A. Haddock (2018)。当前估测与下一步行动：全球志愿工作的范围与规模。2018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背景文件：联结之线。波恩：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https://www.unv.org/sites/default/files/The%20Scope%20and%20Scale%20SWVR2018%20final.pdf。

Seabe, D.S. (2014)。理解南非的志愿服务：混合方法。文学硕士（社会科学方法）论文。斯泰伦博斯大学，南非斯泰伦博斯。https://core.ac.uk/download/pdf/37436867.pdf。

Sidel, M. (2009)。2001 年以来影响志愿服务的法律和政策。法律研究论文系列论文第 1676 号。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威斯康星。https://www.unv.org/sites/default/files/Volunteerism%20laws%20and%20policies%202009.pdf。

南非统计局。(2020)。2018 年志愿者活动调查。南非统计局。

Twigg, J. 和 I. Mosel (2017)。城市灾害应对中的新兴群体和自发志愿者。《环境与城市化》，29(2), 443-458。https://doi.org/10.1177/0956247817721413。

联合国大会 (2002)。关于支持志愿服务的建议。大会通过的决议 (A/ RES/56/38)。纽约 https://www.unv.org/publications/unga-resolution-5638-recommendations-support-volunteering

联合国大会 (2018)。将志愿服务纳入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秘书长的报告 (A/73/254)。纽约。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638916?v=pdf。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a)。不能计数的就不算数全球志愿服务估测。在于《2022 年世界志愿服务报告》pp. 29–41：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1b)。2022 https://doi.org/10.18356/9789210012416c005。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2)，《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建设平等和包容的社会》。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5)。《2025 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ttps://report.hdr.undp.org。

Wilson, J. (2012)。志愿服务研究：综述论文。《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41(2), 176-212。 https://doi.org/10.1177/0899764011434558

Wilson, J., N. Mantovan 和 R.M.Sauer。2020。“ 志愿活动与社会阶层的经济效益 ”。《社会科学研究》，85: 102368。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9.102368。

Zollo, L. 等 2019。“ 从治理到组织效能：组织认同与志愿者承诺的作用 ”。《管理与治理杂志》，23, no. 1: 111–137。https://doi.org/10.1007/s10997-018-9439-3。

附注

1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11)。
2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18)。
3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15)。
4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
5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3)。
6 Fonović (2025); Hazeldine 和 Baillie Smith (2015)。
7 Barford 等 (2024)；Baillie Smith 等 (2022)。
8 Guidi 等 (2021)；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
9 King 等 (2024)；Srinivasan 等 (2024)。
10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1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 p.30)。
12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 p. 11)。
13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
14 联合国大会 (2002)。
15 Fadel (2020)；Haddock 和 Devereux (2016)。
16 Mills 等 (2025)。
17 Alam (2025)；Fadel 等 (2024)。
18 Kamanyi (2024)；Nahkur 等 (2022)。
19 正如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所阐述的，标志着 2001 年国际志愿者年的结束。联合国 (2001)。
20 Meynhardt (2009)。
21 Salamon (1982)；Salamon 等 (2011)；Dostál 等 (2020)。
22 国际劳工组织 (2011)；国际劳工组织 (2021)。
23 Salamon 等 (2019)。
24 苏格兰政府（未注明日期）；埃塞克斯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所 (2025)。
25 案例研究由苏格兰志愿者组织提交；苏格兰志愿者组织（2025）。
26 Salamon 和 Sokolowski (2018)；Paine 等 (2020)。
27 Salamon (2021)。
28 案例研究由蒙特雷科技大学 EGADE 商学院附属民间社会研究中心（CIESC）提交。
29 罗珀公共舆论研究中心 (2021)；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 -INEGI（未注明日期）。
30 Hasmath 等 (2025)。
31 Johnson (2024)。
32 案例研究由美国志愿队 (AmeriCorps) 提交；AmeriCorps (2024)。
33 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未注明日期）。
34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 (2024)。
35 Dostál (2021)。
36 Mook (2023)。
37 案例研究由王储基金会提交。
38 王储基金会（未注明日期）
39 McKinley 等 (2017)。
40 Ajam Media Collective (2025)。
41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
42 Bai (2013)；Diola (2017)。
43 Diola 和 Liamzon (2016)。
44 案例研究由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提交；Metelev, A. P. 等 (2022)。
45 案例研究由海外志愿服务（VSA）组织提交。
46 Baser 和 Morgan (2008)。
47 Yusriadi 等 (2024)。
48 案例研究由 Aim Initiative Foundation 提交。
49 Dar 和 Davies (2003)。
50 案例研究由 Unité 提交。
51 Davies 和 Dart (2005)。
52 Chadwick 等 (2022)。
53 案例研究由都柏林大学 (UCD) 提交。
54 Wilson-Grau 和 Britt (2012)。
55 Beardmore 等 (2023)。
56 案例研究由 Solidarité Union Coopération (SUCO) 提交。
57 Amreeva 和 Sholudko (2024)。
58 Szanto (2025)；Turtz (2024)。
59 案例研究由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提交。
60 Fonović (2024)。

61 Fonović 等 (2025)。
62 Saleh 等 (2022)。
63 世界童军运动组织 (2018, 2023)。
64 案例研究由世界童军运动组织提交。
65 Chang (2022)。
66 案例研究由 Voluntare 提交。
67 Voluntare (2018, 2023)。
68 案例研究由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 (VSO) 提交。
69 案例研究由 Gateshead Community Bridgebuilders 提交。
70 Panter-Brick 等 (2024)。
71 Enjolras (2021)。
72 国际志愿服务发展论坛 (2024)。
73 Stiglitz 等 (2009)。
74 Geelhoed 等 (2021)。
75 Carstensen 等 (2021)。
76 联合国大会 (2002)。
77 国际劳工组织 (2023)。
78 请参阅附录 B 表 A3。
79 有关估测程序的更多详情，请参阅附录 B。
80 附录 B 更详细解释了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测数据集背后的建模方法。
81 有关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数据和来源描述，请参阅附录 B。
82 附录 B 表 A5 列出了按不同时间范围平均值计算的志愿者比率的其他估测值。
83 本章中所有关于志愿者比率的估测值，均可理解为一年中任意四周时间内，参与志愿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平均百分比。
84 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一份技术文件对孟加拉国进行了案例研究，通过使用劳动力调查（LFS）和时间使用调查（TUS）数据来探讨志愿工作和无偿照护工作，该文件对此进行了特别探讨（见 Barford 等，2024）。
85 《2022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显示，在四周的参考期内，全球志愿者比率估计为 14.9%，全球估计共有 8.62 亿人参与志愿工作（见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2021）。
86 Sollis 等 (2024)。
87 Butcher 和 Einolf (2017)。
88 世界卫生组织 (1948)。
89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a)。
90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b)。
91 Lawton 等 (2020)；O'Reilly 等 (2017)；Okun 等 (2013)。
92 Nichol 等 (2023)。
93 Gopichandran 等 (2025)。
94 McGarvey 等 (2019)。
95 Mateiu-Vescan 等 (2021)。
96 世界卫生组织 (2024)。
97 Ware 和 Sherbourne (1992)。
98 欧盟统计局 (2022)。
99 Frijters 等 (2024)。
100 Lawton 等 (2020)。
101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3a)。
102 Sollis 等 (2024)；Nichol 等 (2023)。
103 案例研究由社区青年学习与技能发展促进协会 (APLSY) 提交。
104 英国国家志愿服务组织 (2019)。
105 Yeung 等 (2018)；Jenkinson 等 (2013)。
106 Willems 等 (2021)。
107 Abdullah 和 Algubori (2020)；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c)。
108 Lawton 等 (2021)；Mateiu-Vescan 等 (2021)。
109 Stuart 等 (2020)。
110 Mayne (2001)。
111 案例研究由 Solidarité Union Coopération (SUCO) 提交；Beardmore 等 (2023)。
112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联会 (2017)。
113 Miller 等 (2020)。
114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a)。
115 Baillie Smith 等 (2020)。
116 Kamanyi (2024)。
117 案例研究由 Plataforma del Voluntariado de España 提交。
118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b)。

119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3b)。
120 Vizeshfar 等 (2021)。
121 案例研究由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 (CCIVS) 提交。
122 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 (2020)。
123 案例研究由苏格兰志愿者组织提交。
12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未注明日期）。
125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1984)。
126 Baert 和 Vujić (2018)。
127 Mpungose 和 Monyae (2018)。
128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Paine 等 (2013)。
129 Petrovski 等 (2017)；Alfonso-Costillo 等 (2021)。
130 Tukundane 和 Kanyandago (2021)。
131 Spera 等 (2015)。
132 Paine 等 (2013)。
133 Giancapsro 和 Manuti (2021)。
134 Qvist 和 Munk (2018)。
135 Okech 等 (2024)。
136 案例研究由 parkrun 提交。
137 青年未来基金会 (2023)。
138 Barford 等 (2021)。
139 Mwamanga 和 Makundi (2024)。
140 Brown 和 Prince (2015)。
141 案例研究由奎松市世界城市学院提交。
142 Borbon 等 (2022)。
143 案例研究由 Engagement Global gGmbH 提交；Weltwärts (2024)。
144 案例研究由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 (CCIVS) 提交；CCIVS (2020)。
145 案例研究由 Achieve17 Youth Club 提交。
146 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未注明日期）。
147 Baillie Smith 等 (2022)；Mills 等 (2025)。
148 另见第 6 章案例研究专栏 6.4。
149 Dobro.ru（未注明日期）（dobro.org 国际版）
150 UNV (2024d).
151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16)；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a)。
152 参见本报告各处引用的联合国会员国向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提交的国家情境分析报告中的示例。
153 Stiglitz and others (2009).
15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4)。
155 Salamon 等 (2011)。
156 考虑 1915 亿元人民币在 2024 年的年平均汇率。
157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b)。
158 考虑 2363 亿肯尼亚先令在 2024 年的年平均汇率。
159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c)。
160 Dostál(2020)。
161 Goulbourne 和 Embuldeniya (2002)。
162 Arvidson 等 (2013)；Salamon 等 (2011)。
163 案例研究由志愿服务研究所 (IVR) 提交。
164 Nicholls 等 (2012)；Goulbourne 和 Embuldeniya (2002)。
165 Lingane 和 Olsen (2004)；Krlev 等 (2013)。
166 案例研究由 Journalists' Cohesion Council (JCC) 提交。
167 Stiglitz 等 (2009)；国际劳工组织 (2021)。
168 Dostál (2020)。
169 国际劳工组织 (2021)。
170 世界卫生组织 (1948)。
171 Leon 等 (2015)。
172 Caldron 等 (2018)。
173 McCauley 等 (2021)。
174 Bauer (2017)。
175 Stern (2015)。
176 Burbeck 等 (2014)。
177 Habib 等 (2017)。
178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b, 2024d)。
179 泰国政府 (2021)。
180 Global Youth Mobilization (2022)。
181 Jenkins (2009)。
182 Turner 等 (2019)；Aseyo 等 (2018)。
183 Kasteng 等 (2016)。

184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未注明日期）。
185 Nassar 和 Al-Haddad (2024)。
186 Mwale 等 (2025)。
187 Barnes 等 (1999)。
188 Reddy (2023)。
189 Schiltz 等 (2023)。
190 Alam (2025)。
191 案例研究由都柏林大学 (UCD) 提交。
192 Luijkx 和 Schols (2018)。
193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e)。
194 Darwin 等 (2017)。
195 Baatiema 等 (2016)。
196 Gilmore 等 (2023)。
197 Fumagalli 等 (2023)。
198 Musoke 等 (2018)。
199 案例研究由多哥国家志愿服务机构 (ANVT) 提交。
20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注明日期）。
201 Burns 等 (2025)；McFadden 和 Smeaton (2017)。
202 Ranson 等 (2005)。
203 O'Connell 和 Lucić (2021)。
204 Clark 和 Lewis (2017)。
205 案例研究由世界童军运动组织提交。
206 世界童军运动组织 (2018, 2023)。
207 Hechenburger (2019)。
208 Silwal (2021)。
209 Gertler 等 (2016)。
210 Avitabile 和 de Hoyos (2018)；Martinez 等 (2017)。
211 世界银行 (2024)。
212 Asim 和 Riaz (2020)。
213 Weiss (1997)。
214 Stern (2015)。
215 ICF Consulting (2016)。
216 Pawson 和 Tyley (2004)。
217 Parra 和 Edwards Jr (2023)。
218 Backhouse 和 Tiernan (2022)。
219 案例研究由澳大利亚志愿者计划 (AVP) 提交。
220 悉尼科技大学 (2025)。
221 IREX (2017)。
222 Jordaan 和 Pieterse (2020)。
223 Mills 等 (2025)。
224 联合国妇女署 (2020)。
225 案例研究由无国界兽医北美分会 / 北美无国界兽医 (VWB/VSF) 提交。
226 Cadesky 等 (2019)。
227 Millora (2025)；Baillie Smith 等 (2020)。
228 Hustinx 等 (2022)。
229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
230 VOCAD (2024)。
231 Closser 等 (2019)。
232 Barford 等 (2024)。
233 Maes 等 (2018)。
234 Albert (2024)；Morin 和 Kern (1999)。
235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科学理事会，2024, p. iv。
236 同上。
237 Simsa 等 (2019)。
238 Eriksson 和 Danielsson (2022)。
239 Fadel (2022)。
240 Sifaki-Pistolla 等 (2017)。
241 King 等 (2024)。
242 Baillie Smith 等 (2022)。
243 Johnson 等 (2022)。
244 Cadesky 等 (2019)；Fadel (2022)。
245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3a)。
246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3b)。
247 Artero (2024)；Ferris 等 (2024)。
248 Fadel 等 (2024)；Fiddian-Qasmiyeh (2015)。
249 Yodsuban 和 Nuntaboot (2021)。

250 Jaiswal 等 (2022)。
251 Vogt 等 (2024)。
252 Ewane (2024)。
253 Jorgensen 等 (2021)。
254 Learmonth (2020)。
255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5a)。
256 Schmid 等 (2023)。
257 Sha 等 (2025)。
258 Kamanyi (2024)。
259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5b)。
260 Weller 等 (2023)。
261 Studzinski 等 (2025)。
262 Firchow 和 Dixon (2025)。
263 案例研究由 Aim Initiative Foundation 和人类服务组织 (SHBO) 提交。
264 Baillie Smith 等 (2022) – 另见案例研究专栏 6.5。
265 Davies 等 (2024)。
266 Mutisi (2012)；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3c)。
267 Alaref 等 (2019)。
268 Ganoe 等 (2023)。
269 案例研究由马杰伊 · 贝尔大学和赫瑞瓦特大学提交。
270 Fernando Muñoz Miño 提交的案例研究，作为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在厄瓜多尔委托开展的一项研究的一部分。
271 Global Refugee Forum（未注明日期）。
272 Drif (2018)。
273 Fadel 等 (2024)。
274 Okech 等 (2024)；Mills 等 (2025)。
275 Andreastuti 等 (2019)。
276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a)。
277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2023)。
278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4b)。
279 案例研究由澳大利亚志愿者计划 (AVP) 提交。
280 澳大利亚志愿者计划（未注明日期）；悉尼科技大学（未注明日期）。
281 Fee (2024)。
282 Forrest 等 (2022)。
283 VOCAD (2024)。
284 Chadwick 等 (2022)。
285 Baillie Smith 等 (2022)；Beckwith 等 (2023)。
286 Chambers (2007)。
287 Russell (2016)。
288 Salamon 等 (2018)；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b)。
289 Haddock 和 Devereux (2016)；Russell, 2016；Allum 和 Devereux (2020)；Plan of Action (2020a,b)。
290 UNDP (2025)。
291 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3)。
292 联合国大会 (2002)。
293 Wilson (2012)。
294 联合国志愿者组织 (2021b)。
295 Smith 等 (2023)。
296 Lee 等 (2023)；Mbah 和 Williams (2025)。
297 Abrams 等 (2023)。
298 Naylor 等 (2013)；Cannings 等 (2025)。
299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2021b)。
300 国际劳工组织 (2021)。
301 Mook 等 (2014)；Wilson 等 (2020)；Cannings 等 (2025)。
302 Cannings 等 (2025)。
303 Salamon 等 (2011)。
304 联合国大会 (2018)。
305 Sidel (2009)
306 南非统计局 (2020)。
307 Russell (2016)。
308 同上。

ISBN: 978-92-9504622-1

版权所有。未经事先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内容。

采用无氯且使用植物基油墨的 FSCTM 认证纸张印刷。印刷品可回收。

概念设计、布局、编辑及翻译 :
Prime Production, Berkshire, United Kingdom

*《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提出新证据，表明志愿服务衡量方式必须不断发展，以充分体现志愿者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据估测，全球每月约有 21 亿人参与志愿服务 —— 这是一项常被忽视的巨大资源。*《2026 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表明，仅依赖小时数和货币价值等现有指标，不足以证明投资的合理性或为制定良好政策提供依据。为了解决这一证据基础零散的问题，本报告引入了新的**全球志愿人员参与指数（GIVE）**。GIVE 指数是一个多维指标，建立在对个人的价值、对社会的价值、对经济的价值以及有利环境四个相等维度之上。它希望为评估志愿服务的影响提供一种统一且适应性强的方法。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评估和追踪志愿服务贡献的方式，将志愿服务衡量工作视为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共同责任。这将释放投资潜力，强化政策措施，帮助动员人类团结一心，共同推动世界向前发展。本报告及时深入地探讨了准确、系统的衡量工作得以发挥的关键作用。在 2026 年 “ 国际志愿人员促进可持续发展年 ” **到来之际，它具有非凡意义。**

联合国
志愿人员组织